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馬來西亞華團領袖回應中國夢

公民與民族兩身份之間

Leaders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in Malaysia responding
to the "China Dream"

Between: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ity

李慧易

Lee Hui Ee

指導教授:石之瑜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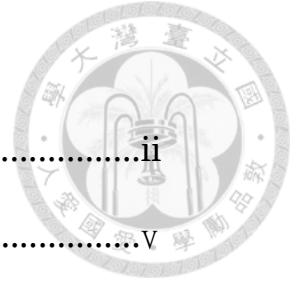
Advisor: Chih-Yu Shih, Ph.D.

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

July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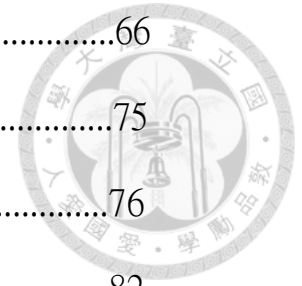


目 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書.....	ii
謝辭.....	v
中文摘要.....	vii
英文摘要.....	v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
第二節 研究背景.....	13
第三節 文獻檢閱.....	16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20
第二章 馬華身分演變.....	23
第一節 華人學者看馬華身分演變.....	23
第二節 馬華對民族的想像.....	28
第三節 馬華的華人性.....	31
第四節 馬華的身份建構.....	33
第五節 馬華的「幫」及「方言群」	42
第三章 中國夢的想像－馬來西亞政府與華人媒體.....	49
第一節 習近平上任前的馬中關係.....	50
第二節 習近平上任後的馬中關係.....	56
第三節 馬來政府的中國夢－建立在安全與利益之間的結盟.....	61

第四節 《南洋商報》中國認識－中國夢.....	66
第四章 馬來西亞華團領袖的中國夢論述.....	75
第一節 華團領袖對中國夢的論述及其分析.....	76
第二節 馬來西亞華團與中國關係.....	82
第三節 華團領袖接觸中國夢的迴響.....	87
第五章 結論.....	103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04
第二節 研究建議與成果.....	112
第三節 研究展望.....	117
參考文獻	120



謝辭



人生是憑著自己的認知及知識去體驗，其實論文也是一樣，憑著自己的知識及經驗去理解。研究生生活也讓我體會一次不一樣的人生。

感謝我的導師石之瑜，感謝他在這兩年來的指導，如果沒有老師恐怕寫不下去，同時看見老師對學術的認真與堅持，讓學生深感敬佩。在寫論文的日子裡，學生的各種情緒，感謝老師的包容與體諒，學生畢生銘記在心。

論文口試期間，感謝我的口試委員們不辭辛勞地審查與提出寶貴的意見，他們分別是游雅雯教授與曹淑瑤教授對學生的論文評建，使學生發覺缺點與改進，讓論文更完美。

在寫論文的日子裡，感謝學姐 Yi Yu，在我心情低落的時候鼓勵我，同時，還有學姐 Kelly、功輝、婉萍給我支持與關愛，以及學長敬豪、翊豪給我的幫助。此外，特別感謝的是學長招勤及學長國璋，給我論文上的一些看法。

最後，感謝我的家人對我的包容，我的任性與固執讓你們受罪了。

李慧易 2015 台北 夏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華團領袖在面對中國崛起，並接觸「中國夢」的論述後如何回應，根據其回應歸納華人身份策略的一種可能路徑，並推論「後華人性」的形成。亦即，對華人性的研究將不僅止於「多元」、「雜匯」等既有概念所關注的差異性，而更加重視共享文化資源的使用，及不同身分策略間的循環辯證。本文在這過程中追蹤華團領袖們建構自身的身份認同，包括他們對中國的認識。

本文認為中國的崛起及中國夢所號召的民族偉大復興，與馬來西亞華人的自我認識有著密切的關係，華團領袖所反映的一種選擇，說明共享文化資源的重新調適，影響到在地華人的身分意識，與主流民族的互動，以及與中國的關係，進而衍生出足以識別彼此同為華人，相互號召，但又不能結為同一群體的後華人性。

關鍵詞：華人身份 中國崛起 中國夢 華團領袖 華人性 後華人性

Abstract



The article studies how leaders of the Chinese mission in Malaysia respond to the “China Dream” and the associated wish for reviving Chinese nationality in the nascent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 Dream.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an emerging string of post-Chineseness characterizes the changing identity strategies.

Post-Chineseness attends to the incurring of shared cultural resources between different Chinese groups that affects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nes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local politic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 rising amongst the Chinese population everywhere. This cultural sensibility in the strategic use of shared cultural resource is not present in the more familiar concepts such as hybrid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which primarily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ce.

Key word: Chinese Identity China Rise China Dream Chinese Mission Chineseness post-Chineseness

第一章 緒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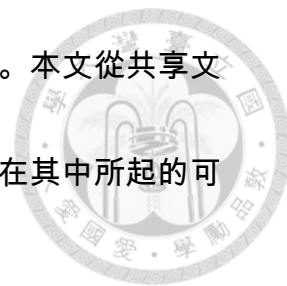


本文透過馬來西亞華人華團領袖對中國夢論述的回應，探討華人性的變遷以及再華化的可能性，進而提出「後華人性」的概念，藉以分析因為共享文化資源的重新運用，所引發華人社群自我認識的調整過程。長期以來，華人性的分析著重在華人社群因其地緣文化差異而出現的分疏與流變，強調在地性以及生存策略所促成的能動性，並且關注在這個歷史變遷過程中，經由互動學習和彼此涵化造成的混雜多元。

不過，無論研究對象如何變遷，某種出自大陸中國的原鄉意識，以地緣想像、親緣想像、風俗、語言、文學、歷史經驗等文化資源為內涵，都一直是想像華人身分意識的重要基礎。這想像可以包括自我想像、相互識別、他者歧視等等方面，但尤其是民族意識明確的如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民族尊嚴所依賴。然而，華人社群的命運與發展並不繫於大陸中國的發展，即使俱有相關性，但在地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文化環境顯然更為關鍵。因此，華人性的源頭早就從大陸中國的一元想像中脫離，而多源頭的華人性彼此之間存在什麼可能性，不屬於華人性的研究議程。

因為華人性的研究議程是以差異為出發點，不是以各地華人社群因其華人性而具有的關聯性為出發點，如此就不能掌握，何以華人仍然可以被視作是華人的想像機制。在華人性已經不具有本質性內涵的歷史現象中，便以「後華人

性」的概念，理解這個無以名之卻又隨時可能相關的模糊身份。本文從共享文化資源的重新運用，探討再華化的一種可能路徑及中國的意象在其中所起的可能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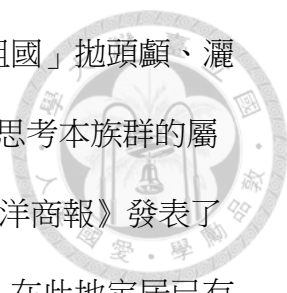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馬來西亞華人隨著從中國南來馬來亞，命運註定了身份的變化，也因為身份的變化，重新再定位身份的認同，至今仍影響馬來西亞華人對於本身的身份認同的選擇。不過，從最早期還一直聲稱自己是「中國人」的馬來西亞華人，至今幾乎從大馬華人社會的語言中消失。

從民國肇建到抗戰期間，甚至 50 年代初期，南洋華人幾乎都自稱華僑，或乾脆說自己是中國人。因為他們的效忠對象不是當地的殖民地政府，英國、法國、荷蘭等殖民地宗主國也不承認他們是英法荷的公民。

因此，當時的馬來西亞華人只能選擇效忠南京國民政府及後來的北京人民政府，亦即只能以中華民國及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自己的祖國，儘管這些所謂的「華僑」當中，有許多都不是在中國出生的。不過，這並不妨礙他們展現自己的愛國壯舉。譬如說，在抗戰期間遠赴滇緬公路支援物資運輸工作的華僑機工，在 50 年代初期毅然回國參與建設祖國（中國）大業的南洋所謂熱血青年，很多都不是從中國南來的「華僑」，而是他們的後代。



但是，就在大多數華僑青年認為應該不惜為心目中的「祖國」拋頭顱、灑熱血的同時，其他一些年輕知識分子則已經開始主張用理性來思考本族群的屬性問題。1941 年，黃望青用李秋這個筆名，在馬來西亞的《南洋商報》發表了《論馬華民族屬性問題》一文。作者在文中指出：「馬來亞華人在此地定居已有長久的歷史，他們應被稱為「馬華」（即馬來（西）亞華人），馬華在馬來亞人口中占了巨大的比例；馬來西亞在政治覺悟與文化水平較當地各民族為進步；華人在政治經濟方面，其接近於馬來亞其他民族的程度，較之接近於中國更直接與密切。……這完全是個現實的問題，客觀地存在我們意識之外，而不是我們大家喜歡不喜歡的問題。」¹另一方面，他也強調馬來亞華人無論是在經濟與政治生活上，還是在語言文化傳統上，還不能完全脫離中國而獨立存在，因此華人：「已形成一支特殊的派生隊伍……，它一方面是中華民族一個特殊的支脈，同時又是當地一個重要的基幹民族。」

自從馬來西亞華僑不能持有中國國籍後，同時也為了「入鄉隨俗」到馬來亞，也不讓其他族群對於身份的質疑，而成為了馬來亞（馬來西亞）的公民。可是，馬來西亞華人還是對於中國的情感仍是無法割捨，內心深處仍存在著複雜的文化、民族主義；以及面對居住國的政治、政府教育、經濟等的影響及壓制，造成馬來西亞華人有著極大的衝擊。至今，馬來西亞華人仍是被公認為中國海外華人最具影響力，儘管大馬華人不再是中國人了，當時，在「文化主義」上，還是強調中國文化只包容特質與傳統之社會價值，未能以「種族、語言、共同歷史與文化」為基本作一群體的之整合，進而凝成「民族」。因而，當

¹崔貴強，1990，《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1945 - 1959》，新加坡：南洋學會，引述李秋 1941 年 4 月在《南洋商報》發表的議論文《論馬華民族屬性問題》，頁 166-167。

時華人的政治效忠目標是來自文化上認同，而不是民族主義。²因此，馬來西亞華人至今都在捍衛華文教育及傳承中華文化，也許是內心深處仍要堅持留住中華文化的根。



許多時候，當馬來西亞華人對著別人稱自己是「中國人」時，總是不能接受和認同，但是在中華文化及語言卻不但無法完全摒除，甚至有意識地維護。因此，「華人」、「華裔」、「華僑」、「中國人」、「支那」等詞彙或符號學，在使用或不使用之間，敏感地反映了在地華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敏感所在。名稱的問題之所以值得重新檢視，因為它可以讓我們了解到華人在馬來西亞的處境以及他們的認同問題。甚至連同一起討論的不僅是中文詞彙，還包括了英文的「Chinese」和「China」，以及馬來文的「Cina」和「China」。³

一言以蔽之，馬來西亞華人（簡稱馬華）在身份認同上，充滿敏感與矛盾，無論是政治或文化上，都是一方面認同，另一方被否認的狀況，這是從當年中國人的身份轉移到華裔馬來西亞人未完成的過程，以至於向馬來西亞的民族定位的中心衝刺，然而卻因無法擺脫文化中國的意識形態而到達不了充分完整的國族身分。華人研究的文獻無不注意到這樣的困境，進而將馬來西亞華人視為與大陸中國的華人迥然不同的華人群體加以研究，於是有所謂的華人性的議程如火如荼開展。但是，華人性的研究主要注重在馬來西亞華人作為一個或多個變遷中的社群與身分意識，尤其是與其他華人社群或大陸中國的差異何

²John k.Fairbank,Edwin O,Reischauer,Albert M.Craig,1966,East Asia:The Modern Trasformation, pp.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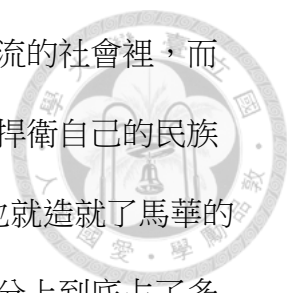
³何國忠，2006，《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頁 198。

在，但因而並未深入探討的是，在這樣日益複雜的差異性下，如何仍能視為華人身份？如此進入了在地脈絡，日漸成為與各地土著民族相對的概念，從而失去本質性內涵的華人身份，為何還繼續在理所當然地作為一個身份識別，甚至偶爾與中國人這樣的身份意識糾纏不清？

「中國人」意識會讓海外華人陷入一種難分難解的緊張情緒中。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將「華人」的簡稱轉為中國人，就算人們不同意，但在溝通時作為指涉之用，所指涉的對象仍然清楚。可是，在此以外的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尤其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這兩個華人文化仍深刻保留的國家，以「華人」作為中國人的簡稱，就大有問題，而且是高度敏感的政治問題。道理很簡單，如果新馬華人接受這樣的定義，那麼新加坡華人、馬來西亞華人、菲律賓華人、印尼華人等短語，都可以還原為新加坡中國人、馬來西亞中國人、菲律賓中國人和印尼中國人，無異於挑戰了當地國家的國家安全。

此何以這個課題對東南亞國家的政治領導人而言，尤其敏感。1967年11月15日，當時擔任新加坡總理的內閣資政李光耀在新加坡美國人協會的宴會上發表演說時指出：「我是新加坡華人，但不是中國人，正如愛爾蘭後裔的甘迺迪總統不是愛爾蘭人、艾森豪威爾總統不是日耳曼人或羅斯福總統不是愛爾蘭人一樣。假以時日，世人將知道，新加坡姓李、姓杜、姓吳、姓王、姓楊、姓林的華人雖然外貌像中國人，並且說華族語言，但是他們都不同於中國人。他們是華族，並且不會因此而感到不好意思。最重要的是：他們心裡想的是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利益，並非中國和中國人的利益。」⁴

⁴吳元華，1999，《務實的決策——人民行動黨與政府的華文政策研究 1954-1965》，頁 141-142。



為了釐清與中國人不同，同時生存在一個以馬來族群為主流的社會裡，而馬來西亞華人一開始就有意識的分辨與主流族群的不同，為了捍衛自己的民族性，馬華就堅持捍衛自身的祖籍（根）、文化、血緣等，這些也就造就了馬華的華人性。然而血緣與文化關係作為馬來西亞華人其華人性的成分上到底占了多少，亦即從血統、語言或著祖籍上來區分是否合宜？畢竟，在馬來西亞能說漢語（華語）的華人占了大多數，而一般上小學的教育都是以華文教育為主。同時，華人農曆春節、清明節、中秋、端午，甚至是祭祖等涉及血緣想像的文化活動，都是華人每年都不可少的節日活動。尤其是近年來，祭祖活動頻密，不管在馬來西亞祭祖還是親自到中國，展開「尋根之旅」。近年來，許多華人組織都更積極地在舉辦各種文化活動，就如華人大會堂代表著華人崇高地位象徵的組織，該大會堂也就是扮演著積極推動華人文化的組織，近年還在大勢舉辦華人文化節，而慶幸的是馬來西亞政府也沒有任何阻擋的動作，這樣的文化熱現象，也是否華人在地化的身份及地位認同或者其他因素所致，仍是值得探討，此一「華人性」或許就是一種民族的共同記憶想像使然之下而成。

另一方面，在馬來西亞華人致力保存中華文化及華語同時，卻也讓馬來西亞華人繼續陷入政治的困境中，而為了走出困境，卻形成了一個另一個現象就是，馬來西亞華人對中華文化了解越來越少，但卻在政治上完全無法被納入主流中，日益處於文化與政治的邊緣。執此中國的崛起之際，適逢中國國家主席習進平的高調喊話：「中華民族的復興，一起同築『中國夢』」，對於在馬來西亞華人有無號召，是否因為這場中華民族的復興，馬來西亞華人會再次在身份認同上引起爭議。本文宗旨便是檢視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認同，以及「中國夢」

對華人的影響為何。



壹、問題重要性

因歷史的淵源，馬來西亞華人從中國南來，歷經了英殖民的時代、到馬來西亞獨立，馬來西亞華人面對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混合（hybrid culture）的歷程，形成了馬來西亞華人從文化到教育都是受到馬來文化與中華文化的熏陶。同時，大馬華人的基本認同跟中國人的基本認同相似，都從族裔開始。族裔是源自於「原生感情」，可以從姓氏、語言、宗教、歷史背景等為基礎開展。如此，馬來西亞華僑從中國到南洋，就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傳承著中華文化。過去數十年來，馬來西亞華人都接受對自身是漢人血統，但有論者卻認為，並沒有任何可確認的血統，而認為華人是指傳承中華文化的傳播者。即使如此，華人還是不能擺脫黃皮膚、黑頭髮的親緣特徵。這就是如孫中山說：「中國人黃色的原因，是由於根源黃色血統而成。祖先是什麼血統，便永遠遺傳成一族的人民。」就如白人有自己的種族優越的神話般，中國人也有他們自己的有關民族的優越神話。⁵

再說，馬來西亞華人除了國籍上屬於馬來西亞，大部份的華人家庭都保留華人文化習俗，並融會貫通地展現在日常生活中，像用筷子吃飯、祭拜祖先、說漢語（華文）等。當然，也存在另一種馬來西亞華人是只有保留了中文名字，對於中國文化及漢語一概不知。

王賡武是差異性研究的佼佼者，他指出，在對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問題的理解上，毋寧存在著不同的途徑，分別是從歷史認同、中國民族主義認同、

⁵葛永光，1991，《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正中書局。

村社認同、國家當地認同、文化認同、種族認同、階級認同出發。這也是「正在變化中的華人認同」，即意味著從一種華人認同變為另一中認同。⁶因為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認同往往出現著複雜的變化，而面對著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的衝擊，就不能一概而論。本論文透過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夢的回應，探究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識及認同，並分析馬來西亞華人在國籍上屬於馬來西亞，但是情感上還是抱有祖國情懷難分捨的現象。而這樣的情感導向，是「文化中國」抑或是「經濟中國」值得進一步觀察。

在中國大陸積極推動中國夢的當下，華僑華人的身份自然凸突顯出來，但是在去中國大陸時，卻要辦簽證的時候，既是以「外國人」的身份申辦。中國大陸人口中的馬來西亞華人是「同胞」、甚至是「僑胞」。雖說是「同胞」，但是在簽證上的國籍就跟這稱呼頗有差異，他們不會把北京人和上海人喚做「京滬同胞」。「同胞」或是「僑胞」的稱呼，只能用在和自己已經有所區隔的人身上，但又以「胞」這個字，去回溯差異底下的血脈聯系。

在習近平的話語中，華人華僑是一種「特殊優勢」，但是對於中國大陸可能是優勢，但是往往在居住國反而成為「特殊劣勢」。因此，為了釐清這種「特殊優勢」，必須先從什麼是中華民族的課題中反省，這形同是對華夏邊緣的概念進行再造。主要是：

知識分子為了尋求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致力於祖源的探索和說明。如同沈

松僑在黃帝神的文章中提到的，通過訴諸歷史的方法，強化中華認同。邊疆

⁶王賡武，1994，《中國與海外華人》，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頁 245-246。

地理學者通過描述漢族與少數民族間的長遠的血緣，文化關聯，強化民族情感。

新的民族志書寫和文化風俗描述，進行新的民族分類，系統化，典範化。⁷



馬來西亞華人在有著這種中華民族情感下，一直擁護、傳承中華文化、把漢語視為母語，自小就學習母語教育等來強化自身是華人的身份，但是在面對馬來西亞政府的時候，若要強化馬來西亞人的身份，確實就難以啟齒，導致陷入了身份認同的邊緣化，遊走在公民及民族之間。就如王明珂說，在特定環境中的資源競爭與分配關係，是一群設定族群邊界以排除他人，或改變族群邊界以容納他人的基本背景。這種族群邊界的設定與改變，依賴的是共同歷史記憶的建立與改變，歷史記憶的建立與改變，實際上是在資源競爭關係下，一族群與外在族群間，以及該族群內部各次群體間對於「歷史」的爭論與妥協的結果。⁸

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一直都在歷史中備受爭論，而這個爭議在於馬來西亞的族群之間，既是因為身在文化、宗教以及教育背景差異下，又是因為資源的競爭。在這時候中國大陸倡導「中國夢」，馬華是否會為了提升在馬來西亞的身份及地位而響應，還是會為了融入在地政治身分而對這個中國夢保持警覺，是本文所追蹤的課題。

貳、問題意識

⁷王明珂，2006，《華夏歷史邊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⁸王明珂，2006，《華夏歷史邊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馬來西亞華人既是在地人，又是華人，如果這樣的華人在政治及經濟生活上，已經與大陸中國的中國人的利害考量漸行漸遠，難道維持著華人意識的主要功能，就只是要與土著民族區隔嗎？或是在演化過程中，華人作為身分識別，保留了更多的潛在可能性，這樣的識別所仰賴的文化資源，具有在地域上遠大於馬來西亞的共享範疇，因此所謂華人，便是具備了有朝一日重新使用共享資源的能力。這是否就是華人之所以還繼續被識別為華人的原因？這是本文後來提出後華人性的原因。

隨著馬來西亞獨立至今將近 60 年，馬來西亞華人一直基於遭遇及選擇而遊走在某種主要身分範疇的邊緣——馬華從經濟中國到文化中國的民族邊緣（Edge of the nation）；同時，馬華在馬來西亞也無法衝破邊緣公民架構，而始終未於在地政治的邊緣。因為在馬華的祖先從中國南來，到後期才得以獲得馬來西亞政府的允許下入籍成了馬來西亞公民。

在馬來西亞歷史的敘述中，向南來的華僑一直背負著「僑民」這個身份。是故，馬來亞獨立的時候，對華僑而言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國民黨在馬來亞的政治活動，受到重大限制，因為各地的華人開始必須申請為馬來亞國籍，並放棄原有的中華民族國籍。而這個時候的中華民國，也正好是遭遇國共內戰的時候，並於 1949 年遷移台灣。但馬來亞華人的身份逐漸因馬來亞建國，而有了釐清的必要。⁹

⁹何國忠篇，2003，《承襲與抉擇：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文化篇》，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出版。

其結果，數十年來，馬華始終因「華」的身份受到了許多的限制。事實上，當年的馬來民族的獨立，其間成為首要考慮的，就是壓制其他種族的政治地位，尤其是中華文化與親緣特徵顯著的華人，從此華人的待遇及地位無法取得平等。

1949 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政府與海外華人的關係已切割，華人不會再持有中華民國國籍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根據王賡武的說明，中國政府具體而明確的有所保證，以至於「…過去的華僑幾乎都已經絕跡，外籍華人跟中國大陸是沒有關係，也不是中國顛覆的目標；而且不鼓勵華人抵制當地同化，也不鼓勵他們堅持他們（華人）所身下的屬性。」¹⁰在中國政府非常明確的政策之下，華人對中國的認同顯得一廂情願，然而在自己的思想及態度上，在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化及教育上確實沒有進行同化，因此華人的情感仍然無法與中國切割。

這是為什麼中國主席習近平的中國夢，有可能引發回應。畢竟之前中共政府採行改革開放政策時，對於歸僑政策也曾相對的積極，並喊出回歸祖國號召，等於提供馬華在其艱難的身份進程及複雜的情感中，看似獲得一個再抉擇的機會。

中國崛起的趨勢之下，中國夢的提出是否會被當成更強的一次再抉擇的機會，值得探究。為了這個目的，本文也將探討目前居住在馬來西亞的華人口變化情況，觀察代間的遞移，對於尤其是「中國夢」的中華民族復興，及所反映的對華人、中華文化以及中國崛起的回應，是否造成這樣或那樣的不同衝擊。

¹⁰王賡武，1994，《中國與海外華人》，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從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夢」的認識的角度，可以區分成幾種可能，首先即是華人國籍上不屬於中國，理當不需要有中國夢，但鑑於情感上卻有時屬於中國，又不可避免會注意甚至回應中國夢的提出。研究華人對中國夢的認識，是要追問是因為文化上的認同而自發地願意融入其中，因為經濟上的考量而額外帶有利害的算計，甚至是政治上對自身遭受歧視待遇的投射而願意貢獻其成功？

除了上述角度問題，另有從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認識的世代問題探究的必要。因為不同代的華人自我認識在變遷調整，早經文獻所分析。新一代馬來西亞華人不管是國籍或情感上，皆不屬於中國，探討這群自認為是「非華人」，而只有臉孔是華人的群體，因其不懂得說中文、完全被「西化」或同化，在面臨中國的崛起之際，是否對自身的身份重新引發懷疑或好奇，涉及到代間身分認同的演進，是線性發展或仍有往返循環可能的重要問題，因此值得探討。簡言之，這樣的探討對理論的開展有含意，亦即「中國夢」的提出，能否在馬來西亞再度引領華人重視中華民族復興，比較不同世代的大馬華人的因應與詮釋，有超出地域性的更大的理論潛能，而這也是研究「後華人性」所關注的華人的自我識別與他者識別問題。

再其次，是對中國夢的回應還涉及關於對中國本身的認識，如王賡武在新加坡的一場座談會上曾指出，今天的「中國夢」與古代的許多夢相連，關鍵要素是「中國共產黨即中國」。他解釋說，所謂「中國共產黨即中國」，與「中國即中國共產黨」的意義不盡相同，而且會引向不同的夢。中國現領導層是保留

了「中國共產黨即中國」這個很古老的夢。當然，這種夢也不專屬於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掌權時期，國民黨領導層也曾認為國民黨就是中國，掌握了中國的未來。這是中國古老的傳統之一——即誰主掌國家，誰就代表了中國。可看，對中國夢的回應，對中國共產黨回歸中國歷史正統，有重要意涵，也因此對中國正統的當代延續，有其意涵。

所以，縱使馬來西亞華人在因為無法掌握中國這個國家，也無法在馬來西亞順利進入國族的中心位置，卻反而可以從邊緣界定及其中國、中華民族與中國夢的範疇流變，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回歸中國歷史正統的設想，這樣的含意一旦得到中國思想界的掌握與回饋，是否可能影響了馬華在馬來西亞的身份定位與再定位，使得馬華在馬來西亞數十年賴無法融入在馬來社會及被同化的情況下，轉而由中國夢的論述汲取新的文化資源，藉由參與「中國夢」的建構，重新在華人性（chineseness）的範疇中發展新身分意識的可能。

第二節 研究背景

馬中建交已經四十年，而也是東協國家首個與中國大陸建交的國家，馬中關係從經濟建立了穩固的外交關係，成了全方位策略夥伴。中共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10月3日至5日對馬來西亞進行國事訪問。海外人士和媒體對此予以高度評價，認為習近平此次訪問對提升馬中友好合作關係，以及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係具有重要意義。根據馬來西亞時事評論員指出，習近平訪馬把馬中關係推向高峰，也掀起大馬華社的一股熱潮，有機會參與活動的人士，莫不表現興奮，與有榮焉。馬中關係提升，從經貿角度理解的話，是預示華人將有更多商業發展的機會；而從文化和血緣角度出發的話，也表示華人可以擴大文教發展

的空間。馬來西亞政治分析師、首相納吉的前政治秘書胡逸山表示，習近平主席此次訪問的最重要成果是將兩國關係提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這表明馬來西亞是中國最重視的鄰國和夥伴之一。馬中經貿關係有望以此為契機繼續迅猛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意味著雙方將在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展開更多合作。同時，兩國民間將進一步加強往來，這對實現更緊密的馬中關係十分關鍵。

華人意見領袖對馬中關係進展非常歡迎。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會長方天興認為，習近平主席此次訪問最大的成果之一是兩國首次在政府層面簽訂經貿合作五年規劃。這表明中國重視馬來西亞，習表示要讓更多的中國商家來到馬來西亞，相信兩國未來會在教育、商業、政治等領域有更密切的往來。馬中友好協會秘書長陳凱希認為，習近平主席此次訪問以及雙方所取得的成果，標誌著兩國關係一次大的飛躍。本次兩國簽署的協議非常多，可行性都非常大，這將進一步推動兩國經貿關係發展。馬中經濟貿易總商會會長黃漢良提到，馬中經貿關係的提升給馬來西亞商界提供了很好的機會。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投資也有助於馬來西亞經濟的發展。老撾國家電視台台長本窘·翁佩認為，習近平主席出訪印尼與馬來西亞所作的提升中國與東盟關係的一系列表述令人非常振奮，特別是提出將明年確定為中國—東盟文化交流年，這將促進老撾與中國進一步加深了解。印尼加查馬達大學亞太經濟研究院院長、經濟學家斯里·阿迪寧西的分析指出，習近平主席訪問印尼和馬來西亞將提升中國—東盟之間的關係。從東盟角度講，需要從與中國的合作中維持和獲得更多利益。馬來西亞媒體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媒體近日高度關注習近平此次出訪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發行量最大的中文報紙《星洲日報》報導到，習近平主席與馬來西亞首相納吉

的會晤將為馬中未來關係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引領兩國人民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媒體積極探索「中國夢」以及習近平上任後的轉變，譬如馬來西亞最主要英文報紙之一《新海峽時報》發表社論主張，習近平主席的訪問意義重大，因為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馬來西亞必須抓住機遇加強與中國的關係。馬來西亞國家通訊社報導相信，習近平主席與馬方領導人在此次訪問中共同規劃兩國關係未來方向，重申雙方加強在各領域合作的承諾，必將使馬中關係提升至新的水平。泰國《曼谷郵報》報導表示，習近平上任後首次對東南亞國家的訪問有利於鞏固中國和東盟國家的緊密聯繫。泰國《民意報》報導認為，從習主席此次出訪可以看出，中國正努力推動與東盟國家的關係繼續發展，能夠使東盟國家人民感受到中國是東盟國家的忠實好友。日本《讀賣新聞》報導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東南亞，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出席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並訪問文萊、泰國、越南，表明中國前所未有地重視與東南亞的關係。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指出，馬中兩國領導人設定了2017年雙邊貿易額達到1600億美元的目標，為此中國政府將繼續鼓勵中國企業參與吉隆坡至新加坡高鐵建設等項目，推進本區域互聯互通。越通社報導說，習近平此次訪問馬來西亞，旨在推動中馬關係邁上新台階。報導也指出，此訪有利於兩國領導人規劃中馬關係未來發展方向。¹¹

中國大陸走向大國崛起，在2013年第九次全國歸僑僑眷代表大會上，由中共副主席李源潮指出，

¹¹整理：新華網，報道日期：10月5日電綜合新華社駐外記者，瀏覽於：2014年3月20日。

我們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更加需要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奮鬥。希望廣大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發揚熱愛中華、振興中華的愛國愛鄉傳統，抓住祖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新機遇，為促進祖國現代化建設，為維護民族團結、推進祖國統一，為傳播中華文化、增進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友誼作出獨特貢獻。各級僑聯組織要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以改革創新精神推進僑聯工作，開拓僑聯工作新領域，積極拓展海外工作和新僑工作，更好團結服務廣大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¹²

這樣的政策立場，會對馬來西亞華人起什麼作用，從華人對「中國夢」的回應中探索可能的答案。

第三節 文獻檢閱

中國大陸的崛起再一次牽動海外華人認同議題的討論，這些討論包含身份認同迷思，特別是馬來西亞華人社群從 1957 年獨立至今，先輩對於身份認同的討論除了是一種血緣上的關係之外，尚包括身份及文化承襲問題。

從海外華人研究延伸到中國研究是一門獲得海內外學者的青睞，對於中國學術研究而言，中國崛起主要也是透過歷史來分析目前中國的發展與過程，尤其是針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中，不可以忽略的是海外華人對於中國崛起有一定的關聯性，而這樣的關聯性不能一概而論，因為相較於其他外人的華人，其如何捲入或能否捲入中國崛起，在於是否能重啓並使用共享的文化資源，從差異的

¹²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3-12/02/c_118379945.htm瀏覽於：2014 年 3 月 20 日。

華人轉而為情感與利益皆可能相關的華人。



從過去的一些研究馬華歷史的書籍中，包括《中國與海外華人》¹³、《南洋華人簡史》¹⁴、《疏離別土：境外看中華》¹⁵、《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¹⁶以及《建構大中華身份認同的迷思－身處改革開放的中國的馬來西亞華人學生》¹⁷等。這也是從過去的文獻中不難發現，海外華人對於中國大陸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或支持。在面對中國的改革到崛起，研究中國的學者都認為，馬來西亞華人清楚知道作為馬華主體性的分裂，從政治的角度去看，兩者之間似乎矛盾的，因為一個是中國，而另一個是馬來西亞。¹⁸王賡武同樣提到馬來西亞華人是把國家與文化是分開來談的。如果中國富強起來了（現在中國比以前富強），是否還可

以長久的含糊下去，還是說將來是否到了一個時間點，就必須要做一個選擇？¹⁹在經濟方面，當一些海外華人不僅是在全球經濟，同時在東南亞地區以及晚近的中國大陸取得傲人的成績，華人的跨國族主語話語也同時出現。中國的用語如「關係」、「竹子網路」就出現在大眾媒體及商業活動中，在影響著東南亞國族的文化與身份政治認同，這情況在有著明顯族群界線的馬來西亞尤為突

¹³王賡武，1994，《中國與海外華人》，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¹⁴王賡武，2002，《南洋華人簡史》，水牛出版社。

¹⁵王賡武，2005，《離鄉別土：境外看中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¹⁶何國忠，2006，《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華社研究中心。

¹⁷羅金儀，2011，《建構大中華身份認同的迷思－身處改革開放的中國的馬來西亞華人學生》，唐山出版社。

¹⁸何國忠，2006，《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華社研究中心，頁 50。

¹⁹王賡武，2005，《疏離別土：境外看中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62-63。

出。²⁰

從文獻得知，馬來西亞華人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到崛起，在經濟上有著一定的支持，也就是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下的社會主義實踐。習近平在 2012 年的 11 月底，在參觀一個有關中國復興的博物館裡面提出「中國夢」，他強調的是以恢復中國的偉大就必須要有「中國夢」，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但是，中國如何強大起來，是否就是用民族主義動員對中共的支持。

另一方面，從中國歷史的結構文獻分析來看，台灣大學教授石之瑜在《感覺中國崛起：本體敘事及其情感基礎》文獻分析中，認為「中國崛起」不是一個簡單的經驗實證現象，而是有關情感傾向的歸納，有助於說明中國崛起不可能純粹是實證的。對於石之瑜的看法是，「中國崛起」必須藉由文本的詮釋與選擇，才能產生意義，而詮釋的方向又受制於對中國或非中國的情感。至於被觀察的「中國」，不僅是一個被觀察的對象，也同時是參與詮釋與回應外界詮釋的主體。

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長劉宏教授說，海外華人研究是該從華人重要性角度來說明。他認為

海外華人研究離不開中國崛起。從世界的角度來看，海外華人是當地社會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看全世界海外華人人數總體上有五千萬，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跟歐洲的中等國家人口數目差不多。尤其在東南亞地區，比如說在印尼就有近一千萬的華人，佔了其總人口的 4% 左右，在泰國、馬來西亞這

²⁰ 羅金儀，2011，《建構大中華身份認同的迷思－身處改革開放的中國的馬來西亞華人學生》，唐山出版社，頁 56-57。

些國家中，華人人口比重也都很大，新加坡更是如此。所以華人對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都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²¹



對於研究差異性與在地性的歷史學者王賡武而言，海外華人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隨著中國逐漸成為亞洲主要力量及其在國際舞台上的崛起，海外華人的作用將更為複雜而多元。但是差異性解釋不了王賡武已經看到的發展，亦即伴隨著這一趨勢，一些東南亞國家中出現了「再華化」的傾向，即華裔公開推崇中華文化以及自己的華人族群身份，並同中國建立各種類型的聯繫。這和他們的前輩在二、三十年前隱藏自己的華人身份或只能私下進行華人文化活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從王賡武對中國崛起及「中國夢」的看法時還特別強調，東亞不只有一個夢，除了中國夢，日本和韓國也各有夢想，它們的夢雖然沒有被媒體列為頭版頭條，卻與中國夢同樣重要。²²

可以看出中國崛起到中國夢，都是因媒體過度的放大，同時也顯現了中國崛起對海外華人，是否威脅抑或福祉，一切都仍在進行及改變中。不難發現的是，學者們都認為中國崛起後的認同是源文化中國轉移到經濟中國的概念。

另一方面，旅居大馬的法國華裔馮彬霞在《星洲日報》的專欄上摘文，題目為《大馬華人的中國夢》：

新微信和微博「昭告天下」：「我在吉隆坡住下了。然後，很多中國大陸朋友開始留言了：哇，你到新加坡了啊？我不悅，糾正道：不是新加坡，是吉隆坡。此坡，非彼坡。可無奈，中國國內

²¹劉宏在「2014 海外華人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方法、理論、視域」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有關海外華人研究離不開中國崛起的背景，如是說明。

²²王賡武在「東亞展望 2014」(East Asia Outlook 2014)論壇發表看法時，如是解釋。

很多朋友依然是在留言中，固執地把新加坡和吉隆坡混為一談。

寫這段，只是為了說明，其實中國大陸民眾對大馬瞭解太少太少了。

就連大馬首都，他們都會和新加坡混在一起。

可相反地，我和很多大馬華人交流後發現，他們對中國的情況，

差不多是瞭如指掌。不僅僅如此，大多數大馬華人，心裡都存活著

一個美好的「中國夢」。因為這個美好的「中國夢，他們關注中國的一切。²³



如此一來，從旅居大馬的法國華裔的文字中，透露了在當下的中國人民眼中對大馬華人極為陌生，比方說中國人根本不知道華人性是什麼，海外華人對中國的情感又是為何，反觀，在地的華人明顯的反映出對於中國情感與想像，進而形成了中國是馬華的民族想像共同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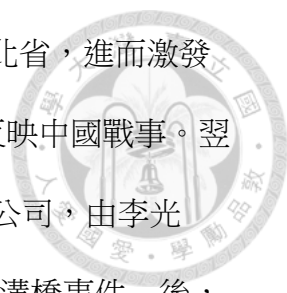
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架構

本研究擬採用之研究方法，以媒體報道、評論、歷史文獻、華團領袖的言論、文章、致詞等等，同時訪問馬來西亞當地的華人學者，尤其是對於「中國夢」的看法，並卻了解當今馬華的民族思想動向。本論文從報刊內容、訪談與焦點分析，蒐集以華團領袖為主的對於身分或對「中國夢」的回應。媒體的報導以《南洋商報》為主敘述。選擇《南洋商報》作為分析對象主要是因為，

《南洋商報》大量報導及評論了有關習進平提出的「中國夢」，同時也亦步亦趨地追蹤習進平訪馬來西亞時候的影響。同時，作為當年由陳嘉庚一手創辦的

《南洋商報》，見證了也記錄了從華僑報紙轉變為華人報紙的身份意識演進歷程，因此同時有近代史與當代史的意涵。

²³ 星洲網，<http://opinions.sinchew.com.my/node/32156?tid=38>，瀏覽 2015 年 7 月 22 日。



因 1931 年中國發生九一八事件，此即日本 1931 年入侵東三省，進而激發《南洋商報》於 1932 年將午報改成早報，以第一時間向讀者反映中國戰事。翌年，即 1933 年 8 月，《南洋商報》進行改組，脫離陳嘉庚有限公司，由李光前、林慶年及李玉榮等人承辦，註冊為有限公司。1937 年「盧溝橋事件」後，《南洋商報》成了強大的抗日文化陣地。在這種情形下，隨著《南洋商報》的立場，讀者已形同轉成明顯的中國人意識，且於 1940 年從中國聘請左派著名報人胡愈之前來主持筆政。根據後來揭開的史料得知，胡愈之是銜周恩來之命派來新加坡，成為《南洋商報》的編輯主任。當年的《南洋商報》是為了與中國一起抗日，如今的《南洋商報》是否在全球中華民族復興運動上扮演類似積極參與的角色？

大體而言，本研究擬就三個層面來探討這一議題，下文將分別對這三個層面的研究作一基本的說明。首先是探討「中國夢」形成的發展過程及歷史背景，從馬華對中國的情感開始談起，並試圖探討馬中關係建交的過程，另外也討論馬來西亞華人與中國的關係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另一部份要了解到馬來西亞華人對本身的身份認識為何，包括對「中國夢」的看法、中國的崛起策略是否造成馬來西亞華人身份引起爭議。

其次，本文從文獻及訪問中蒐集華人對於馬來西亞的公民認同，尤其重視是否因為「中國夢」而起了變化？這方面的研究議程有二：一是，在面對中國大陸的大國崛起，作為中國之外的海外華人，馬來西亞華人是否仍然積極的扮演好在馬來西亞政治中的公民角色？二是，對於自身的海外華人身份，因為有明顯的華人特徵（中華民族），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積極的在推行僑歸，是否馬來

西亞華人更參與中國大陸的建設與現代化企業，進而也對華人身分有更高的敏感。



這些文本與文獻的閱讀分析，也是要回答關於新一代的馬華所能進行調整的路徑，亦即在面對馬來西亞作為祖國，再加上中國大陸這樣的親緣「祖國」，因而處在公民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情感上始終覺得自己身在邊緣的他們，未來可能的調適何在。中國夢的提出能不能對這樣的邊緣意識產生影響，或導致更強的邊緣意識？以及華人對於祖國的心理需要，是否隨著年齡、生活環境及教育的影響，而會開展出一個心中的真正祖國？

本文將分為五章：第一章是緒論，敘述研究目的、研究背景、方法及架構；第二章討論華人身份的演變；第三章分析中國夢的想像，以馬來西亞政府及媒體為例；第四章馬來西亞華團領袖的中國夢論述。

第一章基本介紹本文的問題意識及研究脈絡，意識到中國夢這個民族復興的概念多少對馬華在身份認同上帶來衝擊。第二章將淺析華人身份建構的過程，面對的主流族群、幫及方言群的影響，依憑歷史建構來理解馬華及其華人性。第三章分析馬中關係在習近平上任前後的變化與進展，同時也從華人媒體的視角去揭示中國夢造成影響，以及檢視華人媒體在認同上的方式轉變為何。

除了檢視馬華的自我認同之外，還在第四章中探討華團領袖在接觸「中國夢」後的對於文化或者是經濟的重新界定，如此一來，華人性在馬來西亞就變為更多元及流動的，也就在流動的過程中促成了後華人性的開展。第五章結論

用「中國夢」去摸索華人身份變化的過程中，發掘了馬華的華人性是不斷的流動與變化，使得馬華在共享資源上他們自己懂得識別自己與他者的不同，然而在這過程中開拓了他們作為華人方法，來理解自身的身份認同及華人性，卻在多元與雜匯的激盪下，了解到對自身的身份認同產生變化是自然的現象，同時具有識別的能力，有識別的能力才可能會出現再華化，而這種能力亦可稱之為後華人性。

第二章 馬華身份演變

第一節 華人學者看馬華身份演變

本章將試圖從文獻中證實，當前華人研究主要是從歷史與文化面，去探索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具備的差異性、在地性、混雜性，作為本文結論時提出補充性概念的參照，亦即，以重新啟動共享文化資源的可能性，界定出華人社群之間取得關聯，並相互識別的後華人性。

從東南亞華人歷史上去探索華人的身份時，即從南洋史作為切入點，如按東南亞華人史上的記載，華人的身份認同是受到遷徙、家鄉與文化的想像所影響。二戰以後，華人華僑作為移民，又或者是移民的後裔，在這 50 年來至今，歷經巨大的變化，華僑成為了當地的華人，歸化為當地的公民，成為了多元組織的一份子。從然，馬來西亞華人仍保持著中國的文化、語言、血緣、籍貫等，這也是華人在當地作為多元種族的象徵，同時也是與中國關係的基礎。藉此，華人在身份認同上倘若會

出現再華化的變化，其中一個關鍵是來自文化影響，而「中國夢」作為本文的主體，多少在華人的身份認同上，會產生一種啟動了共享文化資源的效果。



馬來西亞華人仰賴的是中華文化的傳承，而華人透過與中國的互動來回應中國，進而也可以推斷出華人與中國的互動上是密切的，形成了與中國的文化、經濟關係無法分割。

華僑或者華人是一個民族與文化的概念，馬來西亞華人最早期是從清朝至清末的一個程度上保持中華文化、是中國人血緣的非中國公民，這也就是歷史上所形成的民族的概念。一般上，馬來西亞華人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是從歷史上開始，從先輩到南洋的過程，從最早期的對孫中山革命情感、中華民族的想像、中華文化到母語教育（中文教育）等，那是與「中國」關係的基本定義。就一個較長遠的歷史階段而言，作為華僑的後裔，他們的祖先是從最初在明清時期掀起了第一波移民潮，華人及華僑在當時就開闢了東南亞和印度、斯里蘭卡的海上交通。由於開展海外貿易，商人、水手可往東南亞進發，其中一部分人定居於當地，成為了第一代的海外移民。隨後，華僑移居國外逐漸增多。

換言之，在當時的移民潮中的確形成了南洋華人，從某種的意思上而言，華人的情感是受到歷史、文化、血緣等牽扯並延續這歷史的發展到各地；不同的是現今的馬來西亞華人在自我認同上是多元，還受到受到環境、世代、政策、文化等影響，即多元文化的影響，因此很難有自許是「純」華人或者「中國人」。



隨著歷史的演進，不同世代的華人在民族認同上是會出現變化。崔貴強²⁴在華人研究上指出，新馬華人國家認同在 1945-1959 年期間的有所轉變。在早期，華人移民新馬，原本僅為謀生。崔貴強就在研究中提到了，華人從戰前到戰後，再到成為馬來亞公民的過程中，在不同的時代，產生了幾種不同的認同，而最初仍是認同於中國的政治意識，他們都是從愛國（中國）愛鄉的觀念開始，到中國政府推行的護僑政策，再加上華文報章的催化作用。²⁵

王賡武指出各地華人有不同種類的認同，從中國為中心的華人認同發展出當地國為中心認同²⁶本章討論馬來西亞華人在認同文化中國，爾後轉向文化馬華的過程，指出華人自身已然意識到，其認同極大可能是受到環境、文化以及國家政策的影響。但是，為了自身的民族尊嚴，不得不靠著保存中華文化作為終身的使命，而在華人社群之內努力保留自身文化的奮鬥，並沒有受到馬來西亞政府的介入。馬來西亞政府對於華人文化習俗節慶，一貫採取不干涉政策，同時也為了符合國情多元文化，因此華人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中文名字、接受母語（中文）教育。

²⁴本文引述崔貴強的論述作為參考，因其運用了大量的華文報刊和英國殖民部檔案，論述了 1945—1959 年時期新馬華人社會的中國移民(及其後裔)與海峽華人這兩大群體對政治變革的反應，從而說明了新馬華人對國家認同的轉變，為瞭解當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人的社會狀況提供了重要歷史線索。作者把這一時期的歷程分為三個階段，相對的，本文也試圖透過商報來檢視對中國夢的反應。

²⁵崔貴強，2007，《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 1945—1959 年》，新加坡青年書局。

²⁶ Wang Kang Wu, 1988.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1-22.



根據王賡武的論述，馬來西亞華人身份的認同可以集團來分類，他在最早期的東南亞華人研究中便提出了「三個集團說」：甲集團與中國政治保持着直接和間接的聯繫，並總是關注着自己與中國的共同命運，政治色彩最鮮明；乙集團由精明而講求實際的多數華人組成，他們關心的是貿易和社會團體的低姿態和間接政治，常常給人以不問政治的印象；丙集團小而不穩，不能把握自己的特性，但一般都抱有對馬來亞的某種忠誠。就華人民族主義而言，甲集團的民族主義傾向最為強烈，而丙集團的最為淡薄。王賡武亦強調他們不是靜止的集團，彼此之間往往發生雙向流動。同時，華人不但在集團立場上存在着分歧，在政治意識和政治行動上也存在着差異。儘管馬來亞華人內部的政治狀態存有很多差異和變數，但不論它是否確如王賡武教授所說的那樣——不成熟、膚淺、具依賴性而缺乏自我運動能力，當時的馬來亞華人民族主義意識的升降變化始終跟中國的發展密切相關。²⁷

上述不同集團對於中國的認同有著明顯的差異，當時在馬來亞的輿論一直不利於國民黨政府。如原本親國民黨的《南洋商報》及《星洲日報》，過去對國民政府由衷的讚美，對中共的嚴詞斥責，開始在 1949 年後就開始變調了，並漸漸地開始批評國民政府及其領袖並要求檢討與改革。²⁸馬來西亞華人與中國的關係看似「曖昧」，尤其在報章上的言論引起了馬來領袖的對華人的猜疑，即在獨立後的馬來西亞，巫統的領袖拿督翁便抨擊華人 98%效忠中國，其他 2%是共產份子。他指控中國國民黨控制中華總商會，而總商會則是操縱了馬華公會

²⁷王賡武，1987，《東南亞與華人》，中國友誼出版社。

²⁸崔貴強，2007，《新馬華人國家認同轉向》，新加坡青年書局，頁 57。

(MCA，如今是國陣成員黨之一)，他們企圖成使馬來亞成為中國第二十行省，拿督翁後來在不同公開場合持續發出類似的言論。²⁹華人在馬來西亞身份地位一直受到包括言論與政策方面的壓制，儘管面對這種無禮的語言上的攻擊，當時的華人為了生活在這地方上，即使遭到邊緣或者歧視都只能選擇保持沈默忍耐。

在華人不爭不辯情況的持續下，華人無異於漸漸的接受自己遭遇，但讓自己儘快的從外來移民的情感上轉移到居住的國家，並對這個居住的國家產生感情，從而具備歸屬感，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亦不是一朝一夕可一蹴可幾，而是要經歷長年累月的浸濡與感化，使他們覺得在此地生活前景光明，漸漸地把自己視為整體的一部分患難與共。最早期南來的華人，一心只想回到中國，他們皆認為到南洋只是短暫逗留，加上在殖民時期的生活，既得不到平等待遇，又無法回到祖國（中國）去，只好暫時留下，但是依舊心繫中國。隨後，確定無法再回到中國的華僑們為了對維護留下後自己應有的權益，而選擇入籍馬來（西）亞成為公民。當年為了讓華人能夠安心的留在馬來亞這土地上，而當時的陳禎祿³⁰更具體的說：

要使中國出生的華人擺脫中國政治的糾纏，唯一的方法就是慷慨地授予

他們馬來亞的公民權，這能是他們對中國政治失去興趣或者參與中國政治。

要使移民人口與原有國家斷絕感情到移居的土地上。³¹

²⁹ 崔貴強，2007，《新馬華人國家認同轉向》，新加坡青年書局。

³⁰ 敦拿督斯里陳禎祿爵士，KBE（Tun Dato Sri Sir Cheng-lock Tan，1883年4月5日－1960年12月21日），馬來西亞華人公會的創始人及第一任總會長、成功的商人及政治家，致力於為海外華人爭取權益，同時力促民族和諧與平等，並積極參與馬來亞自治及獨立運動。早在1922年被任命為海峽殖民地立法議員時開始，陳禎祿便致力於為海外華人的爭取平等權益，並多次對殖民地政府歧視華人的政策表達抗議。

³¹ 整理：《星洲日報》，1952年1月11日。



無可否認的，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華人的情感歸屬是當時的中國，因為其情感在中國，隨後華人與中國的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以馬來西亞化程度高的華人為例，他們的情感轉移了強調自己是馬來西亞人、馬來西亞公民，但是對於中國的認同，確實不能完全摒除，或者否認過去對於中國的情感，包括血緣、原鄉情感、文化情感，終究其原因在於「民族」這一個概念上具有多重的規定性。

為此，「民族」這個概念，造成馬來西亞華人一生中都面對這無數的變數，他們的身份無法脫離的是民族與國族之間的磨合及交錯。華人對於身份的認同不得不承認的是受到歷史、情感，以及輿論（華文報章）的影響，在這轉化的過程中，從華僑轉為華人。如今，馬來西亞華人在成為了當地多元社會的族群，面對的變化是來自根本的變化，同時也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過程，而馬來西亞華人在這過程中依然須要面對身為邊緣公民的焦慮。本章從華人歷史切入，敘述馬來西亞華人在不同時間點上出現的不同認同，其中包含了多層的認同，並反映出他們所意識到自身在國家地位上所面對的困境，華人均能敏銳地注意他們在主流族群眼中的地位，自覺到其公民身份永遠在主流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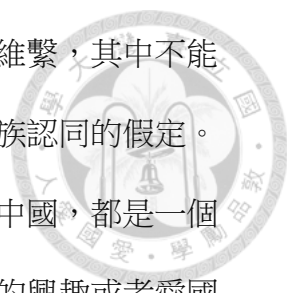
第二節 馬華對民族的想像

馬來西亞華人一直身為土著眼中的「他者」，是來自馬來（西）亞以外的中國。在歷史脈絡中早期的華人都是移民，僑民。在僑民轉變為公民的過程中，馬來西亞政府乃制定相應的身份政策，把華人列為一個稱之為「非土著」的身份類別。對華人而言，那是一種被看作「二等」公民的稱呼，使得華人無法走入中心的位置，他們在這個國家的角色，只能用維繫自身的中華文化，作為維

護自身民族及公民尊嚴的方法，因此他們保持著對中國的某種想像，不會受到居留時間無限延展的影響而磨滅。這表示他們對中華民族會有持續的想像，如此才確保民族認同不被主流的土著族群政策同化。可見，華人有意識地抗拒國家政策同化，就算面對類似 513 族群暴動的威脅不斷，也不足以造成華人要放棄華人身份。這一場暴動充其量讓華人暫時靜音，並沒有摧毀華人的對民族、文化的堅持，反而還是再一次的確定華人不屬於主流族群。

馬來西亞華人在自己居住的國家受到不平等的對待且被邊緣的狀況下，面對中國的崛起，接著遭遇到「中國夢」的提出，會否喚醒了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的新的想像，是否藉有中國重新提升民族尊嚴，而讓在海外的華人感受更多的自尊？華人們在接觸「中國夢」之際，能否與中國人認為的「中國夢」看法殊途同歸？或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夢」的民族復興想像，必然因其華人性而有因環境、政策所導致的不同的理解與運用。

在華人性的概念強調差異與混雜的認識起點上，馬來西亞華人與中國人是不同的，也與其他東南亞華人不同，則對「中國夢」的看法顯然的也會不同。首先馬來西亞華人沒有「政治中國」的概念，因為華人歸化成為馬來西亞公民後，經過了離散的情感洗禮，馬來西亞華人剩下的只是「文化中國」的概念。不過，一旦文化層面延伸到今日的經濟層面，接觸到中國的強大崛起，中國夢的召喚，仍有可能因為共享文化資源的重新調動，而喚起面對土著的一種屬於在地華人的民族主義意識，進而投射出對中華民族的情感及態度。儘管對中國陌生，但是透過媒體、華團在與中國所共享的文化資源上推波助瀾，讓馬來西亞華人再度選擇民族身份大於國族身份的認同策略。



具體的說，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的關係，是屬於情感上的維繫，其中不能缺的是血緣、原鄉、文化的想像，這些都強而有力的鞏固了民族認同的假定。華人推廣中華文化，參與各種文化活動，不管對華人本身還是中國，都是一個充滿理想又具備民族復興的華人性展示。不過，對於中國政治的興趣或者愛國的熱潮則未見復返，除非是直接涉及到利益。簡言之，馬來西亞華人與中國的關係，即使建立在民族主義的話語上，可以確定不再是愛國（中國）主義。不過，從歷史開展中發現馬來西亞獨立至今已經將近 60 年，但馬來西亞華人身份的民族建構仍在變遷，華人至今保留著非土族的官方身份，就算歸化成為公民後在身份華人的意識中上，仍是沒有擺脫「華」這個身份。本節從歷史中檢視華人身體的調適，主張華人這個身份不管在哪一個世代都遭受邊緣化。從馬來（西）亞華人歷經飄洋過海的艱苦、英殖民時代一直到到馬來（西）亞獨立，華人總是身在「他者」的邊緣身份中，儘管是轉變成為馬來西亞公民的同時，依然必須在身份證件上特別註明「華裔」。面對政治及政策上不公的時候，華人自然會要維護民族身份與文化權益。故此，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文化（又稱作中華文化）的傳承、對保留華文教育的堅持、延續當地華人文化節慶，這種種行為狀態也其實是民族認同的維繫所必須。

對華人而言，生活在這個充滿著馬來色彩的馬來西亞，華人仍視中華文化為民族使命，亦是民族事業，就算面對馬來文化的霸權所邊緣化，導致種族之間的差異日趨嚴重，其中包括一種抗拒同化的心理防衛。

華人沒有因為霸權、不公、不平等，委屈而接受同化，反而更展現了對於民族身份的堅持，這樣的堅持意識本身，就構成馬來西亞華人性的一個重要的



在地特色。例如，早期華人商店一般都用華人名字命名，這也是一種對於馬來文化霸權的抗拒，另外華人家庭父母都會把小孩送到華文小學，這也是一種文化使命使然。早期的華人都認為只有把小孩送華校才能保住文化的根及延續中華文化，馬來西亞華人是作為華人的方法在生活，他們都對中華文化的使命感難以透過日常語言加以描繪，不過試圖為了證明自己就是華人的意志十分明瞭。相對少數的馬來西亞華人父母，選擇不送小孩到華文小學，但他們的生活作息，尤其飲食文化，還是維持華人模式，包括用筷子吃飯、過年穿紅色服飾、講求孝道。這說明華文教育並不是華人性唯一必須的基礎，華人家庭的生活方式同樣能維繫華人性，也就是維繫某種可以相對多數華人家庭共享的文化資源，其中最廣泛的無非是都透過遵循中華文化及儒家思想來實踐民族身份。

從馬來民族的角度去看馬來西亞華人，他們也會把華人與儒家價值觀結合，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曾說，華人在日常生活中貫徹儒家價值觀，這些價值觀中，有很多被視為良性的價值觀，令華人擁有能協助他們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性格。³²這樣的華人性，便是強調能與土著民族區隔的華人識別，並不注重在區隔時所借用的文化資源，是否潛在地與更大範圍的華人社群是共享的。

第三節 馬華的「華人性」

在馬來西亞華人常有眷念中華文化，強調中華文化的悠久綿延，從中華文

³² 《南洋商報》，2001，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在《南洋商報》發表一篇文章，〈儒家價值觀陶冶華族學生比馬來學生優秀〉，4月19日。

化中尋找精神慰藉，而且有它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同時可以被分為這是文化歸屬與文化延續。何啟良就認為，馬來西亞華人不但應該承認中華文化的正當性，而且必須認真探討其的歷史、途徑、與形式，以能在自家的傳統中也是自己最熟悉的文化根源裡，去尋找引導馬來西亞華人未來方向的可能答案。但是何啟良又認為，把中華文化無限放大，相等於馬來西亞文化，實有不當之處。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其中必須思考的是：一個是中華文化的主體以及它和馬來華人文化之間的血肉聯繫；另一是離鄉背井後對在本地（馬來西亞）的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歸屬問題。後者關注的是差異性與在地性，具體探索的是馬來西亞華人性（Malaysian Chineseness）的課題。³³

另一種說法是華人的「中華性」（Chineseness）即是「華人性」。王賡武認為（Chineseness）是一個有生命的並且是一個變動的概念，同時也包含了非中國人如何看待中國的意識。因此，Chineseness 概念的重要性在於那種非同凡響的延續性，它隨著世代的推移，使這個文明的特徵日益顯著。³⁴按照王賡武的概念，華人性具有一種「遞移」的可能性，雖然 這個華人後來的身分內涵未必和最初的認知一樣，且其他因素的加入使華人性的概念開始改變，可能是強化，也可能是弱化。

王賡武在東南亞華人研究當中的地位崇高，不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很久，研究發表的著作極為豐富，是公認的華人研究的翹楚，其本人更是此領域重要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對象。他在訪談中表示，海外華人的文化中國觀，該被稱之

³³ 何啟良，1999，《文化馬華：略說馬華文化認同的困擾和復歸》，十方出版社，頁 33。

³⁴ Wang Kang Wu, 1991.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馬來西亞的華人的中華觀從其文化歸屬而得以延續，難以稀釋掉的就構成了中華性。華人學者對自身的「中華性」（又可解釋為華人性），都會加以反省檢討，尤其在研究馬來西亞華人課題時候，包括王賡武、廖建裕、何國忠、何啟良等，都追蹤整理，以求能細膩的整理華人的身份認同、文化、情感的多種樣態，並依照其自身的經歷與選擇，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定義及解釋。這也是一種對華人性研究的途徑。

另一方面，就如王賡武所述，馬來西亞華人本身就分了好幾個集團，但是這些集團都有著各自的生存之道，而他們的華人性內涵當然不能固定，不須要刻意去主張哪一個集團的華人其華人性為何，然而總是有某種共享的文化資源，使他們能夠適切運用自己的華人身份，如何在民族與公民兩重身分之間折衝。換句話說，華人性不會完全受制於國家的身份政策所，更不會因為沒有某種固定的中國傳統就會導致華人性褪色。華人性的多元脈絡及其間潛在的共享文化資源的調動能力，才是華人生存的基礎以及維繫民族文化的機緣所在。

第四節 馬華的身份 建構 - 故鄉、他鄉、離散

各地華人的身份認同，不能用三言兩語輕易描述，只能追蹤華人歷史脈絡

³⁵陳昌宏，2011，「華裔離群的華人性研究---比較新加坡東亞所的王賡武、黃朝翰與鄭永年」，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發行。

來重現。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認同建構基本上有三個階段，而早期華人還是僑民的時候，都視中國為故鄉。華人最早是透過「故鄉」的概念而產生情感，經過數百年來的演變下，直至今日的中國成為「他鄉」。因此，在馬來西亞華人學者何國忠的研究指出，獨立以後，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的時事開始疏遠，現今的有超過 90% 的華人是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他們對中國時政毫無興趣，也覺得是與自己不相關的範圍。³⁶畢竟在 1957 年馬來西亞獨立後，馬來西亞華人已經放棄中國國籍。早年，馬來西亞政府甚至限制華人訪問中國大陸探親或旅遊，當時也是由於中國還未進入改革開放時期。

獨立之後，華人在馬來西亞已經落地生根，對中國開始漸漸形成一種離散的情感，但是他們對於家鄉有種獨特的情感，而且政治疏遠並以不影響有限的貿易和經濟來往。馬來西亞人訪問中國大陸的限制延續到 1989 年後，馬來西亞政府和平解決馬來亞共產黨叛變問題後才取消。除了政治問題之外，1969 年的 513 事件影響所及，為了避免其他種族的猜疑，馬來西亞華人對涉及中國的課題上都保持沉默。以上這種種因素，說明了馬來西亞華人取得公民身份是政府的政策，但華人的沉默也不足以證明華人性遭到弱化。華團、華人媒體仍是關注華人社會、華文教育及中華文化在馬來西亞的發展。

當時，因對中國保持沉默的時間也變長，漸漸地形成離散的一群，馬華作家李有成³⁷於是借用了離散的概念，他認為離散的現象肇因於存在著兩個「中

³⁶何國忠，2002，《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華研出版，236 頁。

³⁷李有成於一九九二年發表的〈漂泊離散的美學：論《密西西比的馬撒拉》〉，咸論是國內學界最早的離散論述。Diaspora 一詞的中譯，也從「漂泊離散」變成「離散」。這個更動頗值得注意，因為它意味著，在我們的語境裡，diaspora 這個詞彙在轉譯過程中，從不穩定到趨於穩定。Diaspora 作為一個文化術語，在過去多年來，其實存在多種不同的譯法，隨手拈來，即有「離



心」。他亦認為中國是離散的始源，他提到家國包括了家園、部族、國家或國族國家等。另一個則是居留地，也就是離散社群賴以依附並形成網絡的地方。離散介於這兩個「中心」之間，擺盪在 Clifford 所指的「根」(roots) 與「路」(routes) 之間——「根」屬於家國，屬於過去與記憶，屬於有朝一日可望回歸的地方；「路」則屬於居留地，屬於未來，導向未知。馬來西亞華人的民族主義在兩個「中心」中做抉擇，其中一個中心是「原鄉」，有著深厚的鄉愁，如果從文化去解釋「鄉愁」，可以說是一個民族離開了自己的文化故鄉與童年成長的土地後，毫無保留地體現了內心深處的「流寓」與「漂泊」在異鄉的感觸。儘管馬來西亞華人在改革開放前被中國「拒以門外」，加上在自己居住的國家也不允許「親中」的表現，可是，他們對祖先的祖國那份「原鄉」的情感並沒有遺忘。中國開革開放後，在僑務的推廣下，馬來西亞華人積極參與文化事業，包括馬來西亞的華團、華商、華人都參與「祭祖」、「尋根」，作為介入中國文化及經濟的發展，而且中國政府也鼓勵華人到中國去投資、旅行等，以維繫祖先的「祖國情懷」。這也透露了華人本身對祖先的情感大於一切，正如王賡武所言，華人的概念原生自「家鄉」，意指「祖籍」，許多華人家庭都留著祖譜。³⁸王賡武指出這是一種很自然的狀態，因為馬來西亞華人的祖先都是從中國南下馬來亞，當時後那些南下的華僑都是一心只有著對中國（祖國）的懷念。至今，在馬來西亞華人的社會仍是以籍貫區分為廣東人、福建人、潮州人及客家人等，且因籍貫的不同都會說著各自的方言，同時在馬來西亞不同的區域也形成了不同籍貫的人居住。不過在國族的建構上，不管來自哪一個祖籍的馬來西亞華人

散社群」、「海外散居族群」、「流散」、「流離」、「流移」、「流寓」、「飄洋過海的華裔」等處理方式。

³⁸ 王賡武在接受人物訪談時如是表示。筆者於 2014 年 6 月 10 日親自拜訪王賡武，後者接受訪問時對於馬來西亞華人回應中國夢，並對於「家鄉」的概念作出解釋。

皆以華人為統稱，不過在政府的身份定位是以非土著（Non Bumiputera）相稱，意思是「非大地之子」。



回溯華人歷史，從最早期的馬來（西）亞華人就對於身分認同很模糊，而且也沒有身份認同的概念，據廖建裕的研究「自我認同」與「他人賜予的身份認同」對於一個族群的「身份」是重要的。在殖民時代，「海峽華人」的稱謂比較受土生華人歡迎，這是由於當時是在英國殖民時代，「海峽華人」在殖民社會中高人一等。可是殖民時代終結後，上述這個稱呼就過時了。過去，人們只用 Baba，Nyonya 以及 Peranakan 這些文化性而沒有政治意味的字眼。³⁹現今留下的是族群的分辨即馬來人（土著）、華人（非土著）及印度人（非土著），形成現今的馬來西亞族群分配的版圖。

早期華人移民從事採金礦、修鐵路，同時也為當地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的歷史不僅僅是海外華人的歷史，也是所在國歷史重要的一部分。雖然海外華人都是為了保護祖先的歷史與文化。一直是遊走在民族邊緣的馬來西亞華人，在馬來西亞未能獲得公平對待的同時，單靠著經濟的力量來維護在這個國家的位置及文化，並仰賴經濟的實力來支撐著社會地位及維護民族的尊嚴。自 80 年代開始出現東南亞經濟奇蹟，展現了當地華人經濟能力的擴張，進而也就與中國的關係更為密切，加上中國大陸的對海外華人的態度及政策的轉變，使得華人的民族主義再度被召喚，尤其是對中國的原鄉情感再度激起的可能性值得探索。基於這份情感是抽象的、是想像，同時又會受到各種因素而變化，而且無法用

³⁹廖建裕於「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百年」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之論文有關新馬華人的身份見解，該場研討會於 2003 年 11 月 22 至 23 日舉行。

數據來證明這份情感的深淺。何國忠在討論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認就強調，馬來西亞華人這個身份出現了兩種互相區別而又有聯繫的指涉。「馬來西亞人」是一個政治身份，而「華人」的屬性又和文化息息相關。從政治上來說，華人的身份當然可以在馬來西亞和中國之間一分为二，但是從文化上來說，華人知道這樣的身份指涉著一個延續意義的符號。問題也許還更為複雜。「馬來西亞華人」作為一個文化身份，其文化的積累既有中國情感也有馬來西亞特色。⁴⁰

壹、馬華的中國認識

馬來西亞華人對於中國的情感及意識，不但沒有隨著「二戰」的結束、日本的投降而消退，反而變得更為強烈，特別在政治上表現得尤其明顯。這一政治的民族主義意識在 1930 和 1940 年代達到了高峰，因而引起殖民政府和原住民政治領袖的密切關注。當政治上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極度高漲的時刻，文化上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逐漸被新馬華社群擱置一旁，加上基於當時馬來亞獨立，華人逐漸成為公民。隨著二十世紀反殖民浪潮的主旋律，中國民族在政治上的自決自主及自新自強才是馬華期盼的焦點，新馬華社對祖國的統一、解放堪稱亦步亦趨。但是，局勢的發展使新馬華人在高度關注祖國（中國）興衰的同時，也必須為華人在南洋的命運多加思考。在地原住民的民族主義運動迫使他們不得不在思想上、行動上有所調整。

王賡武就此做出提醒：「華人對本身的認同意識是可以因事態的變化而改變的。」1950 年以後，華人的認同概念轉向國家、村社、文化、種族和階級認同。部分華人認同原住民的民族主義運動，隨著世界反殖民主義的浪潮支持新

⁴⁰ 何國忠，2003，《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文化篇－承襲與抉擇》，華人研研究中心，頁：XXVII-I。

興民族國家的建立，試圖推動立法保障華人的權益。作為東南亞華人社會中的特例，馬來亞華人社會普遍上願意放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而代之以新的馬來亞國家認同，但同時又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村社認同，來維護這個社會集團在國家中分享權力的資格。華人領袖保留某些作為華人的歷史認同，並且力圖使這種認同的文化特色得到確認，成為複合的國家認同，亦即整體的組成部分。⁴¹

王賡武一直強調的一點是，「中國民族主義認同」在東南亞早已式微，就算不是在實際上完全滅亡的話，也正在大多數國家內趨向消亡。他認為雖然其復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機率渺茫。傳統的「歷史認同」則由意義更為廣泛且更為有用的「文化認同」概念所吸收，而「文化認同」是上述所有概念中最為靈活的，可是若把種族、血緣作為認同的決定因素的人來說，文化認同並不那麼有用。⁴²然而，對於很多致力於保護早期移民遺址的華人來說，全世界的華人都有著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背景，古老的早期建築則寄托著一種濃厚的情感。在他們看來，這些歷史的建築、華人習俗的保存，不僅能宣揚文化傳統，也能幫助後代人了解當時華人的生活、緬懷祖先的奮鬥史。

無論如何，馬來西亞華人目前對於中國的認識，並不再是「現實的中國」，而是「想像的中國」又或者是「經濟中國」。不管是政治還是現實的中國已經離他們很遙遠，在 1949 年中共建國之後，由於身在反共陣營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版圖裏頭，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無可奈何地被切斷了前往大陸之路（這條路四十多年後才由目前的首相馬哈迪重新打開），在這四十多年的歲月中，他們只能憑

⁴¹王賡武在訪談中強調華人對於自身的身份的變化，隨著環境、文化、國情的變化身份也會隨之而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⁴²王賡武亦強調了今日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認同，在訪談中點出其看法。

自己的記憶以及想像去建構本身的「中國形認識」，以滿足個人以及集體的文化鄉愁。



如果從中華文化的視角去檢視，文化對於一個民族而言是靈魂，那麼語言更是一個文化的根，失去了根，民族文化恐怕也就蕩然無存了，就如印尼華人與泰國華人的例子。著名的海外華人學者潘翎曾說，在瞭解海外華人，特別是在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心境的路標上。對於一個民族失去了本身的語言，會讓一個民族相當失落。譬如印尼及泰國的華人，在同化政策中放棄了華文，連名字也分不出是華人還是當地人。雖然他們也未必能夠擠入主流社會，可是他們卻永遠地失去了自己的母語。⁴³老一輩的華人與新一代的華人對文化鄉愁的認知有一定的差別，新一代的華人不能進入老一輩華人鄉愁的語境，這也說明了新一代的馬來西亞華人身份是在文化意義上的再建構，而非血統性的。這建構性的身份將華人定位為一個有自己的文化、傳統習俗的群體，因此打破了老一代與新一代之間的差異，如此的華人性是流動及隨著文化資源作調適的。

海外華人的民族認同與中國的崛起是有著正向關聯，因此才會使得許多學者在研究海外華人與中國的關係時，都會指出新的可能性，例如他們的研究概況華人與中國的關係是文化、是經濟等。尤其是在 70 年代末期，中國改革開放才開始，海外華人就有意識到中國的崛起對海內外的多少會造成某程度上的影響，於是也關注到中國外交和內政的關係逐漸變化。這種變化與海外華人群體自身的兩大主要變化密切相關：

第一、隨著越來越多的華人獲得當地國籍，東南亞及世界其他國家海外華人對

⁴³馬侖，2000，《新馬華文作者風采 1875～2000》，新山：彩虹出版社，頁 250。

其居住國的政治效忠得到鞏固，擁有資金和管理技術的海外華人成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同其他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關係的有利因素；

第二、中國赴東南亞的新移民的出現，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中國全球化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這也隨之對現有的政策帶來新的挑戰。⁴⁴

因此，研究東南亞華人的劉宏發現，海外華人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隨著中國逐漸成為亞洲主要力量及其在國際舞台上的崛起，海外華人的作用將更為複雜而多元。伴隨這一趨勢，一些東南亞國家中出現了「再華化」的趨勢，即華裔公開推崇中華文化以及自己的華人族群身份，並同中國建立各種類型的聯繫。這和他們的前輩在二、三十年前隱藏自己的華人身份或只能私下進行華人文化活動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⁴⁵

貳、馬華身份認同的意識

華人對於身份認同的變化，不排除是從對中國認同到轉移其他的層面，在轉移的過程種這可能是從歷史、文化上開始的。當中的變化可能有著自我殖民、自我邊緣、自我認同。而接近兩個世紀以來，都是華人移民潮非常盛行的世代，如今，馬來西亞華人不是經歷過國共內戰的那批人，也非英殖民時代的華人，對於中國或者馬來西亞的認同還是需要從文化與身份去定位。最早期有華僑有如僑領陳嘉庚雖身處南洋，但一直心繫中國，積極支持中國國內的革命活動。他結識了孫中山，在 1910 年加入同盟會並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

⁴⁴瀏覽：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webmanager/wkfiles/8041_1_劉宏，《海外華人与崛起的中國：歷史性、國家與國際關係》，2010 年 8 月 10 日。

⁴⁵劉宏，2000，《中國東南亞學：理論建構、互動模式、個案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頁 1-33

辛亥革命後，陳嘉庚擔任福建「保安會」會長，籌款支援福建，穩定了當地局勢。陳嘉庚當年對於文化事業，也是積極支持。他支援了范長江、夏衍等人主辦的「國際新聞社」和《華商報》等，還匯款支持鄒韜奮復辦《大眾生活》周刊。⁴⁶

如今，馬來西亞的傑出華商如陳凱希、張曉卿、陳凱希等人，從他們身上可以觀察出個人與國家之間不是二元的分岔路，他們往往不是取經與成就於西方，最終回歸並奉獻馬來西亞，但是他們對於中國確實是一種文化與經濟並存的概念。就如從伐木業起家然後到中國投資，同時並擁有買下馬來西亞與香港的華人媒體，其試圖要建立的就是大中華媒體王國。目前擔任世界華人媒體集團的執行主席的張曉卿，不管是在中國投資的企業（經濟）或者文化（媒體）上，均充分的展現其華人意識，稍後將進一步介紹。當然，在華人性積極面之外，對於華人本身的出生幾乎完全沒有印象，更無集體記憶的華人，即使在馬來西亞也有，不過總體而言，重新開始挖掘自身的華人性，同時自發性的認同自己華人的「根」的，又多了起來。

被視為「外來者」，又無法與主流族同等的馬來西亞主流族群心中都有一個「他者」，各種差異分得日趨清楚也就是成了一個民族的符號與政治的符號。固定的身份是否讓華人能夠踏實的生活在一個多元族群的馬來西亞？華人本身是否讓華人文化在地化後，成了文化融合？王賡武就認為華人在進行文化調適的過程中無實質可言。還能一直在設法應付全球化，其結果多數華人對其文化的

⁴⁶陳嘉庚，1979，《南僑回憶錄》，香港：草原出版社。

哪些方面需要保持，哪些需要放棄，都表現的相當變通。⁴⁷作為馬來西亞的華人如何認清自身的文化、民族及「他者」的不同，是需面對的現實問題。這種經由省思並重新調動各種文化資源，以便與更大範圍的華人群體進行想像的連接，可以稱為後華人性。

顏清煌則相信馬來西亞的華人歷史是不會輕易中斷的，國家史中仍可保留華人史，例如社會史、婦女史，各有獨特之處，這是無法消融的民族、社區或性別的歷史。有鑑於歐美澳第三或第四代華人受英文教育，甚至完全西化者也不乏其人，曾任南澳中華會館主席 8 年的顏清煌關切的，在於海外華人該如何維繫新一代對文化傳統與價值觀的認同與承傳，他解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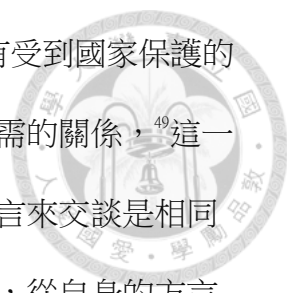
可以通過開辦華文學校或週末班達到文化傳統的命脈傳承，這有賴於整個社群形勢，如果社區華人太少則不容易開辦，澳洲華人畢竟不如新馬一般強勢的人口，容易互動，無論如何父母可以通過身教口授盡量保存文化傳統。⁴⁸

第五節 馬華的「幫」及「方言群」

在復興中華文化之餘，馬來西亞華人一直對「幫」及「方言群」極為看重，這點極有可能是如顏清煌解釋的華人自我保護的形式抑或是自我封閉的型態時，特別提及了「幫」或「方言群」。馬來西亞華人怎麼去建構自身的民族概念多少也是因為「幫」及「方言群」的存在，因此，必是讓華人們回到歷史的

⁴⁷ 王廣武，2002，《南洋華人簡歷》，水牛出版社，頁 214-215。

⁴⁸ 顏教授在馬來亞南大校友出席一場講座，題為「海外華人商業研究的反思」提出其看法。顏教授認為海外華人商業的蓬勃發展離不開特定的經濟和政治因素，而從儒家中心思想「禮」與「仁」中衍生出來孝道、忠於職守、家族主義、相互的責任、敬老敬賢與和睦共處等觀念，即影響海外華人商業行為。



時空中回溯，「幫」或「方言群」是華人離開故土後在異鄉沒有受到國家保護的情形下形成。顏清煌認為「幫」與「方言群」的存在是一種必需的關係，⁴⁹這一點，與華團領袖在他們的活動上都會以中文或者他們本身的方言來交談是相同的道理，也是維繫族群關係的必要。這也是一種保留文化的根，從自身的方言作為復甦及延續文化的燎原，當時在馬來（西）亞能夠不完全喪失自身的民族認同及建構，也是因為華人們都能夠說出自己祖先的籍貫及自身的方言。而一般馬華在馬來西亞國內遇到華人的時候，習慣性的問對方是什麼人？可見，方言群（籍貫）是馬來西亞華人對身份的最初認同。這亦是在陳志明的研究中，提到了另一種對「方言群」的功能，馬來西亞華人佔了馬來西亞國民的總人口的 28%，儘管他們都認同自己為「華人」，但是他們更認同他們自己的方言體，如福建人（閩南人）、客家人、廣府人、潮州人、海南人、福州人等。方言群更有認同歷史的延續性，不過，這些認同也隨著他們的本土經驗而改變，同時形成了新的本土華人認同。⁵⁰因此在陳志明是從語言的認知來探討華人認同，說明了華人的認同是反映出作為中國移民的後裔歷史的延續性，而地方性變化是生活於馬來西亞社會的調適結果。⁵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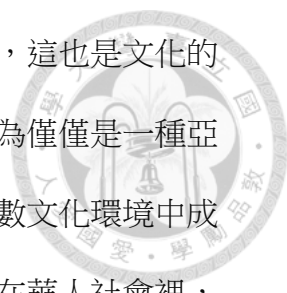
就如上一節所言，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的意識，也是從「鄉」的概念或者意識開始，因以前都是會說去中國大陸稱為「回鄉」。王賡武認為海外華人只有「鄉」的概念，有故鄉的文化、故鄉的語言，他們的共同看法是，馬來西亞華人文化也是從故鄉的文化方言形成的。

至今馬來西亞華人身份還是保留「籍貫」（可以解釋為源自鄉、方言群）意

⁴⁹ 李恩涵，2003，《東南亞華人史》，五南出版。

⁵⁰ 陳志明，2012 年，《遷徙、家鄉與認同——文化比較視野下的海外華人研究》，商務出版社。

⁵¹ 同上。



識，也因藉由祖籍形成了方言群，進而形成華人對方言的掌握，這也是文化的一個面向。但這種透過方言的傳承而形成祖籍認同，可被解釋為僅僅是一種亞族群體認同，人們可以選擇不強調。好比一個檳城閩南人佔多數文化環境中成長的廣東人，可能閩南話（福建話）會比廣東話說得好，所以在華人社會裡，在華人之間一般不會強制某人聲明其方言的認同。因此，認同其實具有各種不同層級，允許人們情景的選擇認同。⁵²其中最大的公約數，仍是華人，故不能忽略的是馬來西亞華人的特殊性，他們是經歷了生活在殖民地資本主義制度下，同時面對馬來政權或多或少抱有畏懼或差異的心態。大部分馬來西亞華人都覺得自己愛國（馬來西亞），但他們在面對自己的族群是少數、是弱勢的同時，就會明顯出現分離感，對中國的認識已經是疏離，而對馬來西亞因為宗教及種族的不同，華人作為一個「他者」在身份認同上，比較直接的分歧及差異。

壹、華人身份變化的探索

本節將持續探索馬來西亞華人身份的變化，華人如何建構自身的身份認同除了從「幫」與「方言群」之外，本節將以歷史資料作為參考，從歷史視角去檢視華僑到華人這個身份的轉化，努力的超越「他者」或淡化「他者」，進行調適及轉變，產生了多元、雜匯來適應，就像在交談中除了會說自身的方言外，還會在交談中加入馬來語，這種對語言的運用既是一種對身份的認同，也影射一種階級的觀念，當代華人性是鑲嵌在這兩者中而存在。

⁵²陳志明，2012 年，《遷徙、家鄉與認同——文化比較視野下的海外華人研究》，商務出版社：頁 101。

馬來西亞華人對於國家的認同，在不同的時期會受到現實狀況影響而改變，當中主要因素是受到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的影響。顏清煌曾在崔貴強的《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1946—1959》「序」中提及，華僑演變為海外華人的過程中，各種因素錯綜複雜。戰前華人不太團結，常有個人或社團的利益衝突，對本地的認同也相當薄弱。⁵³戰後，華人分派，有親共也有親台的。崔貴強則進一步指出東南亞華人史中不能全面引述馬克思史觀，因馬克思對於歷史是過於強調必然性，壓低人的能動因素。華人史固然可以預測歷史的大方向，可是仍舊潛藏着人的因素，所以說歷史有其必然性與偶然性。換句話說，有革命形勢不等於有革命，還須加上革命者的領導、分配與整合。⁵⁴

顏清煌的看法是既然歷史有其必然性與偶然性，則身處歷史大洪流中的每一個人，都面對時代的必然性與偶然性，身在可為與不可為之間。顏清煌曾指出他最欽佩的人物是陳嘉庚、陳六使與李光前；但隨着時代變遷，華人社會似乎越來越缺乏這類大老闆型、魅力型、大氣魄、民族大義並有巨大影響力的領袖，同時報章媒體扮演着重要的教化作用。⁵⁵

值得探索的是，作為新馬華僑領導人的陳嘉庚，當年是為了挽救中國而與商會共同努力抗日，他體現的是對中國的愛國主義，心向中國，當時他創立《南洋商報》，積極鼓勵民眾抗日，陳嘉庚當時抱持的心態是為振興中華而不悔，他一心要護的是華族之根（文化之根）。

⁵³ 崔貴強，1990，《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1946—1959》，新加坡：南洋學會。

⁵⁴ 崔貴強，2007，《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1946—1959》，新加坡青年書局。

⁵⁵ 顏清煌，2002，《清朝鬻官制度與星馬華族領導層 1912-1977》；參考顏清煌的「海外華人商業研究的反思」，南大教育研究基金會出版。



不過，後期到馬來西亞的華人選擇落地生根，他們維護的是文化之根，華人有此舉是為了延續及傳承中華的文化，是對於當時的中國一種民族認同。當下的華人是別於陳嘉庚當年的愛國主義，如今的華人的愛國是愛馬來西亞這個國家。自 1957 年獨立之後，馬來西亞出現「華人」這個身份，也就形成了當時的戰後及至獨立是華人認同的一個分水嶺，1960 年代及 1990 年代則是另外兩個階段的轉折。獨立之前的文章，一般習慣以「中國人」、「中國姑娘」、「中國小夥子」作為新聞人物的身份認同，獨立之後則大量出現「華人」這個詞字。後期的華文媒體反映了這一的趨勢，無論在文字運用或意向運用等方面，都漸臻成熟，漸漸的沒有所謂的中國印象，直接而完全地投入馬來西亞生活，文章中不存留一絲中國印象。

貳、民族與公民之間抉擇

在馬來西亞，華人在身份上處處受到提醒，在認同上出現民族與公民之間的抉擇。馬來西亞華人在當地的處境，就是身份跟文化都是趨向「邊陲」又或者說是「邊緣」。何國忠指出，相對於經濟、在思想、學術、文化的藝術領域，馬來西亞華人的表現，卻是乏善可陳。當前的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仍屬於中華文化舞台的邊陲地帶，仍未能主動而積極地介入到「中心」運作。⁵⁶

何啟良的解釋是，「馬華文化對西方高層文化的『免疫』和『馬華』知識界只有中華文化的體認，卻缺乏馬華文化的分析」，道破了馬華文化的困局和停滯，其間對西方和中華文化的認識，要麼「免疫」，要不就輕易祭出中國文

⁵⁶何國忠，1993，〈邊陲的馬來西亞華人文化〉，《今我來思》，吉隆坡十方出版社。

化 5 千年的「大話」，其實所知甚淺。⁵⁷他認為，馬來西亞華人只有中華文化有體認，尤其是華社眷戀中華文化，強調中華文化的悠久綿延，對中華文化中尋找精神慰藉，這種願望可以理解，而且其有不可以忽視的意義，華社不但該承認中華文化的正當性，而且必須要探討它的歷史、途徑、與形式，在自家的傳統中也是為自己最為熟悉的文化源頭裏，去尋找引導馬華社會未來方向的可能答案。但是他也批評，把中華文化無限放大，相等於馬華文化，實有不當之處，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一個是中華文化的主體以及它和馬華文化的血肉聯繫；另一個是離鄉背井後面對本地的馬華文化歸屬問題，後者是馬華性（Malaysian Chineseness）。具體的說，就是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中，華人都是從中華性才衍生了馬華性，並保有某種中華文化的本質。⁵⁸何國忠在後期的研究中同樣講述了華人對於中國文化以及自身的身份認同，到後來面對的困境，並在這困境中的轉變而已有了莫大的變化。⁵⁹

何啟良指出華人身份中已經出現變異，他表示馬來西亞華人是從文化中國到文化馬華，同時也認為馬華文化這個「邊陲」處境大概不是短期之內可解決的，但是作為一種挑戰，它畢竟是馬來西亞華人走向未來必須面對的問題。⁶⁰因此一「邊陲」的因素所致，世世代代的馬來西亞華人都在公民與民族之間作抉擇，隨著時間、時代、世代、政治、政策之間的變化，而對於民族的認同總是

⁵⁷何啟良，1999，〈文化馬華：略說馬華文化認同的困擾與復歸〉，《文化馬華：繼承與批判》，吉隆坡十方出版社。

⁵⁸何啟良在接受筆者口述訪問時，解釋馬來西亞華人對於中華文化的體認。

⁵⁹何國忠，2006，《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頁 236。

⁶⁰何啟良在口述訪談中，回應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並引述其著作《文化馬華》作為一文中提到了馬來西亞華人對於中華文化，到文化馬華的一種身份的轉折。

存在微妙的變化因子。王賡武教授在《中國及海外華人》中提到，「華人對自身的認同的意識，會因為事態的變化而改變」。中國的事態發展加速了海外華人的認同改變，比如文化大革命曾徹底粉碎了部分心懷中國情意結的華人認同傾向。不過在整體上，華人在文化認同方面卻始終堅持其文化的認同及展現其華人性的一面，這也是華人認同議題中最複雜、最矛盾的層面。

然而，複雜歸複雜，我們必須在宏觀的脈絡下看中國崛起，以及崛起後對東南亞華人的影響。習近平提倡的「中國夢」，再度讓馬來西亞華人的民族、文化、華人性再度「復興」？是否造成衝擊？強化了內在的雙趨矛盾？又或者是基於華人在當地的因素而華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再度被激起，進而促成了從不同世代的華人對中國是有著不同的傾向與想像。第四章將會檢視華團領袖的中國想像及接觸中國夢後的回應，他們的華人性是否會出現變化。另一方面，中國夢釋放出來的是民族復興的概念，華人如何在民族及公民身份之間折衝，喻示了他們在中國與馬來西亞之間的折衝。

中國在近年來經濟突飛猛進，華人世界都對於這次的崛起抱有各種的想像，或許被看成是經濟的新契機，在馬來西亞華人媒體最初對中國夢的想像，似乎離不開經濟或商機的想像，如馬來西亞《東方日報》的一篇報導中指出：

中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傅瑩說，「中國夢」其實惠及亞洲其他國家，

因為彼此關係唇亡齒寒。在 2012 年，中國對亞洲的各種經貿表現，包括

中國去年為亞洲發展貢獻 58%，中國與亞洲經貿往來達 1 兆 3000 億美元

（約 3 兆 9000 億令吉）超越了中國對歐盟及美國的經貿往來。中國 770 億

美元（約 2310 億令吉）的海外投資都在亞洲。進而，中國已成為馬來西亞、

越南、日本和韓國最大貿易伙伴，8300 萬名出國旅游的中國人，90%是前往

亞洲國家，尤其是馬來西亞、泰國和韓國。⁶¹

就上述的龐大貿易數據，足以讓各國與中國崛起有著共享富裕的趨向，不管是否海外華人有著對於中國潛在的認同傾向。



第三章「中國夢」的想像

——馬來政府與華人媒體

前章引介若干對華人身份認同與變化的研究，學者以「華人性」的概念描述其間的多元與紛雜，但是對與再華化所仰賴的機制較少著墨，因此多數不討論共享文化資源的策略性啟動。本章進入到華人與馬來西亞政府在接觸「中國夢」後的反應及想像，間接呈現這種策略性啟動的可能路徑。馬來西亞與中國建交 40 年來，馬來西亞政府對華（中國）政策，從原本雙方互不往來，演變到後來的官方交流，至今兩國人民密切交往，馬中關係明顯躍進。有如此的轉變，與中國崛起及習近平上任推動「中國夢」政策有正向的關聯。在馬來西亞無法避免中國影響力日益外溢的情況下，「中國夢」反而促成了馬來西亞政府與華團對中國崛起的雙趨情感——既是一種期待，也是一種威脅。馬來西亞政府對中國崛起的期待建立在經濟利益與安全考量上，然而中國崛起也喚醒馬來西

⁶¹ 《東方日報》，2013 年，〈實現中國夢亞洲各國攜手共進〉，6 月 4 日。

亞華團的中國情懷與祖籍記憶。由於馬來西亞政府身為國際關係的行為者，可直接回應「中國夢」，故本章在分析時採用官方文件；而華團主要透過華人媒體回應「中國夢」，故分析時首先採用《南洋商報》的報導，本章以下分析《南洋商報》對「中國夢」的回應。至於華團領袖個人對「中國夢」與華人學者對「中國夢」的具體回應，則進一步放在第四章整理分析。

本章首先介紹習近平上任前的馬中關係（－2011）背景，聚焦於兩國關係未能正常化時期。其次討論習近平接任中國國家主席後（2012－今）的馬中關係，包括習近平接任中共國家主席後，如何在海外積極推廣並詮釋中國夢，以及其間國際格局的變化。接著，本章分析馬來西亞國內形勢的因應情況，整理馬來西亞官方的回應，特別是對內與對外的華人政策有何轉變。最後，則是華人媒體即《南洋商報》在習近平訪問馬來西亞時表現的積極回應，無可否認的透露出，在接觸「中國夢」的論述後，商報已強化其華人身份的認同。

第一節 習近平上任前的馬中關係

近年來，中國經濟崛起帶動的全球及區域政經秩序重組，使海外華人迎接「中國崛起」的浪潮之外，中國也觸動了美國與日本之外的東南亞國家，透過歷史與族群的角度看待馬中關係。本文以習近平的就職將馬中關係分成兩個階段，廣泛的分析近代以降的這兩個階段的脈絡，第一階段是習近平上任前以胡溫時代為主；第二階段是習近平上任後積極推廣中國夢的時代。本節先談論的是習近平上任之前馬中關係的走向。21世紀初「中國崛起」的發展已經莫之能禦，致使馬中交流從陌生到頻密，但這樣的發展其來有自。最早，在馬中建交後，兩國不斷拓展和深化雙邊關係，給雙方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也為促進兩

國之間的繁榮與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就以馬來西亞第四任首相馬哈迪在任時期為例子，對中國崛起的看法似乎是歷屆首相當中最為正面，尤其在反美行動上一直拉攏中國政府，足以證明是與中國站在同一陣線上。馬哈迪企圖靠著任內提倡「亞洲價值觀」，並推動「東亞共同體」，抗衡美國。馬哈迪一直不斷的在公開場合讚揚中國，更指中國擁有強大的世界經濟地位，甚至中國被當作潛在敵人。美國不願意看到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威脅到其在經濟、政治、軍事上的世界第一的地位，並對此採取了拉攏其他國家圍堵中國的做法。⁶²

馬哈迪認為，對東南亞而言，中國崛起的經濟合作意義更大。其中原因是，他自己早期曾試圖向前蘇聯習，在失敗後，唯有轉向中國。根據馬哈迪的見解，馬來西亞與中國之間的經貿往來長達千年，當時已是世界大國的中國卻從未對外擴張，圖謀區域霸權。比較起西方文化的外擴性，中華文化卻不具有侵略性。他不相信中國會在世界稱霸，他又以馬來西亞華人移民史為例，世世代代的華人主要致力於發展經濟，而並無征服和統治當地人的意圖。馬哈迪為了向中國示好，於 1995 年 12 月舉行的第五屆東協首腦會議，更提出泛亞鐵路及東南亞路線的概念，這個概念即修建一條鐵路從馬來半島南端的新加坡，經馬來西亞，跨越湄公河流域的泰國、越南、緬甸、柬埔寨和寮國直達中國昆明。⁶³馬哈迪種種言論就是為了表現對中國大陸釋出善意，以及馬來西亞需要安全及利益上的盟友。

如前所述，馬來西亞領導人積極回應中國崛起的行為上，馬中雙方藉由安排領導人親自來往訪問鞏固關係，馬中關係便一直是建立在兩國領導人的互動

⁶² 《明報》，2014，〈馬哈迪批評美國圍堵中國〉，11 月 2 日。

⁶³ 《南洋商報》，2014，〈高鐵鞏固馬中關係〉，10 月 14 日。

基礎上，尤其可以馬來西亞領導人積極訪華為重要體現。舉例而言，1974 年 11 月中共副總理鄧小平應邀訪問了馬來西亞，1979 年 5 月馬來西亞首相胡先翁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到 1979 年底，馬中雙方政府間的各類代表團的互訪達 30 次。⁶⁴執此，馬來領袖在 90 年代不斷突出中國的重要性，單是 21 紀的前五年間，曾經訪馬的中國重要領導人就包括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李嵐清，而訪問中國的馬來西亞領導人更多，包括最高元首、馬哈迪、阿都拉巴達威、納吉、黃家定、林敬益等。⁶⁵不僅如此，馬哈迪在 1990 年期間，積極訪華高達四次，是馬來西亞歷屆首相中訪華最頻密的一位，兩國在許多事情上互相支援。⁶⁶

到了胡溫時代，馬中關係進入「不慍不火」的階段，兩國之間也沒有發展出任何的合作計畫及項目，似乎有關係「停頓」的現象，當時的馬來西亞首相阿都拉巴達威唯一對華的言論，即是於 2004 年曾公開表示的，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高層次的一個財富創造者。⁶⁷不能否認的是，胡溫沒有把重心放在東南亞，雖然當時北京以「走出去」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胡溫相較於之後的習李，兩者明顯的差異是，胡錦濤與溫家寶在 2002 年十六大就職後首年，所訪問的國家數量相對少了許多。在正式成為中國國家主席後，胡錦濤從 2003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4 日，先後訪問了北方和西部的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蒙古。並於此期間前往法國參加南北領導人非正式對話會議。而在時隔近 5 個月後的 10 月 17 日至 27 日，胡錦濤才再次出國對泰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進行國事訪問。其

⁶⁴ 《星洲日報》，2001，鍾錫金，〈馬中建交歷史回顧〉，8 月 15 日。

⁶⁵ 何國忠，2007，〈馬來西亞華團領袖與文化中國〉，Institut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2007,December).

⁶⁶ Poon Kim Shee, 200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hathir's China Policy: Economic Cooperation,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Ambivalence,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of Ritsumeikan University, pp. 59-79.

⁶⁷ 劉宏，2006，《中國的崛起與東南華人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前往泰國主要是因應了當時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⁶⁸溫家寶則僅到訪兩個東南亞國家，分別是在 2003 年 4 月末 5 月初和 10 月份前往泰國和印尼。⁶⁹



然而，胡溫時代的馬中關係如此一度似乎的「停頓」未久，卻以一場北京奧運會「點燃」了雙方的關係，重心是在華人社會重建了與中國的情感關係。馬來西亞華人從北京奧運看到並相信，「中國崛起」這股強勢力量必須重新認知及想像。「中國強大」、「中華兒女」再次出現在華人媒體的語境中，且在奧運聖火傳到馬來西亞時，一名華裔企業家說：「作為一位『炎黃子孫』，我的心隨奧運神火傳遞跳動。」⁷⁰「炎黃子孫」的字眼重新回到了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語境中。北京奧運被視為是中國外交政策上展現國力的舞台，馬來西亞官方也對北京奧運表示配合，青年和體育部長伊斯梅爾·薩布里·亞科布表示，馬來西亞政府全力支持北京奧運會以及奧運火炬傳遞。⁷¹更具體的說，北京奧運激起了「中國情懷」，當年火炬受到在馬來西亞的中國留學生和華人社團的熱烈歡迎，中國人與華人並肩同心，這種經歷貫串起民族集體的記憶與情感。

《南洋商報》見證了馬中關係得以超越胡溫對馬政策的過程。2010 年 9 月 7 日常非在商報撰文說：「中國在奧運中的成功不在于取得最多金牌，而在于激起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凝聚力。這現象再次印証不論中國發生什麼好的或壞的大

⁶⁸ 瀏覽：<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10/13/2720902.html>，2013 年 10 月 13 日。

⁶⁹ 同上。

⁷⁰ 新華網：www.xinhuanet.com，資料庫 2008 年 4 月 21 日，瀏覽於 2015 年 1 月 23 日。

⁷¹ 新華網：www.xinhuanet.com，資料庫 2008 年 4 月 14 日，瀏覽於 2015 年 1 月 23 日。



事，全球中華民族都會自動凝聚起來。四川大地震和北京奧運已凸顯出這現象。」《南洋商報》雖然已是華人報紙，但是這一次的言論卻以中國作為主角，相對早期在處理香港 97 回歸中國的新聞時，則是以馬來西亞作為主角。作為中國大陸影響海外華人的其中一項資源——華人媒體。在感受中國崛起後，華人媒體便介入了崛起浪潮，開始塑造中國圖像、中國形象，以促進雙方關係。因此，華人媒體的中國認識值得加以關注，而馬來西亞華文報業發達，檢視華文報紙對中國的認識是可行的研究方法，本文將以《南洋商報》的報導為例。根據李政賢對《光華日報》的研究，在諸多議題中，香港回歸與北京奧運是兩個同時涉及中國形象的事件，屬於對中國崛起的重要事件，他發現光華日報與南洋商報兩家華人報紙之間的差異，在於後者原本是以華人的立場看中國。

從媒體的積極表現可判斷，除了胡溫外交政策之外，了解馬中關係背景的重要民間基礎是媒體。本章稍後探討《南洋商報》對「中國夢」的回應，在習近平就任前，作為華人立場的《南洋商報》對中國崛起已經關注，在馬來西亞華人對「文化中國」與「經濟中國」之間的聯繫方面，提供了文字資源，字裡行間可發現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崛起後表現出的文化或經濟認同。就此觀之，建交後的馬中關係一直潛藏多變的「中國夢」意涵，但當時的「中國夢」是間接而未曾明言的，且也並不是習近平後來提出的「中國夢」。無論如何，馬來西亞華人一直都在重撿祖籍、文化記憶的碎片，最初是與中國親戚書信往來，藉以滿足文化鄉愁，近十年來尋根之旅變得頻密，馬來西亞華人積極的到中國探親，這也就是為了縫合原鄉失憶的文化缺口。所以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得到回應，並不是一個斷代的開始，而是長期潛在意識的表面化。

胡溫時代，馬來西亞政府對中國的態度同樣缺乏熱情，尤其是馬來西亞政府在胡溫時代對中國的交往漫不經心，甚至在溫家寶初訪馬來西亞就發生醜聞，在歡迎詞上失禮，在當日的歡迎儀式上的佈景板寫著「Istiadat Sambutan Rasmi Sempena Lawatan Rasmi TYT Wen Jiabao ke Malaysia」，中文竟然譯為「正式歡迎儀式，與他一起溫家寶閣下的正式訪問馬來西亞」。在場諳中文的官員如首相署部長許子根和中國來賓看到中文的歡迎詞都摸不著頭腦。事後才發現是負責單位使用谷歌（Google）把馬來文翻譯的華文製成佈景板。事件引起華社極為不滿，就連馬來亞大學華文學會也在報章上發文指責政府漠視華教：

大馬號稱是海外最優秀的中文教育搖籃，擁有最有規模的中文系，而馬大校內更建立孔子學院，再說首相署也不乏華裔官員，區區的布條翻譯工作卻依賴谷歌翻譯系統，漠視了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工作者與華文學習者。⁷²

兩國官方之間經歷四階段，分別從不建交、建交、停頓、回溫，到如今的積極回應的過程，不能排除的主要因素，雖然是中國崛起的影響力及其對華人所起的號召，不過，這樣的華人因素也起了制約的作用。即使制約作用並不是主要作用，但是其所製造的感受非常真實。根據維基解密的一則電文，對待華人的種族主義積習，影響了馬中關係：

2008 年 4 月 9 日美國駐馬來西亞副大使和政治主任設午宴招待中國駐馬來西亞副大使古京齊（Gu JingQi，音譯）與參贊陳峰。中國副大使在言語中略有不滿的表示，馬中於 2006 年簽署《防務合作諒解書備忘錄》（實際日期於 2005 年 9 月）後，有數名中國大陸的軍官在馬的國

⁷²星洲日報，2011 年 4 月 29 日。

防大學修課面對的問題即是所有大小事情，都務必經過馬來西塔政府高級官員的決定後才可執行，而中級官員更不會信任中國的官員，因為在馬來官員的眼中「我們是中國人」（華人）。⁷³



中國官員如此的抱怨是接待一方將對華人的身份歧視，延伸到了對中國官員的歧視。這個背景間接說明的是，胡溫時代馬中關係的低迴既凸顯了華人在馬拉西亞的邊緣地位，也成為其後他們回應中國夢的熱身。馬來西亞政府數十年來對待華人的政策不公，遇上中國以其強大實力對外呼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難免海外華人潛在內心的中國情感可能再次激發。本研究之後研究對象是華團領袖，涉及華團領袖的成長背景、教育、參與中國大陸的活動及他們的言論。華團領袖的特性在於，他們與新世代華人對中國的理解是不同的，因為他們經歷過國共內戰，成為馬來西亞公民之後，他們處理民族關係與情感的經歷極為複雜，介於文化、民族與公民的身份認同之間，出現原鄉、血緣、情感的多重想像，影響他們對中國的認識。

第二節 習近平上任後馬中關係

當世界各地開始將「中國夢」與「美國夢」放在同一個天平上加以比較，「中國夢」瞬間變成為全球關注的課題，尤其是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國家，中國的外交政策變成為焦點。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 2013 年闡述「中國夢」時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計中，華僑華人獨特的地位，且要共享中國夢。」他提到：「團結同一的中華民族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華

⁷³瀏覽 <https://wikileaks.org/cable/2008/05/08KUALALUMPUR410.html>，2015 年 6 月 5 日。

文化是共同的『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共同的『夢』。」⁷⁴



從美國學者的角度看，「中國夢」對外的影響力似乎偏向負面，就如美國華府知名研究中國的學者 David Shambaugh 顯然不看好持續壯大的「中國夢」，他認為強大的政權表象背後有其脆弱的各種問題。⁷⁵國際輿論怎麼看「中國夢」值得關注之餘，「中國夢」在實踐中對於習近平毋寧可以提高其形象及聲望，包括在對外僑務政策上，讓中國的軟實力在東南亞國家得以展示，與本文息息相關的是，馬中關係在近年進展迅速，雙方展開多項計畫，足以促成馬中關係升溫，雙方達成經濟及安全上的結盟。中國大陸於 2010 年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儼然成為全球性大國，亟需通過開展公共外交，增進世界對中國的信任了解與信任。十八大報告將公共外交提升到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僑務公共外交更成為工作的重心。⁷⁶

習近平訪馬（2013 年 10 月 4 日）期間，提出兩國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習更以馬來西亞諺語「切水不斷」來形容中馬傳統友好關係，而馬來西亞在被動的情況下，同意成為中國的戰略夥伴。

「中國夢」是習進平的「根、魂、夢」，中國在外交事務上相應擴展，尤其是在僑務方面，中國大陸近幾年對僑務工作不斷提升，促使海外華人成為建構

⁷⁴ 《中國夢與美國夢》，2013，天大研究院出版。

⁷⁵ 瀏覽：<http://www.wsj.com/articles/the-coming-chinese-crack-up-1425659198?tesla=y>，2015 年 3 月 6 日，“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2015/7/1.

⁷⁶ 范世平，2010，《中國大陸僑務政策與工作體系之研究》，臺北：秀威，頁 118。

軟實力的資源。⁷⁷中國積極的推廣僑務，其結果，在公共外交上，海外華人成為北京最大的資源，尤其是東南亞華人的口比率佔多數，而透過文化政治的途徑來整合中國外交政策，相對的即是從經濟實力到軟實力，包括文化及教育。這兩大資源的運用在馬來西亞則有阻力，一來是受到主流族群的政策影響，二來是華文教育相比其他東南亞國家更為完整，兩者卻均限制華裔族群在國家政體的發展空間。

馬來西亞國內華人面對的困境，當然不足以影響中國崛起下的馬中關係，而北京對僑務的工作隨之持續擴張，根據北京在「僑務公共外交資源」中的說明，可透過資源的性質概分為經濟、政治、智力、社團、教育、媒體六方面⁷⁸，這六點皆與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有正向的關聯，尤其是經濟資源、社團教育與媒體之間的角色扮演。可見「華人資源論」的基本假設就是從華人對中國的情感、文化記憶及文化想像，對中國的依賴及共享資源等入手。其實，這在早期就有蛛絲馬跡可循，早期的中國駐馬官員抵達馬來西亞後，一般都比較適應與當地的華人交流，主要是他們可以接觸華人官員或華團領袖，因血緣、文化、語言相同，相對馬來人卻有語言及文化上的差距。

習近平訪馬以求重新奠定馬中兩國關係，馬來西亞首相納吉便特別委任華裔為「對華特使」，以表示看重中國的「兄弟」之情。納吉亦認為中國政府提倡「中國夢」與馬來西亞政府擁有「2020年宏願」相通，馬中有着類似的發展目

⁷⁷湯鋒旺，2013，〈華僑華人與中國軟實力：概念、方法及理論〉，《東南亞研究》2013（1），廣州：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頁74。

⁷⁸陳琮淵、胡越云，2014，〈東南亞華人與中國僑務公共外交：文化政治的視角〉，《南方大學學報》，第2卷2014（8），頁110。

標，這一共同點增進了馬中互相信任與尊重。⁷⁹此外，納吉出席 2015 年博鰲亞洲論壇後，形容此次的訪問很重要及從中受益，亦深化了馬中雙邊關係，他希望馬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繼續獲得強化及有良好成效。納吉說，「這不僅是形式上（的會面），就個人而言，也讓雙方關係更強。」習近平則表示把維持馬中關係作為優先要務。⁸⁰中國安邦智庫（Anbound）認為，馬中雙邊合作關係應該進一步擴大至全民共享，尤其主流群體，而非讓這關係長久陷入「中國事務等於華人事務」的迷思當中。⁸¹馬來西亞主流族群確實比較少參與中國事務，一來是中國透過僑務外交的交流，當然非華裔就不納入政策範疇中；二來馬來西亞主流族群對華人還是有戒心，以下就淺析華人在馬來西亞難免會遇到的處境。

雖然兩國關係大躍進，馬中並以「兄弟」相稱，卻仍舊無法改變馬來西亞華人在馬的邊緣公民的地位，華人在馬來西亞國內的地位不能與馬中關係相提並論，政府對中國與華人的態度南轅北轍。主流族群依舊把華人視為「外來者」，例如巫統區部領導人主張華人「回」中國去的「寄居論」，曾引起全馬華人動怒，使得族群之間的關係一度緊張。星洲日報在 2008 年 8 月 24 日記錄到：

阿末依斯邁在競選期間為 巫統候選人阿力夏站台時說：「華人只是「寄居」

在大馬，因此不可能做到各族平等。…华人是否能夠平均分配財富給我們呢？

如果今天你居住在華人家庭，你相信他們能夠公平對待你們嗎？」⁸²

上述事件發生後，馬來西亞政府在朝野政黨的高壓下，將阿末依斯邁的黨

⁷⁹ 《南洋商報》，2014 年 6 月 1 日。

⁸⁰ 《南洋商報》，2015 年 4 月 4 日。

⁸¹ 星洲網，<http://opinions.sinchew.com.my/node/30254#ixzz3cSg7NWyr>，2015/6/1 日。

⁸² 《星洲日報》，2008 年 8 月 25 日。

職凍結三年才平息了此事件。讓馬中關係陷入低迷的另一波，即馬航 MH370 失聯事件，造成馬中建交四十年帶來一個艱巨考驗，使得雙方公民因一些不實的訊息而引爭議，特別是馬來西亞華人對於中國網民的言論更感到憤怒，迫使中國官方媒體開始採取「滅火」行動。馬航事件引起華社憂心，其中，華團領袖最為明顯，他們頻頻出來安撫中國受害家屬，亦希望中國人不受到此事件影響兩國之間的關係，促馬航要痛定思痛的處理馬航危機，盡量不影響雙方關係。基於馬航事件，許多中國遊客取消到馬來西亞旅遊，一些馬來西亞籍藝人也遭中國網民攻擊。⁸³

北京是否為了讓家屬的悲傷有個出口，允許他們走上街頭，到駐馬大使館外示威及提呈抗議信，引發當時的媒體關注。然而，中國人的反馬情緒一旦失控，對馬中關係必然不是好事，輕則損及兩國形象，重則兩國關係倒退。⁸⁴雙方皆發覺關係告急，原本熊貓來馬也展延以安撫中國人民的心情。另一方面，紛擾數十年的簽證政策加速推動，多少因為受到馬航事件影響，馬來西亞政府釋出善意，提出在原則上同意提供中國旅客免簽證費，因應馬航事件後來馬遊客暴跌的形勢，以化解馬來西亞國內經濟的受挫。旅遊部長納茲里指出，就中國遊客免簽證一事，已提呈備忘錄給內閣，盼近期內可捎來好消息。⁸⁵

馬來西亞面對中國時，無法完全自主獨立，需要依賴對方的經貿，是為馬來西亞對華外交政策的關鍵，能不能夠達到中國預期的雙向互動，取決於馬來

⁸³筆鋒，《亞洲週刊》，2014 年 4 月 6 日，第 28 卷 13 期。

⁸⁴筆鋒，《亞洲週刊》，2014 年 4 月 6 日，第 28 卷 13 期。

⁸⁵《南洋商報》，2015 年 6 月 1 日。

西亞主流族群的政策。另一方面，北京若透過馬來西亞華人，特別是華商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可以成為對馬政策的重要資源。



第三節 馬來政府的「中國夢」 ——建立在安全與利益之間的結盟

馬來西亞首相為對華政策以經濟、利益及安全為主，馬來西亞策略局（ISIS）資深研究員 Shariman Lockman 曾在 2013 年的一篇文章分析馬中關係的近況，並解釋為何馬來西亞不懼怕中國的崛起，他大膽的預設馬中關係為「特殊」（special）關係，至少相比其他鄰國是如此，而且這種關係是超越鄰國關係。⁸⁶同時，中國對待馬來西亞相對越南或菲律賓比較溫和，同時馬中暫時沒有面對南海問題衝突，這也是馬來西亞避免與大國衝突，雙方的自我克制維持了彼此之間的關係。

中國的軟實力已在馬來西亞國內經成形與僑務工作並進。根據 2012 年媒體報導的數據顯示，中國大陸是馬來西亞的最大貿易夥伴，就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的簽證數據顯示，全球訪華人數第二多的是馬來西亞。在馬來西亞彭亨州關丹，作為馬中欽州工業園的地標，同時稱之為「姐妹園區」便是由馬中兩國同步建設。除了孔子學院之外，中國廈門大學已宣布將開設首間分校在馬來西亞。

⁸⁶ Shariman Lockman, 2013. Why Malaysia isn't afraid of China (for now), newsletter on contemporary China edited by the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IAI) and the Torino World Affairs Institute (T.wai), April 24.

從他提出中國夢、亞洲夢、一帶一路到近期的亞投行等等政策概念，足見習近平對東南亞的積極性，相比歷屆中共領導人可說是最為積極的一位，這不可避免創造新的關於中華民族的想像空間，但對於各國則是一種權力慾望的呈現。馬來西亞是以小國的姿態面對中國，有著「投其所好」的心理以能「不傷和氣」。習近平於2013年訪問馬來西亞後，促成《2013年至2017年馬來西亞——中國政府經貿合作五年規劃》，包括在農業、製造業、產業園區、資訊與通訊科技、旅遊、中小型企業、零售及清真（HALAL）工業方面，展開雙邊合作。首相納吉對華（中國）的立場並不強硬，其對華的言論及決策（南海）都避重就輕的，反映馬來西亞對華政策以經濟為優先。

於此同時，兩國將努力擴大雙邊貨幣互換規模，中國與馬來西亞已簽署了人民幣 1,800 億元（約合 294 億美元）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根據協議，如果馬來西亞市場突然出現人民幣資金短缺的情況，馬來西亞央行(Bank Negara Malaysia)可以與中國央行(People's Bank of China)進行貨幣互換。⁸⁷

馬中企業簽署的 8 項合作協議：

企業	協議
1.彭亨州政府及東海岸經濟特區發展理事會與中國廣西北部灣國際港務集團有限公司	馬中關丹產業園區發展綜合性鋼鐵園區協議
2.Sunsuria 集團與中國開發銀行及中國廈門大學	投資與融資架構協議

⁸⁷華爾街日報，2013，〈中國與馬來西亞尋求加強雙邊關係〉，華爾街日報網：

<http://cn.wsj.com/big5/20131007/bog103607.asp>，2013/10/7。

3.亞航與中國工商銀行租賃有限公司	共同合作意向書
4.國庫控股也與北京控股集團	華為區域數據托管與物流中心
5.怡保工程與中國廣西北部灣國際港務集團有限公司	關丹港口股票銷售協議
6.U Mobile 私人有限公司與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ZTE Corporation）	災難恢復系統供應與運輸計劃協議
7.恩那杜集團與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	南崗工業區海鹽一體化投資合作
8.PTS 印象有限公司與北京印象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象·馬六甲」知識產權許可與製作服務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中國報》

整體而言，馬來西亞政府與中國政府的多方面合作未見主流族群的反對，同時馬來西亞華人與雙方政府皆趨向共享資源的共識，將「經濟中國」作為馬中交流的平台。為了強化馬中關係的馬來西亞政府，不得不將華人因素考慮在內，馬來西亞政府也對於華人到中國或者台灣留學未有任何異議，只是不承認中國與台灣的學歷。2008年全國選舉後，對華人地位逐步承認，但馬來西亞對華政策仍在日益複雜的各種利益之間折衝。

美國華府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高級研究員 Murray Hiebert 在他的分析中，提出了馬中美三國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北京發現馬來西亞與美國關係在這近幾年來，戲劇性的好轉後，⁸⁸除了上述八大項目之外，也以「熊貓外交」來拉近與馬來西亞的關係。總言之，海外人士和媒體對習近平國事訪問馬來西

⁸⁸瀏覽 Is Malaysia-China 'panda diplomacy' wavering?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4/05/malaysia-china-panda-diplomacy-wavering-20145261244769633.html>，2015 年 5 月 5 日。

亞予以高度評價，認為習近平此次訪問對提昇中馬友好合作關係，以及中國與東協國家關係具有重要意義。根據新華社報導，馬來西亞政治分析員、首相納吉的前政治秘書胡逸山說，習近平此次訪問的最重要成果，是將兩國關係提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就現階段，他認為馬中經貿關係有望以此為契機繼續迅速發展。⁸⁹

馬來西亞首相對華特使黃家定提出對「中國夢」的看法，他認為若要在2020年前達致馬中之間的「中國夢」與「2020 宏願」的理想，就必須秉持5個原則，
即

- (1) 馬中在國際上和區域內締造一個持續和平穩定、捍衛各方主權的環境；
- (2) 以開放和包容性思維打造一條「21 世紀絲綢之路」；
- (3) 「21 世紀絲綢之路」必須建立在共贏的基礎上，並惠及所涉及的國家人民；
- (4) 兩國需要強化環保領域的合作和發展綠色經濟；
- (5) 兩國必須努力達致循序漸進的發展速度，穩中求進。⁹⁰

不管是馬來西亞政府或者華社商團皆認為，「中國夢」與馬來西亞的「2020 宏願」雷同，但前者打造一個維護和平發展的願景，因此對於華人「中國夢」的圖像比「2020 宏願」更為理想化就並不為奇，這亦是華人對中國想像的一種自然反應。

⁸⁹新華社：海外各界高度評價，轉引《星洲日報》，

<http://news.sinchew.com.my/topic/node/408050?tid=1178>，2015/7/1。

⁹⁰《光華日報》，2014 年 10 月 30 日。



以上事項是紀錄著習近平上任後初步合作，凸顯了兩個之間以經濟為前提的權益關係。就馬來西亞首相納吉其個人對中國的姿態，一直維繫在馬中友好的持續發展上，據新華社分析報導，大馬首相拿督斯里納吉帶同一個 160 多人的「重量級」團隊隨行訪華，充分體現大馬對發展兩國伴關係的決心。當中包括其一對子女大馬外交、國防、教育、科技與創新、國際貿易與工業、旅遊與文化、種植業、農業等多個部門內閣要員。

同時隨行的有中國事務特使拿督斯里黃家定、馬華總會長拿督斯里廖中萊等要員也在訪華團正式成員之列，還有一個近百人的馬來西亞企業家代表團。再說，納吉在參訪結束後在其社群網站上以「xie xie」即是謝謝的意思感激中國。⁹¹從歷屆首相對中國的互動上觀察，納吉是有意識地對中國釋出「友好」態度，其的確有其積極的一面。但不得不說的，納吉如此的積極回應中國，帶動雙邊的互動關係，主要還是要展示其對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決心。除此之外，納吉上任後即送子到北京學習中文，深獲中國官方好評，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柴璽曾公開表示，「納吉把小兒子諾阿斯曼（中文名為季平）送到中國學習中文，已向社會發出了一項正面訊號，也展示了很好的姿態，即馬中要長期友好。同時在納吉出任教育部長和國防部長期間曾到中國訪問，納吉作為馬來族首相，把小兒子送到中國學習中文，具有象徵意義。」⁹²顯然的，中國方面對於納吉釋出的好意也給予正面的評價。

⁹¹ 中國報新聞網，<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531168>，瀏覽 2015/7/24。

⁹² 中國日報新聞網，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2-02-04/content_5081038.html，瀏覽 2015/7/24。

第四節 《南洋商報》中國認識—「中國夢」

《南洋商報》從華僑報到華人報紙的演進，經過兩代人，差別在於兩者心中的祖國，之前使真正自己的祖國（中國）；之後卻只是文化的中國。他們面對中國的認知、情感是反映當下的發展、演變與崛起。如今，對於有關「中國夢」與習近平訪馬來西亞的分析報導，《南洋商報》是否從文字中重新醞釀從離散中轉變為「再華化」。華團領袖接觸「中國夢」後，開展馬來西亞華人對於中國的新的想像、文化情感及願景，促使「再華化」。在此反思基礎上，本文並將提出一種「後華人」身份意識的可能性。

當年《南洋商報》創辦人陳嘉庚與張曉卿的差別在於兩代人對於文化的概念並不同，前者為了賑災救「祖國」；而後者卻以「文化中國」來「重返」「祖國」（大陸）市場。如此一來，《南洋商報》無形中就給予外界親中及主流的報紙，因為歷經上述的變化，惟《南洋商報》始終不棄的是以「商」作為辦報的宗旨至今，堅持當年陳嘉庚辦報重華商、親華團的理念。

為此，華人要將中華文化傳承下去，像華團領袖便透過教育、語言、文化習俗，但是最強而有力的是媒體，其間華文報紙扮演著民族建構的重要角色。華文報業就一直具有濃濃的族群意識，在國家獨立前關心的是中國境內，獨立後則把中心轉移至本土社會，但是特別關注華社的發展。⁹³華文報也從充當為民族精神與民族性格的滋生地⁹⁴，無可否認，馬來西亞華文報業一度是動員華社參

⁹³李政賢，2009，《馬來西亞光華日報的中國認識：在華僑與華人兩種身份之間》，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⁹⁴李異平，1998，《論東盟華文報網站的傳播意義—《聯合早報》、《星洲日報》等網路報的分析介紹》，上海復旦大學博士生論文。

與抗日運動、反殖民地政府、捍衛母語教育與族群文化重要宣傳工具。⁹⁵華報借助中華文化深厚的底蘊來鍛造中華情意結，這種種情感與情意結是「華人性」中不可缺忽視的一環。



海外華人的民族情感建構開始於二戰後，由於民族意識強烈，華文報紙的內容一致以抗日救亡為主要號召，戰後延伸更使民族解放意識與重視社會底層的觀點大行其道。隨著馬來西亞的獨立，戰後初期的華僑報紙從旁觀者進入主觀者的角色，逐漸轉移重心到本土華人身上，在地域化及種族、語言等的交替影響下，華文報紙的內容逐漸脫離原有的中國意識，開始擁有各自不同的地域特色而形成了一種中華文化為內涵的主體意識。強烈的民族意識轉化為執著的文化守護，逐漸由早先深受中山思想影響的華僑，形成一種具有本土意識的華人，且從單一性當中衍伸出了多元性。

在中國崛起的大氣候下，華人報紙對「中國夢」積極回應，以習近平訪問馬來西亞期間的新聞量為例，從 2013 年 1 月至 5 月期間，通過網站搜尋系統得到 54,700 筆，相對美國總統奧巴訪馬的新聞到 2015 年 5 月為止，共有 35,000 筆。但是這並不能說明《南洋商報》是染紅的報紙，由於《南洋商報》重商親華團的因素，因此大陸與馬來西亞華人的關係以及馬來西亞對華關係，均相對比對美關係更重要。同時，上述的時間點正好是馬中建交 40 年的紀念日，因此華人報紙都會為此盛事大篇幅報導，其他基本因素是文化與經濟，在長期裡，

⁹⁵黃招勤，2004，《西馬來西亞華文報之發展與困境－多族群環境中報紙角色和功能的轉變》，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文化及經濟才是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的共同體圖像。習近平從 2013 年 10 月 3 日至 5 日訪問馬來西亞，在這期間的報導都是經濟相關，或佐以馬中建交為背景。畢竟，在《南洋商報》改版後承擔的是，「你的創富夥伴」報格意義。



《南洋商報》有關大陸或者習近平的報導，現階段均從文化及經濟為主。若以針對馬中關係、東協關係具體的報導為例，在 2014 年 11 月 9 日報導了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發表主題講話時闡釋了「新常態」的概念。當時《南洋商報》評論說，這一闡釋「形式上化解了國內外唱衰中國經濟的輿論尷尬，表現了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自信」。如此一來，《南洋商報》似乎關注的是經濟中國為主，馬來西亞華人與中國的關係並不是重點。

《南洋商報》言論版邀請華團領袖、兩岸學者為專欄作者，當中有馬中友好協會秘書長陳凱希，其專欄為「馬中情義」；另一名專欄作者是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邵宗海的欄目為「兩岸眺望」。陳凱希在《南洋商報》欄位文章中的「中心」是中國大陸，特別明顯的是陳凱希將其內心的中國情懷化為文字，毫無靦腆地願意透過華文媒體，來抒發其對中國的感受，包括其中所寫下的兩篇文章——《高鐵考驗馬中情》（上）及（下）兩篇。⁹⁶陳凱希有著濃厚的中國情感，同時他也有著深厚的馬來西亞情感，在他的一項訪談中，熱愛中華文化的他就曾說：「馬來人透過直銷行業來了解更多的中華文化，他們嘗試中國人的養生產品，甚至學會『小財不出，大財不入』的道理」。他用他們一詞形容馬來人：「馬來人是我們的兄弟，他們很忠心。」⁹⁷他因此建構出「混合體」(hybridity)的

⁹⁶ 《南洋商報》，2014 年 10 月 19 日，2014 年 10 月 21 日。

⁹⁷ 《陳凱希社會主義練就的的企業家》，2008，南洋商報出版，頁 130—138。

認同觀。王賡武認為，從華人移民的時間、背景、移居地點等因素影響這個混合認同的發展。而從陳凱希的言論中能夠確定的是，其文化認同主體是座落在中國，這就是他所展示的一種「華人性」。



另外，陳凱希在其《南洋商報》欄目上也寫了兩篇有關「中國夢」的文章，分別是《世界大同中國夢》上、下篇，他的文章內容大量引述《南洋商報》封面頭條刊登習近平的言論

「中華民族歷來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和平傳承和平理念。

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

受『國強必霸』的邏輯，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和睦相處、和諧發展，

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中國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同時

也將推動各國共同堅持和平發展」。⁹⁸

顯然他以中國的視角在敘事，有著強烈的「文化中國」色彩。綜覽其文章的內容，中國情感、中國想像皆對其生活與事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此外，《南洋商報》與香港《文匯報》於 2004 年 6 月 18 日開始合作，共設「香港文匯報專版」取名《中華財經》。⁹⁹被喻為左派報紙的《文匯報》創報於 1948 年 9 月 9 日，在草創初期一度傾向國民黨政府，卻在 1949 年後靠攏中共。前者與《南洋商報》兩者之間有著同樣的命運，後期一個全面傾向中共，一個卻成為本土華人的報紙。另一點值得關注的是，分別是這三階段，《南洋商報》

⁹⁸ 《南洋商報》，2014 年 5 月 30 日。

⁹⁹ 文匯報：<http://ocm.wenweipo.com/p4.html>，瀏覽於 2015/6/1。

於 1972 年 10 月 15 日，首開先河採用簡體中文。1975 年馬新南洋商報正式分家，改組後的馬來西亞南洋商報經由馬來西亞公民所控制，而成為本地化的報章。1979 年 6 月 14 日，《南洋商報》編排方式大改革，將傳統華文報的直排改為橫排，與中國的報業形式相似體。¹⁰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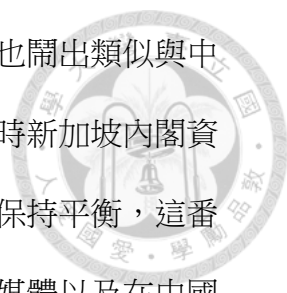
作為中國駐馬來西亞的安邦智庫特別選在《南洋商報》發表文章，指首相納吉提出的「一個馬來西亞」治國理念和「新經濟模式」與「中國夢」和十八大報告等綱領性文件，在經濟模式、社會發展以及既定目標等國家施政方針和政策理念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相似度，突顯了馬中兩國之間相互參照和互補的重要性，以及「一個馬來西亞」與「中國夢」的共通性。¹⁰¹足以證明中國在外僑事務上，已經滲入到了媒體中並透過其智庫在華人媒體上作為其宣傳的工具。他們顯然注意到南洋商報對中國夢的友善及積極態度。

南洋上報進一步討論中國的熊貓外交。「熊貓外交」一直是友好的象徵，租借熊貓被視為「重視」彼此關係。但馬來西亞政府、華人媒體、華團對這份「重視」過於敏感，而忽視了北京延後租借熊貓日期（即是熊貓來馬的時間），攸關馬航 370 事件發生後中國大陸國內的輿論壓力，乃形成兩國公民之間的爭吵。《南洋商報》在熊貓外交上，以一篇社論分析兩國之間因熊貓而提升關係¹⁰²，其中對照新加坡與中國建交 20 年後，中國大陸當時向星加坡借出一對大熊貓，之所以出借而不是贈送，因在 2007 年中國大陸已經停止對外送熊貓，除了香港與台灣之外。

¹⁰⁰ 南洋網：[http:// www.nanyang .com.my](http://www.nanyang.com.my), 瀏覽於 2015/6/1。

¹⁰¹ 《南洋商報》，2014 年 8 月 15 日。

¹⁰² 《南洋商報》，2014，南洋社論：熊貓外交提升馬中關係，5 月 23 日。



回溯同樣事件發生在新加坡，新加坡向中國租借大熊貓時也鬧出類似與中國發生不愉快的事件，以致有損兩國之間的關係事件，事關當時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美國多次表示因中國的發展，美國需要介入亞洲來保持平衡，這番講話，引發了中國民間的批評與網民們的強烈反彈。不少西方媒體以及在中國的外國人，紛紛在博客、專欄文章裡面評說這一現象。最終導致新加坡的媒體站出來，為李光耀的言論進行辯護，批評中國缺乏大國心態，甚至表示懷疑，中國是否會和平崛起。¹⁰³相對的，馬來西亞媒體則沒有站出來為馬來西亞政府辯護，更指政府（馬來西亞）太誠實，導致訊息不一致。故此，中國的網民們絲毫沒有要對馬航失聯事件讓步，最終，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黃惠康對媒體強調，馬航 MH370 失聯事件不會影響馬中友好關係。¹⁰⁴他亦說，抵制馬來西亞非中國立場，此話同時還登上《南洋商報》封面頭條。¹⁰⁵相對與其他的馬來西亞中文媒體，並沒有以此言論作為標題，並也沒有登上封面頭條，反而集中在中國的網民攻擊馬來西亞的言論作為新聞的主軸。這也說明《南洋商報》始終還是關切馬來西亞華人作為馬中友好橋樑的角色，這樣的角色最有助於華人在兩國都能維持密切關係的願望。

熊貓來馬前兩個月，南洋商報分別在 2014 年 4 月及 5 月各發表一篇以中國為祖國的社論「租借熊貓樂觀其成」與「熊貓外交提升馬中關係」，都聚焦在熊貓來馬的過程以及馬中建交歷史。¹⁰⁶在《南洋商報》的評論中特別強調，「為了

¹⁰³ 瀏覽：<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3708>，〈新加坡租借熊貓〉，閻丘露薇，2015/6/10。

¹⁰⁴ 《南洋商報》，2014 年 3 月 18 日。

¹⁰⁵ 《南洋商報》，2014 年，4 月 3 日。

¹⁰⁶ 《南洋商報》，2014 年 4 月 10 日，5 月 23 日。

迎接中國租借予我國的中國國寶熊貓，國家動物園將耗資 2000 萬令吉，特地打造適合中國國寶熊貓的設備和環境，包括冷氣、中國進口竹子以及培育我國專員、宣傳費用等。」因此，檢視《南洋商報》的中國論述、中國情懷、中國評論，呈現出馬來西亞華人與中文媒體（華語媒介）以中國身份看待自我（華人）的若干面向。

就熊貓來馬為例，向中國大陸租借的兩只熊貓名為「福娃」與「鳳儀」；到馬後改名為「興興」與「靚靚」。馬來西亞首相納吉指出，改名的意義是為了欣欣（興興）向榮，而靚靚則是美麗的意思。但是此改名舉動卻也沒有引起大陸方面的不滿。報導有指兩隻熊貓吃的是馬來西亞的竹子，意味著中國的國寶熊貓也得「入鄉隨俗」。早前新加坡向中國租借的熊貓，抵達新加坡後也是改用新加坡的名字。這是否就如當年華僑到馬來亞的時候，有著中國的名字，到了馬來亞後就要有馬來西亞的名字，如今的從中文翻譯為馬來文的名字，帶著對祖國（中國）情感轉移到本土，隨後馬來西亞華人便「入鄉隨俗」變成本土華人，但是熊貓的名字在華人媒體上的中文譯名也不仍失「華人性」，改名後仍有著象徵華人的意涵。

大陸贈送台灣的熊貓名為是「團團」與「圓圓」，一目了然，即是大陸並沒有以大國的位置來對待台灣，反之是中國對台釋出「團圓」的意識。但是此新聞在《南洋商報》的篇幅不大，標題以「『圓仔』亮相台北預料帶動『熊貓經濟』」。¹⁰⁷從標題到內容都沒有關注在「團團、圓圓」的取名，新聞是著重在經濟。另外值得關注的是，香港九七回歸在《南洋商報》的報導中可以發現。只要不是

¹⁰⁷ 《南洋商報》，2014 年 1 月 6 日。

涉及馬來西亞華人，南洋商報的中國立場就淡化了，故在關於港臺的報導種，沒有很強的中國意識。



不過，南洋商報對於台灣的關注仍然很強，對於反華的政黨傾向於不支持，這與血緣意識有關。除了祖籍、文化、經濟之外，海外華人常以血緣界定為中華民族，亦是維繫華人一個強而有利的紐帶。馬來西亞華人對台灣的情感與中國情感是相互牽扯及關連，例如連勝文敗選台北市長的選舉登上了馬來西亞的各大華文媒體的封面頭條，新聞內容指「台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慘拜6都勝1都」¹⁰⁸，新聞焦點是都在國民黨身上，馬來西亞華人也非常關注選舉的結果。無可否認是海外華人極為關心兩岸的發展，其中包括因屬華人社會，亦關注台灣的各種選舉且擔心台灣 2016 年總統選舉的結果而影響兩岸未來發展。

商報對與中國的加強報導、對於馬中關係能否平和穩健的關切、其專欄作家以外人的稱謂稱呼馬來亞主流土著民族、對中國領導人表達的仰慕，在在顯示對與自身的華人身份的表達，已經不再那麼忌諱，即使華人遭遇的平等待遇未見改善。這與文獻中所呈現關於華人性的研究預期未盡相同，華人性的研究追蹤整理華人在地化的脈絡，尤其重視如何適應土著文化與制度，因此預期華人對自身的身份意識，必然趨向於淡化，趨向於去政治化。這在印尼與泰國皆然，而在北美這樣另一個華人移民眾多的國度同樣如此。馬來西亞華人向來也表現交為典型的華人性。雖然馬華的身分意識甚強，然而在與主流民族交往的過程中，也刻意調整，抱持低調，且新一代華人有意識地區隔文化身分與政治地

¹⁰⁸ 《南洋商報》，2014 年 11 月 30 日。

位，以爭取參加主流政治制度為職志，這就表現在對華僑身份的拋棄，或對中國人身份的拋棄。可是，這樣敏銳追縱下所呈現的華人性，未能有效分析再華化的機制。



馬華華團表現出的再華化，超出了國族主義或華人性的概念所預期，商報及華團領袖面向中國崛起與中國夢，在對於中國官方散發的文化號召的回應中，表達出了情感上的積極性，除了在經濟活動上更加頻繁，更以文字、行動來實踐華人身份，重新與中國建立情感上的聯繫，因而將華人身份具體而明確地與中國的發展重新接合，他們對中國的憧憬當然能夠為中國媒體所接收，而中國官方或民間與他們的互動也強化他們重新將中國或具體、或抽象地轉化成華人身份的內涵。如此固然難免誤會，導致中國媒體、官員可能把他們再度當成中國人。

後華人性的研究議程就是可以針對這個現象加以分析，指出某種關於中國的意象重新成為華人身分意識的內涵，仍然是在地脈絡的演化，其中不排除回歸的願望，甚至零星的回歸行動業已發生，但是，依舊必須從馬華的歷史脈絡與在地性中，去追縱掌握再華化的動力與動機，而不是從民族母體的吸納力量來理解。再華化之後的馬來華人還是馬來華人，是重新啟動共享的中國文化資源後，對馬華身份的在地表達，雖然超出了華人性研究議程的範疇之外，毋寧仍然是華人性。本文為了凸顯這種透過共享文化資源，而再度將中國意象納入身份意涵的再華化過程，稱之為後華人性的開展。

第四章 馬華華團領袖的中國夢論述



本章就具體追縱若干馬華華團領袖的敘事文本，歸納中國意象重新進入華人身分意識的可能路徑。「中國夢」論述的出現，對於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與文化認同的投射與定位，是否衍生新的想像？較早關於「中國崛起」（又稱「和平發展」）的論述，更加側重於物質性的政經與安全層面，與此相較，中國夢意義甚廣，包涵社會與文化層面等較非物質性的想像，進而彰顯出中國夢具有「由下而上」、「共同願景」、「文化傳承」的意義象徵、情感及想像，或更有利於華人對於民族建構的想像與認同。

以下藉由文獻分析途徑，從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情感」、「文化中國」的想像與內涵，經由詮釋的視角，分析馬來西亞華人尤其是華團領袖對「中國夢」的理解、延展及其可能的限制，並進一步探究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夢的想像是否有可能趨向身份意涵，重新成為身份認同的內涵？從海外華人回應中國夢，順便還可以檢視當前對中國崛起的期待，成為馬華藉以提升其在馬來西亞的平等地位，改造其在地連結，重塑其文化與身份認同的資源。

本章主要探究以下三點：第一，比較東南亞國家與馬來西亞華人在回應中國夢的論述，包括積極性，目的與意涵的異同；第二，本章分析馬來西亞華人，尤其是華人社團與中國的關係，以及華社領袖如何將中國夢的論述與自身在當地社會的處境與願景連結，並進而觀察其間在地認同及身份認同的變異；第三，試圖勾勒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夢」想像及其在運用與論述上的可能侷

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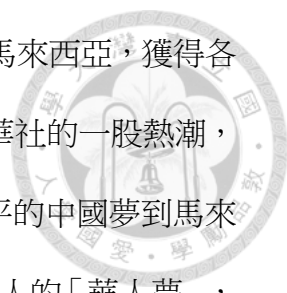
第一節 華團領袖對中國夢 的論述及其分析

關於馬來西亞華人與中國的關係，一般文獻都是從歷史談起，海外華人面對當前的中國崛起，對居住國與祖籍國卻分別有著中國圖像、文化、血緣的想像，進而便會在歷史的視野下來探討海外華人與中國的關係。就如王賡武是從中國國際移民的歷史與現狀著手，發現移民模式的多樣性及其同中國的複雜關係。在對不同類型的海外華人對中國政治態度變化的研究中，他發現，儘管其中有部分人僅僅關注中國的復興，而有一些人只關注海外華人社團的生存問題，但總體來說，中國的政治變遷對海外華人的生活及其居住環境產生了深遠影響。王賡武檢視民族主義的作用，針對華裔的自我認同及其與中國所發生的變化，探討彼此的關係。¹⁰⁹

他指出在冷戰期間，中國與東南亞諸國曾經關係緊張，如今中國崛起，可能將導致反華情緒再次出現，因此，他建議慎用「大中華」和「散居者」等影射一般華人皆心在中國之類的詞彙和概念。

自從中國崛起的印象散播以來，馬來西亞華團領袖卻漠視上述所言，華團領袖依舊將「大中華」的情意結，作為對中國幅員的想像。他們皆認為馬來西亞華

¹⁰⁹ Wang Gungwu, 1972. Political Chinese: An Aspect of Their Contribution to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n Bernard Grossman (ed.), Southeast Asia in Modern World,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pp. 115-128; Wang Gungwu, 1993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6, pp. 926-948.



人的願景與中國夢的宏願相通，自習近平於 2013 年 10 月訪問馬來西亞，獲得各界評價指出：「習近平訪馬把馬中關係推向高峰，也掀起大馬華社的一股熱潮，有機會參與活動的人士，莫不興奮，與有榮焉」，就《從習近平的中國夢到馬來西亞的華人夢》一文，由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談及馬來西亞人的「華人夢」，深情流露。¹¹⁰華總會長丹斯里方天興說，中國正以非常快速的步伐迎向美好的『中國夢』，而配合這個理想和美夢，中國在經貿方面，除了『引進來』外，也採取了『走出去』政策，因此馬來西亞或商家應該全面迎合、尋找、開拓和爭取這些商機，以從中受惠。所謂『中國夢』也可以是商家，尤其是華商另一種『中國夢』，可以把中資引進來，也可以走出去到中國投資，以取得多贏互利的局面。¹¹¹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總會長林國璋認為，中國有 13 億人口，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 年，馬中雙邊貿易數額達到 948 億美元，馬來西亞還多賺了 220 億；這是中國對馬來西亞的一種特別照顧，身為馬來西亞人要心存感激。因此，希望當政者協助人民，讓馬來西亞更加繁榮。¹¹²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永久名譽會長鍾廷森表示馬來西亞（政府）2014 年預備一份清單，把需要中國幫忙的列在清單內。華總會長方天興認為，習近平此次訪問最大的成果之一是兩國首次在政府層面簽訂經貿合作五年規劃。這表明中國重視馬來西亞，習近平表示要讓更多的中國商家來到馬來西亞，相信兩國未來會在教育、商業、政治等領域有更密切的往來。

馬中友好協會秘書長陳凱希說，習近平此次訪問以及雙方所取得的成果，標誌著兩國關係一次大的飛躍。¹¹³在他們的言論中雖然看到了他們都是作為馬

¹¹⁰ 《星洲日報》，2013，鄭丁賢，〈從習近平的中國夢到大馬的華人夢〉，10 月 6 日。

¹¹¹ 《星洲日報》，2013，〈方天興：大馬商家應迎合「中國夢」〉，10 月 7 日。

¹¹² 《南洋商報》，2013，〈林國璋：獲特別照顧・大馬人要感激中國〉，10 月 7 日。

¹¹³ 新華社：海外各界高度評價，2013，轉引《星洲日報》，10/6。

來西亞華人對於中國情懷的一種擁護，很明顯的用「感激」中國，中國「重視」馬來西亞，那是一種超越現實政治的語言，如余英時在《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就敘述了中國情懷其實就是一種文化情結。不能否定的是，馬來西亞華人往往處於民族與國家之間的抉擇，而文化情懷更強化了情結的主因。

《星洲日報》英文版總編輯張清水指出，目前西方發展遇到了很多問題，比如金融危機。但中國正在蓬勃發展，因此假以時日，中國一定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¹¹⁴他們說出種種對中國的期盼，因此不是單純的文化情懷，而是擁護中國神州大地作為民族的想像，甚至是情感寄託。實際上，他們身處在一個政策不公的馬來西亞，民族意識很明顯的會受到激發，加上在此世界形勢之中，有權、有勢、有錢、有技術、有能力的華人，拋下多年來的西方環境，要與中國大陸的經濟力量進行串連，這對他們而言是自然不過的。石之瑜在《中國文化與中國的民》一書中就這麼提到「華人回到大陸的動機很多，可能是情感上的回歸；可能是一種反哺的心情；可能是炫耀自己，彌補在西方社會中地位委屈；可能是向西方同僚表示自己有辦法；也可能是純粹找尋新的市場，挽回自己的事業；不一而足。」¹¹⁵

其中包括華團領袖不乏為了證明自己會受到中國的歡迎，便安排通過了媒體報導了一趟所謂尋根之旅，與中國靠攏，並在實際上獲得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讚許。

習近平引述了馬來西亞首相納吉的話表示，「沒有華人，馬來西亞就不會有

¹¹⁴ 人民論壇：〈馬來西亞媒體人：要實現中國夢應有量化的指標〉，鳳凰網
http://news.ifeng.com/shendu/rmlt/detail_2013_06/21/26647604_0.shtml，2015/7/1。

¹¹⁵ 石之瑜，1997，《中國文化與中國的民》，風雲論壇出版社。

今天的成就」。他指出，馬來西亞是海外華僑華人聚居最多的國家之一，600 多年前，鄭和 7 次遠洋航海，多次駐節馬六甲，留下了許多歷史佳話，而他也在 20 年前去過馬六甲，尤其是華僑華人的朋友，都是中馬友誼合作的親歷者，見證者和推動者。中馬關係快速發展，離不開馬來西亞廣大華僑華人心血和努力。¹¹⁶習近平說，中國人民正在為實現「兩個 100 年」的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他相信擁有雄厚經濟實力及商業人脈的海外僑胞，必能在這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而他也呼籲海外華僑緊密團結，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將能成為協助實現中國夢的強大力量。¹¹⁷

中國駐馬來西亞前大使柴璽在他擔任大使期間表示，要說海外年味最濃的地方，非馬來西亞莫屬。昔日的「南洋」早已發展成為多元化的國家。中馬關係水乳交融，戰略性合作範圍不斷發展。僑胞們「河山總在我夢縈」的牽掛眷戀之情；是海外華人在中國發展強大的後「腰桿子」，挺直了的驕傲之情；是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豪邁之情。¹¹⁸中國駐馬來西亞現任大使黃惠康認為，不管是中國提出的「中國夢」，或是馬來西亞的「2020 宏願」，兩國邁向發達國家的目標一致，並深信兩國可攜手努力共創和諧未來。中國夢是世代中國人實現富民強國，追求和平幸福及奉獻世界的夢，這並不會為世界帶來威脅及動盪，反而將創造更多的機遇及協助推進發展。¹¹⁹

簡言之，綜合上述的言論不過也是一種民族情感自然流露的現象，某種宏

¹¹⁶《星洲日報》，2013，〈大馬成就華人有功·習近平欣聞納吉讚揚〉，10 月 6 日。

¹¹⁷中國《光明日報》，2014，〈習近平吁海外華僑·團結助實現中國夢〉，6 月 7 日。

¹¹⁸中國《人民日報》，2013，〈感知中國夢的豪邁〉，3 月 7 日，第三版。

¹¹⁹馬來西亞《光明日報》，2014 年 5 月 15 日。

觀的華人經濟體正在突破傳統主權國界，敦促世界領導人走出國家的利益框架，不過由於人類目前處在世界認同混淆的歷史階段，華人經濟本身難免將成為各方企圖理解、定位、運用的對象。各界對華人的經濟活動是充滿幻想，有懷抱著疑懼，肇因於人們失去了既有的窗明几淨，整整齐齊的主權、族群認同後，感到迷惘，故而不能安於文明交匯。¹²⁰中國崛起語境下華人社群之間的互動，成為建構「後華人性」意義與身份的挑戰，在彼此更強化的相互識別過程之中，中國意象與共享的文化資源重新啟動，並回饋到各個華人社群自身的歷史脈絡中。

身為馬來西亞最大中文媒體集團執行長兼華團領導的張曉卿，他每次在公開場合的言論都離不開中華文化的論調，使得張曉卿有了「中華魂」的稱號。¹²¹但是張曉卿並沒有受到當地的一些抨擊而減少他的對華言論，常出現在張曉卿言論中的包括「血濃於水」、「中華民族」等字眼。比如他曾說，足跡遍佈五大洲的海外的華人，雖然落地生根，卻總是沒有忘記炎黃子孫的身份。「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感、慎終追遠的文化情懷，不但深入人心，更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集體的記憶：

「我們中華民族，在歷經了百年的滄桑和苦難之後，我們渴望的，是民族的強盛和文化的復興。雖然我們散居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但是，不管我們身在那一個國度，只要我們的血脈緊緊相連，我們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民族感情和文化的認同，是團結一個族群最為有力的依據。¹²²

¹²⁰ 石之瑜，1997，《中國文化與中國的民》，風雲論壇，頁 140-141。

¹²¹ 《東方日報》，2007，唐南發〈同床異夢的「中華魂」與公民身份〉，6月17日。

¹²² 《星洲日報》，2015年3月8日。



張曉卿在星洲日報的報導中其形容「中國夢」的看法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夢」，他表示，

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特色。尤其，他常常告訴宗親，一個民族，再輝煌傲人的經濟成就，如果缺少文化的輝映，缺少文化的鋪墊，它終究不是一種圓滿。雖然驕人的經濟和財富可能贏得別人的羨慕，卻不能換來別人對我們由衷的尊敬。因為文化記載了一個民族偉大的智慧和優秀品質。所以，失掉了文化，歷史就會變得蒼白，民族就會變得無根。因為文化是作為傳統與民族的價值體系，它所代表的，不僅是民族的尊嚴，也代表了這個民族共同的價值、思想和信仰。所以，不論我們今天生活在甚麼地方，我們都應該珍惜尊重自己的文化，並從悠久的歷史文化中，重新塑造、重新找回那些已經漸漸被人遺忘的文化和傳統，至於習近平提倡的「中國夢」，其實就是一個時代與一個民族的「文化夢」。¹²³

事實上，東南亞華人的認同意識向來是學界關注及討論的問題，而文化、民族更是文獻主張馬來西亞華人堅定的族群認同內涵，比如謝釗認為，東南亞華人的多重認同中，不可能既認同居住國又認同中國大陸，但是，重要的是馬來西亞華人仍堅持族群的文化認同，因為有多元文化因素存在，通過彼此的學習和借用，互補互勵，對東南亞國家的發展有益無害，更能繁榮整體文化內

¹²³ 《星洲日報》，2015，〈張曉卿：塑造新民族氣質內涵・華裔須具新思維〉，3月8日；同時於2007年11月1日在《星洲日報》的報導中，出現相同的言論。



第二節 馬來西亞華團與中國關係

海外華人與中國的關係均受到學者們關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華社）因而是一個關於民族的標誌。華人社會成立了許多的華人社團，均是海外華人社會得以延續的重要支柱之一。由於深厚的「家國」情懷，早期馬來亞華僑社團與中國社會的聯繫非常密切。中國抗戰期間，馬來亞華僑社團和中國社會的互動關係也進入最深切狀態。從 1957 年 8 月的馬來亞獨立開始，海外華人社團動員、組織乃至於領導華人。1963 年 9 月，馬來西亞聯邦正式成立，本節以下主要是從新馬華人歷史中，整理馬來西亞華僑華人社團在社會發展與祖（籍）國的關係中，所扮演着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馬來西亞華社中，這一特點至為明顯。

二戰後至中國改革開放前，馬、中兩國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致使馬來（西）亞華人社團與中國的關係進入曲折發展時期。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隨着馬、中兩國關係以及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與中國關係的良性發展，馬來西亞華人社團與中國的關係呈現日益密切的發展態勢。這也就說明了，當時在戰後的東南亞華人經濟力量成了居住國的主要崛起力量，因此華人商團與中國關係起了微妙的作用。新關係的發展實則影射的是，海外華人商業組織與管理模式也深受儒家的「人治」思想所影響，把人與社會關係的因素放在首位。影響所

¹²⁴謝釗，2006，「東南亞華人問題：對 R.J Coughing 雙重認同理論在思考」，《台灣東南亞學刊》第 3 卷第 2 期，頁 3-18。

及，中共主席習近平積極的推崇儒家思想，同時自他上任以來所鼓吹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世人共同走向中國夢，彰顯民族主義同時，也造成當年流離顛沛的移民（華僑）華人對於自身的民族性有被啟發作用。



19 世紀下半葉，東亞與東南亞地區華人人口劇增，給華商發展商業網絡提供有利條件。¹²⁵宗親、會館以及校友會在海外華人社會，始終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血緣、地緣和學緣成為建構商業網絡的重要基石。隨後，為了與中國更進一步的聯繫，在八十年代以後的東亞與東南亞地區，興起了一股以地緣與血緣為主的世界聯誼會之風，印證了傳統商業網絡對海外華人商業國際化或全球化所起的作用。除此之外，海外華僑華人地緣性社團，是指那些華人華僑各自以其在中國的原籍為紐帶，依次組織而成的社團，他們可以藉由省、府、縣為原籍，亦可以更基層的鄉或村為原籍。這也就是在第二章引述王賡武所主張，華人對於中國的情感是原鄉、村的概念。為此，海外華人華僑稱地緣性組織為「會館」、「公會」、「同鄉會」；而以鄉、村為籍的，則是規模較小的地緣性社團，則命名為「同鄉會」等。¹²⁶

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的華僑地緣性社團發展中，方言成為聯繫的重要管道，方言儼然比地緣來的更重要。顏清煌則認為，新馬地區早期的華人地緣性社團的顯著特點是，人口較少的幫派其會館數量少反而佔優勢，尤其是在 1801-1839 年間，檳榔嶼、馬六甲和新加坡三地的 14 家方言會館中，就有 13 家屬於客家人和廣東幫，這種現象看來是極為敏感的方言組織，為了與中國聯繫外，

¹²⁵ 顏清煌，2005，《海外華人的社會變革與商業成長》，頁 263-264。

¹²⁶ 石滄金，2005，《馬來西亞華人社團研究》，中國華僑出版社，頁 2。

更與當時的英殖民當局的關係良好。¹²⁷



壹、 華團在馬來（西）亞的緣起

馬來西亞華團與中國的關係，有些是憑血緣關係而成立的，如宗親團、鄉親會。也有些是基於相同的行業性質而組成的，如中華商會、各行各業的公會等。這些華人的社團含括的層面相當廣泛並且重疊，幾乎成了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縮影。本節對於社團的分類，則主要只集中在華團與中國的關係，華團中國觀帶來的影響。藉由對華團的分析，本節進一步探討馬來西亞華人社團或領袖的中國觀。與馬來西亞華人社團相較，華團主要是以血緣、地緣、業緣為主的傳統組織，這些社團的成立動機，不外是為了使移入馬邦的鄉親能守望相助，並把族根紮在一起。根據華僑歷史上的記載，早期華人社會為了生存發展，這種原始華團的功能受到了肯定，經由拓荒的先輩所創下的組織，凝聚了族群的根基，方有第二及第三代的後輩們承襲祖業，但這類原始華團的活動範圍和目標，卻未見隨着社會的變遷而作出相應的改變。商會（商團）是象徵著馬來西亞華人的一個商業組織，同時也是代表著華人最高的組織。¹²⁸

論者並指出，新馬華人社團強調的是「血濃於水」的血緣關係，這表現在姓氏宗親公會的組織上。基於民族主義的使然，華人重視血緣關係。中國社會的師生、師徒、雇主與僱員、官員等關係，很多都是建立在血緣宗親的基礎

¹²⁷ 顏清煌，2005，《華人歷史變革（1403年－1941年）》，載《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一冊），廈門大學出版社，頁8-9。

¹²⁸ 《霹靂中華總商會新廈落成暨六十四週年紀念特刊》，1970，霹靂中華總商會出版，頁：63-64。

上，同姓同宗的人士，凝聚在一起，組織姓氏公會，都是很自然的事。¹²⁹



俟世界聯誼會的風潮興，包括饒美蛟教授、黃枝連教授就提出的「經濟中華」的新概念，意指四個中華經濟體與外海華人經濟體之間的關係是一個「跨越時空——跨越產業——跨越文化」的交流協作系統。饒教授進而將「經濟中華」界定為兩岸四地與海外華人經濟的統稱，主張以香港為中心點，以文化與血緣聯繫全球華人，為東西方兩大經濟與文化作出貢獻。對於此，顏教授認為「經濟中華」固然有其意義，只是不宜過於標榜，否則會引起敏感的誤解。不難理解的是，華人的經濟條件決定了他們對中國的態度，而在某種程度上也顯現他們的中國認同取向。把歷史場景拉遠，就不難發現，「辛亥革命」前，華商是海外華人間的主角，而革命份子把華人對中國的認同激發了，但華商是最晚「覺悟」中國民族主義的；之後，華人的中國認同持續強化。就當時的發展情況而言，「華僑」是海外華人之間的主角，直至第二次大戰後，華人對中國的認同逐漸消退，華商再度成為海外華人間的主角。同時，這也意味著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華人對中國認同的潮起潮落。

依據王賡武教授的看法，「華僑型」華人終將式微，意味著華人對中國的認同將逐漸淡化，而經濟利益的追求才是華人性格的基調。孝恩文化基金會執行長王琛發指出，華團不能忽略社團的文化資源，而發揚中華文化便要回顧的光榮感。對於許多研究都指向華人的移居，到了其他國家成了利用移民身份而取

¹²⁹ Hsieh Jiann, 1977.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socio-cultural change :A chinese case in the multi-ethnic society of Singapor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p.103.

利益，但是華人非移民取利。他說，《遷流詩》中「驛馬匆匆過四方，任君隨處立綱常，年深異境猶吾境，日久他鄉是故鄉」，說明中華民族絕非移民取利的，而是要不失文化主體性，在艱苦環境中墾荒創基，化異域為新的故鄉。¹³⁰為了延續原鄉的文化，馬來西亞的華團以地緣、血緣及業緣區分。東南亞一些國家確曾推行排華或同化政策，不過，遍布在大鎮小村的華人廟宇，許多還是能依賴宗教政策留下的空間，留存下來。

至今馬來西亞仍存在數以千計的華團，就馬來西亞是華人社團（本文按照馬來西亞華人的習慣說法，以下把「華人社團」簡稱為「華團」）數量最多、出現最早的國家之一。據有關資料，馬來西亞註冊的華團有 7900 多個。¹³¹許多華團歷史久遠，超過百年以上歷史的地緣性華團就有 83 個¹³²，地緣性華團在馬來亞獨立以來，在相當長時期中，其主要功能是聯絡鄉誼、守望相助。「二戰」後，華僑社會轉變為華人社會，華團原有的功能逐漸下降和淡化。為因應新的情況，華團凸顯了文化傳承的功能，把發揚本民族和祖籍地文化作為己任，支持推動華文教育，舉辦許多文化活動。馬來西亞華文教育之所以在全世界獨樹一幟，保存發展得最好，主要是華人社團的大力推動和支持。許多經濟實力雄厚的百年華團紛紛捐款支持興辦獨立中學、小學，設立獎教、獎學金和助學金、貸學金等，並就華教問題聯合起來向政府抗爭。¹³³

¹³⁰ 《南洋商報》，2011，王琛發〈艱苦環境墾荒創基—華團勿忘文化資源〉，12月12日。

¹³¹ 「獻辭」，星洲日報、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華總）聯合出版《馬來西亞華團總名冊》，頁11。

¹³² 文平強，2009-2010，《馬來西亞華人社團——角色、功能與特性》，星洲日報、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華總）聯合出版《馬來西亞華團總名冊》，頁19。

¹³³ 呂偉雄主編，2007，《龍騰四海 百年僑團》，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第三節 華團領袖接觸「中國夢」後迴響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影響力日益提升。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已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國的投資，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馬來西亞華人資本。本節以馬來西亞華人為研究對象，特別是知名的華團領袖，分析馬來西亞華團領袖自身行為，從他們的中國情懷、文化想像及記憶中的個人情感再次被激發，尤其是在接觸中國夢後，重新建構自身的華人性。同時，這群華人一直都深信他們在文化上是傾向中國，而建構出馬來西亞華人是「文化中國」的集體想像的群體。何國忠的中國論述便以文化中國來形容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傾向。

就西方文獻中的討論而言，在最寬泛的意義上，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著名人類學學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這樣給文化定義：「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得的、包括知識、信念、藝術、道德法則、法律、風俗以及其他能力和習慣的複雜整體。就對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義上說，在不同社會中的文化條件是一個適於對人類思想和活動法則進行研究的主题。」¹³⁴

將文化定義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體，它包括觀念形態和行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規範。它是學習而得的行為方式，並非源於生物學，而且為社會成員所共有。文化作為信息、知識和工具的載體，它是社會生活環境的映照。文化作為制度（institution）、器物與精神產品，它給予我們以歷史感、自豪感，

¹³⁴引自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類學導引》，顧建光、高雲霞譯，1992，浙江人民出版社，頁 136。

據此我們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義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文化作為人類認知世界和認知自身的符號系統，它是人類社會實踐的一切成果。



由文化中國的面向觀之，在西方政治體系尚未引進之前，中國原本並沒有受到「主權國家」(sovereign)的制度束縛，而僅有對「正統」的傳承使命；歷史上的中國並沒有保衛「民族國家」的焦慮，只有「文化國家」的期許。¹³⁵不排除的原因之一是，馬來西亞華人在面對中國時候不存在「主權」問題（即國籍），而能坦然成為馬來西亞公民。因此，他們所一直念茲在茲要傳承的，其內涵是文化，對於馬來西亞華人而言，文化中國的證成，讓他們在作為華人之餘，得以表現一種對於中國的情感，不過，這種情感極為抽象，因此難免需要藉一些傳統文化習俗，來彰顯沒有「去中華」化，仍是中華民族的馬來西亞華人，可見他們在面對中國時，是某種超國家主義，其關鍵在於華人對中國的歷史及文化的一種認同，這是來自中國五千餘年以來的信史，如此所沉澱的「文化中國」之意義，當然超越了主權疆域的概念所能表述，其間更蘊藏了「大中華」的思想。所以，可以更明確的用「文化」身份這個詞，來形容馬來西亞華人與中國的關係，也就時在實踐上，中國除了是民族主義外，更可作為一個文化身份。這樣的身分意識發生在馬來西亞，是對應於馬來亞土著民族而來，故既有中國歷史的積累，也有馬來西亞在地的背景及生活風俗。¹³⁶在過去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研究的文獻中都認為，馬來西亞是東南亞保留華人文化為最為完整的國家，因為馬來西亞許多的華人社團都積極舉辦一些與傳統中華文化相關的活動，甚至前往中國大陸參與各種鄉團活動。

¹³⁵ Philip Babcock Gove, R. D. and The Webster editorial staff, 1986.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 pp. 2498.

¹³⁶ 《文化與人性》，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58。

壹、華團領袖的中國論述



以下涉及之文獻，將會著重在比較知名的馬來西亞華團領袖為代表，針對他們的公開論述進行分析。他們在自己的領域中，都取得有社會認知的一定成就，有一定的名氣，因此他們的言論具有較大範圍的影響。首先介紹張曉卿等人主要個案觀察。

張曉卿

張曉卿是馬來西亞公民，祖籍福州閩清，馬來西亞著名華人企業家，也是東南亞文化學術界名流和社團領袖。現任常青集團執行主席，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主席（包括星洲報業、南洋報業及香港明報集團），星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同時兼任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社、《光明日報》社長，香港《明報》社長，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名譽會長，世界中文報業協會會長，世界華文媒體合作聯盟名譽主席。張曉卿先生於 1985 年至 1991 年被選為馬來西亞國會議員，馬來西亞蘇丹王特封授他「拿督丹斯里」勳銜。2009 年 6 月，獲得英女皇恩準冊封爵級司令勳章，以表彰他在商業、社區和慈善團體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張曉卿常年致力於海外華人社會與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往來活動，並熱心於公益與慈善事業，貢獻巨大，先後受到中國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及習近平等的多次接見。

張曉卿說，「大儒饒宗頤教授在《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的文章中也指出現在都在說中國夢，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我的夢想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題中之義，甚至在相當意義上說，民族的復興即是文化的復

興」。他認為對一個民族而言，文化軟實力決定民族競爭力、民族向心力。文化興則民族興，文化強則民族強，無疑的張曉卿對中華民族的想像是，民族復興亟需從中華文化的復興入手。張曉卿作為一個《下南洋》歷史記錄片的推動者和參與者，他更承認自己深深感受到歷史與文化對一個民族的震撼、影響和發展，也代表了海外華人對自己的歷史與文化，有一種不可割捨的依戀與認同。就如前言所述，張曉卿投資的《下南洋》是獲得的中國方面積極參與，由於投資紀錄片的有兩家中資公司，並於 2013 年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放，而片頭更以「血脈相連」來形容中國與南洋華人的關係。中國知名的評論人白岩松說，當他看完 10 集《下南洋》以後，有不少地方被感動的流下了熱淚，他語帶激動地說，「這是中國對海外華人遲來的致敬」。¹³⁷中國與南洋華人主要的差異在於，中國公民對南洋華人僅是表層的認識，反觀南洋華人對於中國有著集體想像的記憶。

張曉卿更以「願中華民族，苦難血淚不再，文化振興可期」來回應文化中國及民族復興。¹³⁸這從文化的體系的結構上來看，面對本土化及全球話的挑戰，華人在文化上涵化的過程中或者文化的調適中，消失了什麼卻又保留了什麼，根據周聿峨、代帆在〈全球話進程的海外華人的文化認同〉一文中認為，海外華人即使作為外在現象的文化因子，在文化融合的進程中消失，但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屬於根植於個體內心深層的精神，卻可以長期的保存下來，尤其是在價值取向上，更保留了很多中國傳統的色彩，如服膺自然，崇古和內向發展，依然不放棄孝道、人情、面子、勤勞、報答、中庸及和睦分享中華文化價

¹³⁷ 星洲網，www.sinchew.com.my/xiananyang/ 瀏覽 2015/7/26。

¹³⁸ 《光明日報》2013，張曉卿〈不可割捨身分根源・海外華人依戀中華文化〉，12 月 17 日。



張曉卿積極透過自家的媒體在宣傳他與中國、中華民族的關係，若設定以「張曉卿」、「文化」、「中華民族」的詞彙在網路搜尋發現，共有 34,100 筆的紀錄，這些有的是張曉卿在出席活動上的言論，有的是文章，都是講述他如何看待文化中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夢。儘管張曉卿在 80 年代末才進軍媒體行業，至今卻掌控了馬來西亞星洲報業集團和香港民報集團，後再於 2006 年 10 月收購南洋報業集團。張氏被指說是「中華魂」是因為他曾公開說，「如果說我要壟斷報業，我最希望就是由優秀的中華文化來『壟斷』報業，全力維護華人應有的權力，喚醒東南亞的中華之魂」。¹⁴⁰縱使不能單從一個「中華魂」的遣詞用字，就能夠斷定張曉卿試圖透過中文媒體來對他的「文化中國」進行民族的建構及想像。但是起碼張氏的文化中國論述，有其深刻的影響力。¹⁴¹張氏的言論時而得到中國的關注，因為 1998 年 5 月當數以百計華裔在雅加達的排華暴動中被燒殺強暴時，張曉卿在《明報》撰文批評中國政府對「嫁出去的女兒」不聞不問，最終迫使北京外交部改變方針，向印尼陳述不滿。張曉卿的「文化中國」思維找到了一個實踐的據點，強化了他在媒體行業的儒商形象。¹⁴²

華人身份的變遷，一直是東南亞歷史上的一大核心命題，在學者們的研究中，作為馬來西亞華人可以歸為文化性的身份認同。中國人南來馬來（西）

¹³⁹周聿峨、代帆 2002，〈全球話進程的海外華人的文化認同〉，2002（12），頁 337-347。

¹⁴⁰《亞洲週刊》，2001，〈報人雄心烈，不懼留言急〉，第 15 卷，第 24 期，6 月 11 日。

¹⁴¹亞洲時報在線，黃進發，2007，〈明報與星洲合併：張曉卿媒體王國惹『壟斷』爭議〉，2 月 3 日。

¹⁴²何國忠，2007，《全球化華語下的中國與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中文研究所出版。

亞，變成今日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華人，漸漸的與中國的關係只有強調「中華民族覺醒得依賴中國世界經濟市場的開發」，為此，從「文化中國」作為一種宣揚民族文化的工具，逐漸的延伸到了「經濟中國」，他們都一直強調只有中國經濟市場開發，才可能傳承和發揚中華文化使命。在這方面，也是馬來西亞華團領袖的兩位較具影響力的分別是古潤金與陳凱希，以下檢視他們是如何與中國互動。

古潤金

古潤金與他的朋友於 1994 年在中國廣東中山創辦一家公司——完美（中國）日用品有限公司，多年來其公司已經為中國捐贈合計達 1.6 億元（人民幣）。¹⁴³古潤金和他的完美公司凡事抱持中國情懷，古潤金是因為在中國從商的機緣，從而日益深化對中國的情感，還是因為他的行為受到中國文化的陶冶，而不能完全忘情於中國。無可否認的是，以「族群」做為文化商品販售例子多不勝舉，例如旅遊展銷會上原住民舞蹈表演、國家慶典中多元種族民族文藝表演、鄉土文學作品裡原鄉描繪等，在不同文化類型消費中，族群想像確實解決許多消費者渴望我者與他者展現出文化上的差異，這種渴望得到滿足不只是生理的¹⁴⁴，亦是文化符徵(cultural signifiers) 的共享過程¹⁴⁵此外，古潤金把中國廣東省看作自己「家鄉」，他說，「馬來西亞的廣東人都沒有忘了自己的家鄉，他們不但成立了各種聯誼會、組織或僑團，不定時的聚在一起聯誼論商，甚至還看能不能為家鄉做出貢獻。雖然（中國）不是我們的國家，不過，像我們這些僑

¹⁴³ 新浪網 www.sina.com.cn，《南洋風情》之六，馬來西亞華人的中國情結（下），瀏覽 2015/6/15。

¹⁴⁴ Mosco, 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傳播政治經濟學》，五南出版，頁 208。

¹⁴⁵ Barker, 2000/羅世宏等譯，2004，《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五南出版，頁 234。

民，還是有情意結在裡面，一旦中國有甚麼問題，我們都可以幫一幫，看我們能不能為家鄉做出貢獻。」¹⁴⁶



陳凱希

陳凱希是經銷中國產品聞名的海鷗集團董事經理，對中國極為擁護，經常受媒體訪問暢談中國問題。作為華人企業家，陳凱希對祖籍國和故鄉懷有深厚感情，因此就連企業的名字也稱作「海鷗」。他當年創辦海鷗公司，專門經銷中國商品，一方面是為生計，但更多的還有一份鄉土情結，居住地和祖籍地的兩地情緣共存在心中。¹⁴⁷陳凱希於 1937 年 5 月 3 日出生於馬來西亞柔佛州居鑾市，陳凱希為老二，上有一位姐姐。陳凱希的父母都來自中國，父親是福建安溪人，母親是福建永春人，在中國受過正規的師範教育，和許多當時的年輕人一樣，熱衷於政治活動。正當他們辦婚禮的前夕，因一同事突然遭到逮捕，迫使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遠走馬來亞。在馬來亞，陳凱希的父親參加抗日活動，後來又和英軍對抗。1948 年，陳凱希的父親被英國政府逮捕，在被關押兩年之後，於 1950 年被驅逐出境，遣返回中國。彼時陳凱希的母親一共有 10 個孩子，其中 7 個孩子跟隨父母回國，只剩下陳凱希、其姐姐及一位弟弟留在馬來西亞。那年，陳凱希才剛剛 12 歲。陳凱希以後的日子過得並不順利，18 歲即輟學，陳凱希後來參加勞工黨，擔任過勞工黨的副總秘書，1965 年 2 月 13 日被政治部拘留長達 8 年 3 個月。1973 年出獄後他在親朋好友辦協助下，創辦海鷗公司，專賣中國貨。陳凱希一直都是馬中關係的重要推手，大大小小和馬中有關的活動都可以看到陳凱希出錢出力。陳凱希在 2003 年將吉隆

¹⁴⁶ 《星洲日報》，2013，古潤金〈大馬廣東人願貢獻家鄉〉，11 月 23 日。

¹⁴⁷ 何國忠，2007，《馬來西亞華團領袖（華商）與文化中國》，華人研究中心出版。

坡蕉賴一座叫「Ue3」的商業大廈承接下來，建立馬中商城，只可惜馬中商城正式營業的時間前後不過三年。到過馬中商城的人都知道，與其將馬中商城看成是一個商業投資，倒不如說陳凱希是為了圓他自己的文化中國夢。¹⁴⁸

陳凱希在《南洋商報》言論版上的言論似乎離不開「中國」、「民族」等，甚至連中國評論新聞網也曾訪問陳凱希有關他心中對中國夢的看法。陳凱希曾說，「我一輩子就在做一件事：擔當中馬友好的紐帶和橋樑。」1991年，中國華東發生特大水災，海鷗集團率先捐款馬幣40萬令吉。1996年雲南麗江發生大地震，陳凱希和馬中友協會長烏斯曼阿旺又火速將5萬美元交給雲南省。2008年5月，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後，馬中友協和馬來西亞各大社會團體舉辦大型賑災晚會，籌募馬幣800萬令吉。同時其海鷗集團捐贈了馬幣100萬令吉，此外，陳凱希及海鷗員工也各捐贈了馬幣20萬令吉。陳氏竟然大膽的說自己把希望都放在中國大陸，他說「我們雖然身在海外，但希望在中國！希望中國能成為世界繁榮富強與和平的中流砥柱，這就是我心中的中國夢！」¹⁴⁹

從陳凱希的訪談稿或者是致詞的用詞中，不難發現的是都圍繞在中國，那是一種對民族情感的呼應。執此，無可否認的一點是，中華民族海外華人長期面對政策不公、被壓抑、被約束下，民族認同成為一道主要的出口，但是如此一來，馬來西亞華人背負的是作為中華民族的優越感，而另一個身份確實必須是馬來西亞公民。在兩者之間的陳凱希，經常藉由對西方世界的喊話，來呼應

¹⁴⁸何國忠，2007，《全球化華語下的中國與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中文研究所出版。

¹⁴⁹人民網：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5/20/nw.D110000renmrb_20130520_8-03.htm，〈中國夢，赤子心〉，瀏覽 2015/6/30。

中國的民族偉大復興，反而在馬來西亞作為公民的他相對模糊，他依然無法擺脫族群意識，仍然向民族感情借殼，繼續為了民族情緒尋找抒發的管道。值得關注的是，從過去到現在，馬來西亞華人的確在民族議題上，對中國總會有積極的回應，這也是許多研究馬來西亞華人與中國的學者皆留意到的現象。

不過，長久以來，馬來西亞華人團體和華人政黨都不宣揚任何與中國的關係。許多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或中華民國駐馬來西亞代表出席的華人團體活動，都保持低調，華人報章也不宣揚。然而，在 2004 年，面對激烈的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及陳水扁提出映射台獨的防禦性公投，在前馬華公會會長李三春及陳凱希的帶領下，馬來西亞華人團體罕見的建立一中促進會，史無前例地公開發表反台獨立場。作為一中促進會秘書長的陳凱希，目前更是高調在透過媒體報章來展現對中國大陸的情感。何國忠在受筆者訪問時提出了同樣的看法，何國忠認為這些華人回應中國崛起做出了積極的調整，華團活動都趨向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中華民國的代表參與活動，將兩岸一視同仁，那是一種民族認同的體現。

華團領袖面對中國大陸的另一個因素，是祖籍情感。文化認同是反映了對祖籍國民族情感的延續與潛藏。為此，民族認同則具有內生性，即使政見不一的海外華人，其對於祖籍國的民族情感確是同一的。

貳、華人學者的「文化中國」與「中國夢」論述

王賡武提到「文化中國」這個意念所指的，是其間所蘊藏一種號召力，能



夠給中國人，尤其是海外華人一點新希望，提醒他們認清現代文化是古今並存，中外共享的。健全的文化跟國家的興旺、開通、富強密切相關，若重視文化而不重視經濟、政治，不僅中國會漸為貧困，文化也會漸漸地削弱，遲早被放棄的。¹⁵⁰近年中國在崛起的發展中，積極的建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於一直與中國密切往來的華商而言，他們對於大中華的情感，同時是來自跟緊密的經濟關係及固有文化的傳承，兩方面相互的強化，出現了一種從「文化中國」到「經濟中國」的轉化。不過，在回答中國夢對海外華人的影響為何時，王賡武認為其實影響有限，他更著重談論海外華人自身的成長過程。他憶及小時候華人與馬來人不分彼此地嬉戲玩耍，不免隱含某種對馬來西亞華人獨樹一格、不願融入馬來社會的遺憾，主因是華人在馬來國族建構過程中，因爭取分離與平等地位，卻不幸導致老死不相往來的鴻溝。¹⁵¹王賡武認為，華人在進行文化調適過程中，透露出其實他們的文化概念並無實質內容可言，華人一直在設法應付全球多邊的形式，多數華人對其文化的哪些方面需要保持，哪些需要放棄，並無定見，向來都表現的相當變通和實用。¹⁵²

許多研究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的學者紛紛提出「文化中國」的概念，以祖先的的共同想像記憶勾勒出文化中國的圖像，一直持續死守中華文化。儘管在一個以巫族作為主流族群的國家，面對邊緣公民身份的處境，慶幸的是自己華人文化的根能夠保存著，沒有因國家政策的阻攔下而「去中華化」。

¹⁵⁰ 王賡武，1987，《東南亞與華人》，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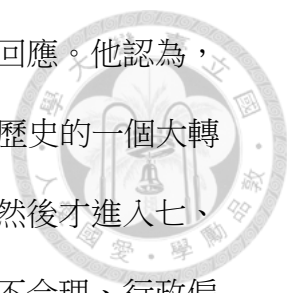
¹⁵¹ 王賡武於 2014 年 6 月在國立新加坡大學接受筆者口述歷史訪談時，談及馬華在馬來西亞的族群現象。

¹⁵² 劉宏、黃堅立編，2002，《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教授論文集》，八方文化企業出版，頁 214-251。

過去有種說法，「新加坡華人的骨子裡是英國人」，是否可以說「馬來西亞華人的骨子裡還是華人」，亦即，不管是文化中國抑或是文化馬華，皆展現馬來西亞華人的「華人性」。接下來談到的兩位當代馬來西亞的華人學者，他們對於「文化中國」或「文化馬華」的論述值得爾後更多的整理這兩位學者的言行及研究，從來就離不開「華」的範疇。

何國忠原本是一名學者，大學畢業後一直留在學術界，直到 2007 年才轉換跑道，棄教從政，於 2008 年擔任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希望為華社貢獻，而其加入的政黨即是馬華公會（MCA），以民族事業為鬥爭目標。何國忠在《馬來西亞華團領袖與文化中國》文中提及，所謂的華社領導人，除了華民政黨以外，就是華團領袖。何國忠指出，當代馬來西亞華人的政治和文化兩個層面，已不再重合。二位一體的中國已不復存在。即是說，當下的歷史格局，已並列呈現不完全重合的「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政治中國」指的是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中國；文化中國則是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以及其他以中華文化為生活基礎的華人世界。無疑的，馬來西亞華人一直壓抑對於民族及公民的情感，如此一來，誠如何國忠所言，由於文化傳承的持續，「文化中國」的情意結一直強烈地留在許多人的心目中。遇到在地政治敏感的情況時，許多人都會小心翼翼地以「馬華」定義自己的文化，將這個情意結回歸於自己在馬來西亞的國家公民身份，以免文化中國和政治攪和以後會引發無謂的「不效忠」議題。但是，當遇到言論空間更具彈性的時候，文化的概念便會跨越到它原有的政治場域。

曾為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所長的何國忠，在其專題演講圍繞在當代馬來



西亞華人，針對社會上提出「華人前景有喜有悲」的說法有所回應。他認為，1969 年發生在馬來西亞的族群衝突 513 事件，是馬來西亞華人歷史的一個大轉折點，華族面對了經濟重組和新的以馬來文化為核心的社會，然後才進入七、八十年代的所謂悲情年代。華人面對財富重新分配，文化上的不合理、行政偏差，便採取和馬來人非理性化的對峙。不過，他也認為，七、八十年代的悲情有其正面的影響；亦即壓力愈大，反彈也愈烈，因為有太多的挫折和失敗感，促使華人更熱愛中華文化，連外國的著名學者也曾指出，當時的大馬華文社會讓人感受到海外中華文化的光輝。

何國忠認為，如今馬來西亞華人面對中國崛起、中國夢等號召，也就是看到中國大陸對外展現其實力，做為海外的華人的他們幾乎都欣然接受這個事實。他不否認「中國夢」是一種符號的建構，通過文化媒體散播。但是，中國夢在中國大陸包含了政治層面，而對於海外華人「中國夢」的界定傾向於貿易、爭取華語市場等的途徑。此一判斷顯示，何國忠毋寧是主張，馬來西亞華人已經走過了悲情時代，如今只有一種對於中國是文化的想像，甚至已經能從中華文化中啟發一種價值觀。舉例而言，馬來西亞華團積極推廣的「光盤運動」，是一種呼籲華團組織在辦活動的時候，避免浪費食物。何國忠指出，這恰恰是一種文化仿效，出自於習近平上台後打擊鋪張浪費所展現的新作風，這項改革便從中共領導階層，延伸到社會大眾，如同現在大陸很多餐廳和機關團體，都推動（光盤運動），呼籲人們擺酒席，或者在餐廳用餐時，不要點很多菜，顯示自己有錢，而是應該力求節省，少點些菜，而且要把盤子裡的菜吃光，不能浪費。從華團舉辦活動中的呈現方式即是一種對於中華文化的響應及展現。



與何國忠相較，何啟良則發現，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化歷經本土化後，正轉變為「文化馬華」。他認為，馬來西亞華人具有某種「馬華性」，因而與何國忠的「中華性」可資對照，似乎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身份的認同的內容對中國的想像，其間著重有所不同，華人本土化後的種種演變，難以透過一個客觀標準來呈現其不同的組合成分各占多少，多元文化的馬來西亞，促使華人對於中國的想像，延展出更多的複雜情感。何啟良提到，馬來西亞華人對於文化的情感從文學上積極展現，馬來西亞華裔學者在中華文化經典的翻譯工作方面，作出許多的貢獻，比如四大名著，都已翻譯成馬來文，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翻譯工作的完成，全是依靠民間的力量。可見，馬來西亞華裔學者對文化融合及文化交流，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讓馬來、印尼同胞能以他們的語言，來瞭解中華文化的經典著作，何啟良稱之為「功德無量的工作」。這一類型的翻譯工作，若能通過兩岸四地的學者和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的學者共同努力，何啟良相信「肯定會加分」。

目前在馬來西亞一所由華人民辦的私立大學執教的何啟良，一直積極的推動文化工作不遺餘力，在其研究與作品中一直強調著「文化」的重要性，他認為文化也是需要不斷的反思，雖然馬華與生俱來就是注定悲劇，因為政治權力的真空狀態，往往就是靠著自身的自強來維護民族的尊嚴。何啟良的《文化馬華》一書中提到：

……文化發展最重要價值範疇，仍然模糊不清，一路來馬華反覆爭辯，
企圖摸索出路，一方面資源有限不斷呼喊自強，另一方面卻在種族
主義的政治體系下又不斷為自身文化爭取地位。在這漫長的過程裡，

多少知識份子真正感到作為馬華的焦慮與沈重的心情。¹⁵³



另一方面，許多學者也談到了文化差異的問題。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播與紮根有其多元性與在地性元素。何謂多元性？中華文化傳播到海外後，基本已經起了變化，它滲入了本地性的各種元素，比如馬來西亞的華語就滲入了馬來語、各種方言以及西化的元素。這都是中華文化在海外異化的現象，但這不一定是負面的。因此，何啟良一再強調了這就是「文化馬華」的概念。在學術研究交流方面，何啟良有兩個建議。一是研究方法的開拓，二是研究內容的開拓。

傳統學者和現代學者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中國學者有紮實的傳統治學訓練，這是海外華人學者值得學習的地方。許多海外華人學者受過西方高等學府的學術訓練，於是彼此大可以互補。在海外華人的學界裡，時常提到一個所謂「海外華人學」，大有可以這類系列的研究塑造出一門學科（discipline），即使這個過程很艱難。如果企圖把「海外華人學」塑造為學科，必須借助於兩岸四地及海外華人的學者不斷努力。現在講究跨學科、跨領域研究，這個 20 年前呼籲因此已開始有所成果，但真正跨國性的研究，或是國際跨校性的研究，還在起步階段。何啟良乃希望以後多方學者能夠不斷努力深化，新馬學者可以借助兩岸四地的宏觀資料，兩岸四地學者可以借助海外學者的微觀資源，優勢互補、共生互利。何啟良目前身為一所非營利華社資助的大學學院副校長，對於華文教育一直都堅守使命，他認為馬來西亞華人的中華文化具有多元性，因此更能夠「融會貫通」在中國大陸與馬來西亞之間。

¹⁵³ 何啟良，1994，《當代大馬華人政治省思》，華社資料中心，頁 43。

故此，何啟良引述杜維明的共同塑造「文化中國」：

看中國，要看「文化中國」，不能祇看經濟，看 GDP。他希望從三個意義世界來共同塑造「文化中國」。第一個意義世界是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包括新加坡華人組成的群體。第二個意義世界是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即離散社區。



何啟良提出一個具體的例子，何氏認為作為第二個意義世界的離散的社群（海外華人），有其複雜與多元性，一方面馬來西亞華社漸漸有種「討好」中國大陸的舉動，尤其是在華團活動上邀請不懂馬來西亞的官員時，都會邀請中國大使或參贊，他發現馬華對於中國的官員似乎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亦即把中國的公務員當作「官」來伺候及對待。何啟良亦把這種行為比喻是一種對中國大陸政治的出現矛盾，分別就是作為馬來西亞公民與中華民族之間的情感上的矛盾。¹⁵⁴另一方面，他發現馬華的多元性促成對於文化中國的情感不斷變化，他的例證是，在 30 年前是透過中國的文學來緬懷故鄉，但是隨著時間的轉變，對故鄉的認同感變化，文學產品也隨之變遷。

在民族認同上，馬來西亞華人都以華人、華裔為統稱，但是何啟良指出，世界華人中，只有馬來西亞華人有著兩種華人的身分脈絡，他們至今保留有的這兩種情感，分別是對中國大陸及台灣的情感，就如在台灣受教育，並在台成名的導演蔡明亮，蔡導演是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人，但是認同的是台灣，旅台後便不會承認自己是馬來西亞人，但卻不放棄馬來西亞國籍。何啟良分析這種認同的複雜性，認為認同會受到成長的環境、背景等因素影響。馬來西亞華人的祖先從中國到馬來亞，作為後裔的華人該積極的參與在地的建設及貢獻下一

¹⁵⁴ 何啟良於 2014 年 8 月在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校接受筆者口述歷史訪談，引述杜維明的「文化中國」論述，而強調其對此論述的看法。

代，當下卻凸顯了華人的少數民族意識。族群分化嚴重的現象，使得華人本身面對一個身份認同的困境，進而強化了對民族性的建構，形成矛盾的情感。¹⁵⁵



另一個脈絡，是許多馬來西亞華人到中國大陸尋根，見到中國大陸的親人或者朋友都享受著被歡迎回到「祖國」，甚至也不拒絕「認祖歸宗」的祭祖儀式。這些發展是否已足以證明，民族的建構是透過文化、血緣及祖籍而形成，所以是超越國家的？

一般而言，華人性的研究議程，對於華人社群的在地性特別仔細的追蹤整理，有意識的強調與中國的差異，這些差異既是出自於在地華人身處的地緣文化迥然不同，也是出自於生存發展需要而進行的調整。差異性的研究將在地的原素於原本伴隨華人移民而來的中華文化相互影響，有的地方形成雜揉難分的文化，有的地方則保持並存但不相融會的共生。無論如何，在地元素的加入與華人的調整，是華人性趨於多元化的過程，這個多元化難免是背向中國的發展。

本文研究的，則是中華文化與中國意象重新加入到已經在地化以後的華人性，因此重點不在於差異性，而在於共享文化資源重新啟動的現象。後華人性與華人性因而是相輔相成的兩個研究議程，後華人性的研究補充了華人性的研究對再華化機制及其理論化的不足，但仍然是把在地華人與中國重新連結的後所孕育出的身分意識，維持在差異化的脈絡中詮釋，因此共享文化資源的重新

¹⁵⁵何啟良於 2014 年 8 月在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校接受筆者口述歷史訪談，引述杜維明的「文化中國」論述，而強調其對此論述的看法。

啟動雖然是一種朝向中國的身分意識，可是與單純的回歸或民族主義仍然是大異其趣的。



第五章 結論

面對中國崛起、中國影響及中國對外僑務的擴張，馬中關係經歷了新的轉變，馬來西亞華人尤其是華團領袖的文化記憶及想像隨之波動，並在媒體與智庫的推波助瀾下，再度必須審視自己的華人身分。箇中原因在於，華人介於華人民族與馬來西亞公民之間的「雙層認同」，成了重建新華人身份的關鍵。對居於這樣邊緣位置的馬來西亞華人，許多學者用了「混雜」、「多元」、「差異」為內涵的華人性，來形容其身份認同，這是馬來西亞與世界各地華人社群有別與大陸中國的中國人之處，因前者往往不是以華人為主的國家，其結果，隨著外在環境的演進，「混雜」、「多元」、「差異」的華人意識所反映以及衍生出的馬華的「華人性」，就會不斷的調整。

固然，個別國家的華人移民之所以有意識地繼續身為華人，是因為他們仍然借用著各種共享的或共同可採納的華人文化資源，彼此認識，相互溝通，並建立自己的價值觀，安排自己的生活及社會交往方式，以致於形成彼此不同卻又相互認同的某種混雜的華人性。這樣籠統卻又無所不在的華人性，不可避免影響了包括大陸在內的外界，在看待馬華社群時採用的角度，甚至還影響各地華人認識中國或其他華人的方法，進而彼此在互動時產生溝通與行為上的不對稱，不能充分傳達各自根源於不同教育背景、國家處境以及歷史文化記憶的自我認識，或因此而形成的對華人、中國人、中國的認識。這樣在彼此認知中各

自有若干部分、若干程度出於中華文化的同源，卻又實際各不相同，因此無法一言以蔽之的多元身份，姑且可稱之為「後華人性」。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馬來西亞華人的「華人性」

一般華人學者在研究「華人性」這個概念的時候，都會以馬華文化作為文本分析的對象，由於這些文獻的內容不必直接面對敏感的身份認同問題。然而，本文既然是從華人學者、華團領袖、華人媒體的敘事角度來整理「華人性」的內涵，必須直接處理涉及身分認同的「華人性」論述。其中，華人性變遷的歷史是不可或缺的分析基礎，因此本文不能忽略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記憶對民族認同的影響至深。從中國南來馬來（西）亞的華人族群，無法擺脫也不願意擺脫祖先的文化，這一方面是有意識地堅持，而另一方面也有其自然的趨策力，畢竟因為文化是一個民族安生立命之道，何況中華文化在歷史上具有優越性，又因其內在的豐富性及結構性而得以有系統的傳承。在過去的研究與報紙敘事中，在在流露華人是多麼的眷戀自己的中華文化，為此而感到自豪，尤其是對自己的母語（華文）教育的堅持，不時因為學習華文的處境受限而感到焦慮，同時，華人文化無異是向主流的在地民族展示並建立自己尊嚴的不二法門。

文獻中所呈現的往往是，華人在馬來西亞建構的過程，強調「民族」與「文化」的概念，華人就是以這兩點作為集體記憶，建構華人性，華人性的研

究主要是證成華人與在地土著群體以及與大陸中國的中國人之間的區隔，但並不主張華人性具有任何本質，也不處理再華化的可能性及其路徑。



在建構華人身份這個過程中，除了原鄉情感、文化記憶及想像等等因素，作為一直以來的推動力量之外，華人的身分意識還受到主流族群的「馬來特權」的影響，形成華人處於二等公民的認知。與其說華人文化情感的傳承是眷戀過往，毋寧說是因應主流社會歧視性的政策，因而便使華人的身份認同呈現出情境性與策略性。其間所體現的，是公民身分與民族身分之間的折衝，進而在華人各界均願意維持民族情感、文化鄉愁的同時，其間的「華人性」逐漸有了各自不同的開展，成其為一種可以共享卻不可共語的「後華人性」，預示了更大的轉變及流動。王賡武亦指出，華人性不是一個單一的、一成不變的概念。不同地域、處於不同歷史進程中的華人，其華人性是不同的，出身同一背景的華人也可以有不同的華人性。實際上「華人性」也不會固定下來，它是一種流動（fluid）性質的概念。時至今日，華人性這個概念作為身分的指標已經不充分。

華人學者均同意「華人性」這個概念是非常抽象、難以界定、不斷流動。在研究「華人性」的文獻當中，研究印尼華人身份認同的雲昌耀，透過 1998 年後印尼重新建構華人與非華人之間關係的過程，來重新概念化「華人性」，具體指出「華人性」內涵是流動的¹⁵⁶。本文企圖透過華團領袖的意識形態來追蹤另一脈絡的「華人性」，因為本文研究的華團領袖在語言、地位、文化等面向上進行策略性的流動，華團經營的華人媒體亦是如此，因為他們面對的對象有不同

¹⁵⁶ 雲昌耀，2012，《當代印尼的華人認同》，群學出版有限公司，頁 253-259。

的預期與不同的資源，帶來不同的挑戰與機會，因此在實踐上不能根據一套自我理解就充分因應。



「華人性」具有超越本質及價值觀等等的特點，如人類學者王愛華

(Aihwa Ong) 與 Donald Nonini 便提出此看法：華人性已經不再是以多少的華人價值觀或者準則來衡量華人的屬性或者本質，取而代之的是將各種「作為華人」的方法的多重性，視人際關係與團體關係鑲嵌在全球資本主義及其現代性的結構與過程中。¹⁵⁷

不過，他們沒有顧慮到華人群體之間繼續使用某些可以共享的文化資源，不同華人群體之間所共享的文化資源固然不同，但是他們所共享的文化資源綜合起來，仍可藉以為彼此識別華人身分的一種方式，因此只強調華人已經各自分殊而毫不相同，似又不能掌握到因為文化資源的共享所能提供的機緣，這些機緣仍然對於爾後華人身分意識的流變、堅持、回歸、或消失，起著事先無法規範的作用，而這就是後華人性的概念超越華人性之所在，因為後華人性以「後」的概念體現差異與流動，而保留「華人性」的概念來指涉共享文化資源提供的相互識別作用。

根據王賡武的研究，早期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分別聚焦於 X，Y，Z 等三個群體，而延伸到現今已經超過三個集團，他在訪談中亦同意，當下的華人群

¹⁵⁷ Ong, Aihwa and Donald Nonini, 1997, *Intradatatio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s an Alternative Modernity*, in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al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ihwa Ong and Donald Nonini (eds), Routledge, New York, pp3-38.

體變得更多元，不能夠仍然從某個單一角度，或只設限在三個群體來掌握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認同。他曾提到的幾個關鍵變化是，早期的海外華人的分類是從華人移民的時間、背景、移居地點等角度切入，因為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不同群體的華人認同之間便有差異。另一方面，從文化及教育進行研究的陳志明則區分出三大類別，包括受華文教育的華校生；華、英雙語教育的華校生；英校生及土生華人。¹⁵⁸這些群體的分類由於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也在不斷的轉變，因此至今無法完成明確定義。日趨細緻而多元的發展，導致分類益加困難，然而又仍然能夠彼此追蹤出他們的華人身分識別，這也是何以本文主張一個足以凸顯這種命名困境的「後華人」的概念，作為一個總結性的身份範疇，並且保留了這些文化資源在未來所可能重新啟動的再識別過程。

貳、華人學者看「華人性」

王賡武眼中的「華人性」與中國特色相關，他在《離鄉別土境外看中華》一文中強調中國特色，不管是社會主義也好，或者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也好，使用這些詞的時候，這個關於中國特色的提法，和海外華人所謂“Chineseness”的提法，有其相同、相似的地方，外國人看海外華人（現在的東南亞也是如此），什麼是 Chinese？「Chinese 就是說他們現在無論接受某某國籍，接受時下的西方文化、教育，接受了本地教育、語言，本地的文化菁英、文化價值關，他們也能懂，仍舊堅持他們是華人。」¹⁵⁹而後華人性之所以繼續可視為華人性的開展，正是在於他們多數尚能透過共享的文化資源，明確維繫著不同面向但

¹⁵⁸陳志明，1987，《華人與東南亞民族形成》，亞洲文化出版，頁 62。

¹⁵⁹王賡武，2005，《離鄉別土境外看中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65-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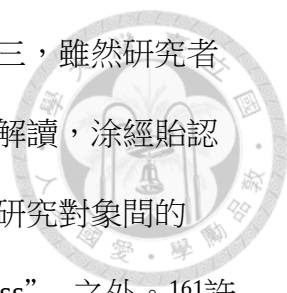
卻足以識別的華人身份。其中，華團經營的媒體就是在共享文化資源的條件下，不斷進行再識別及自我檢視的機制。



陳昌宏在其論文中提及，新加坡華人的「華人性」內涵一方面隨著時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不斷發生著歷史性的變遷，而另一方面又在演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穩固的、為東南亞華人普遍接受的華人身份。這種影響會透過世代傳承，直到今天仍然對中國社會和文化具有深刻的影響。¹⁶⁰準此可藉新加坡華人作為馬來西亞華人參照，因為兩國華人原來並未區分成兩個國度，祖先皆是從中國南來馬來亞，再從移民成為在地國家中離散（*diaspora*）的族群。在意識到自己作當地的華人後，亦即是本土華人，各地華人認同的變化就得以解放，不再能輕易的以單一、多元就說清楚。畢竟，各種因素促成華人身份的不同內涵一直在開展或循環，特別的是華人本身因其與在地主流民族的區隔，而顯有其之所以為華人的特色存在，這種所謂的特色就是所謂的「華人性」。但尤有甚者，不同地區的這些華人性雖然可以容許彼此相互識別，卻又並非可以共享，若要統稱這樣的識別能力，便成其為「後華人性」。

另一個看法則是出自涂經詒，他認為研究「華人性」，正是為了要改造「華人性」。早期的思想家對“Chineseness”的研究具有三個特點：首先，因為對華人性的研究有迫切的現實針對性，難免受到某些意識形態作祟，故而他們所解讀的“Chineseness”存在若干各有目的所導致的差異。其次，雖然彼此討論的“Chineseness”可能存在部分差異，但共同的特性認知在於其共享的前

¹⁶⁰ 陳昌宏，2011，《新加坡中國研究的知識密碼－華裔離群者的身份策略與能動性的展現》，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頁 40-42



提，亦即一個普遍而實存的中國文化與抽象的中國民族性。第三，雖然研究者的立場、環境和意識形態等背景因素，孕育出對華人性的不同解讀，涂經貽認為早期的學者對此缺乏充分的自覺，並且存在著一種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間的「主客二分」的關係，研究者可以置身於所研究的“Chineseness”之外。¹⁶¹許多研究「華人性」的學者包括涂經貽在內，試圖改造「華人性」，但是「華人性」是應該從華人的言行舉止、生活環境、語言、文化出發，或是回到原點，而從血緣、文化層面去解釋比較合適？顯然，華人這個概念並不是源自國家或者國籍，而是來自「文化」的概念，因此，從文化記憶及想像切入去檢視「華人性」較為適合，並能夠隨著時空而調適，從而識別出各種不同的華人身份認同。就前述所言，本文主張的「華人性」比較趨向王賡武所解釋的「華人性」，他以新加坡華人為例，認為他們的出發點中，具有某種該有的華人的特色，王賡武特別提到李光耀及新加坡華人對中國的看法，王賡武是從李光耀的國族身份處境去分析。「他們（新加坡華人）有的在新馬住上幾百年，華裔在東南亞成長，他們唯一的家就在這裡，他不可能回中國，根本中國沒有家，他們已經是本地人。」他形容中國在東南亞華人眼中就是別人的家。同時，王賡武在訪談中提到特別欣賞李光耀與家人的關係，他家是一個非常美滿的家，家裡父子關係很好，一家都很孝順，其實從傳統中國人來看，是相當好的榜樣。¹⁶²

相對於華人學者，西方學者理解中國時所採取的不同角度中，較為實際的是從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民族來辨識中國。文化認同與國家、政治認同有所

¹⁶¹ 涂經貽，2007，〈略論「中國性」問題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四卷第一期，2007（6）頁：153-162。

¹⁶² 王賡武於2015接受香港《蘋果日報》訪問內容中，其指出香港不需要李光耀更形容李光耀父子之間的關係。

區別，這兩組概念甚至是衝突和具有張力的。文化認同是深植於歷史觀和社會價值中。在很大的程度上，東南亞華人在中華文化認同上根深蒂固。他們曾經輾轉在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之間的拉距和撕裂，尤其是知識分子，獨立前後面臨了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痛苦抉擇。這表示文化認同牽涉到另外一個範疇，即族群或族群關係，國家的成立就改變了族群的區別方式，使得群與群之間在權利義務上出現不平等，文化認同既是華人自尊的基礎，也是在地民族區隔華人的依據，更是與中國雙邊關係起伏所必然影響或參照的對象，所以文化認同成為核心課題。

在早期從中國南來的僑民是以籍貫作為身份的象徵，再漸漸形成幫、群的概念，並衍生了祖籍的概念，因此，華人社群裡就有「方言群」，而非「族群」，這方面似乎有異於臺灣的族群研究。方言群作為識別說明的是，當時的華人是「幫」和「方言群」來作為身份的區分，在實踐上強化了「華人性」，而其中涉及的方言與幫群，恰是概念上具有普遍性，而實踐上具有在地性的華人文化資源，這種可能重新啟動作為與中國再連結的特定共享文化資源，也是「後華人性」的緣起之一。

不過，一些西方學者比如就提出，認同不是屬於個人的所有權，而是關於個人歸於社會的屬性，其基礎在雙方所同意的角色責任及權利，亦即，族群認同來自於其成員與群的互動。換言之，海外華人與中國的互動頻率可以影響或反映與中國之間認同的強弱¹⁶³。中國研究學者 Harold R. Isaac 則認為，族群認同是由一組現成的天性與價值組成。出於家庭的偶然，在某一時間，某一地

¹⁶³ Gregory Stone, 1962. "Appearance and the self" in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processes. An interactionist approach, edited by Arnold Ro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pp.86-116.

方，從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的那一刻起，他就與其他人共同擁有了那一組天性與價值。¹⁶⁴王宏仁與郭佩宜亦指出，離散族群的移動與活動，許多都是跨國界的，這些跨國活動，與特定的族群或想像有關係(origin of ethnicity)，華人到中國發展特別有熟悉感，因為他們享有共同的語言。¹⁶⁵

許多華團領袖在活動上致詞時，一般都使用中文（華語）發言，又或者會加入一些方言（閩南語、福州話、粵語等），這都是他們習慣使用的語言，一來可以突破彼此之間未必熟識而造成的隔閡；二來是對原鄉祖籍的情感表現，同時在面對中國人的時候也方便交談。華團領袖對民族與公民之間的身份策略，特別在面對中國崛起、「中國夢」的號召之下，以及他們對中國僑外事務的參與，讓他們與中國的關係日益趨向再華化。雖然這些華團領袖來自不同地區，祖籍不同，但是他們堅持自己某種面相上的中華文化。雖然他們平日的表現與對中國的熟悉，以及文化的認同，不易表達，但他們居於在地的這片土地上，保持原鄉情感，加上與中國的互動越來越密切，實際也無法抗拒與中國取得更密切連繫的吸引力，更無法剪斷中國的臍帶（文化）。華團領袖正是協助中國發展僑務及外交的關鍵的人物，他們因此對中國有著剪不斷的文化記憶、文化想像、文化認同及經濟誘因等各種不能輕視的因素。

¹⁶⁴ Harold R. Isaac, 1989. *Idols of the Trib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¹⁶⁵ 王宏仁、郭佩宜，2009，《流轉跨界：跨國的台灣.台灣的跨國》，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頁：1-34。

第二節 研究建議與成果



壹、釐清文化與民族之間

從前許多學者對於「什麼是民族」持有一種看法：民族是有共同血統、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的人群。基於這種對民族的定義，許多考古與歷史學者由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中蒐尋語言、體質與文化特徵等材料，由相似與相異的類比中溯源，希望由了解中國人種、語言與文化的起源來詮釋中國人的本質。六十年代末起，人類學對族群現象與理論研究有革命性的發展；強調主觀認同與族群邊界（而非內涵）的族群定義，進而探索族群認同的工具性（利益）與根基性（情感）基礎。比如王明珂的「民族」概念就結合人類學族群理論與集體記憶理論。¹⁶⁶

民族與文化相互影響至深，但是世世代代的馬來西亞華人在其身份認同上遭到馬來西亞政府的政策綑綁，其次是公民與民族的兩種身份之間的關係，已在不同背景下持續變遷，因此經歷了極大的變化。除非是少數，其中，以重新恢復建國前對中國的全盤認同，一直與中國的互動密切的絕無僅有，而這正是馬華的華團領袖值得追蹤的原因。現在，中國軟實力的擴張，展現文化魅力，對馬來西亞華人是衝擊也是契機。藉由華團領袖個人在訪談中對中國的論述、想像，整理他們回應「中國夢」的脈絡，從中可以發現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或中華文化的價值觀確實是有變化的。而且，從他們的言行中發現，他們對中華文化的愛護，體現出他們對文化認同及其衍生出的政治經濟行為，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

¹⁶⁶王明珂，2003，《羌在漢藏之間》，聯經出版。



與華團領袖相較，馬來西亞華人整體在自身的文化記憶或者是文化想像中，是否有意無意也在不斷界定他們對民族身份的認同，以及強化對中國的想像？馬來西亞華人自始，便在民族與公民之間垂死掙扎的過程中找尋認同，為了生存或尊嚴而強化某一個身份的時候，便面臨著對另一種身份的「排他性」。上述文化記憶與想像，極可能導致華團領袖與中國的關係變得更密切，這無非是喚醒歷史記憶，來修補斷裂的記憶，透過像是原鄉的情感、中國情懷予以重新連接，如此一直都在變化中演進，不可避免就將在地的中華文化開展出不一樣的內涵。陳志明就曾根據中國意識來區別華裔對中國的態度，解釋為這是一種文化相關性（cultural relevance），種族意識較強的華人雖然不在政治上認同中國，但卻在文化上認同中國。他們中的一部分仍視中國為「祖國」。¹⁶⁷王國璋認為華人身份與地位處於「虛」與「實」之間—「實」為華人在馬來西亞的公民地位，相比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在國內的地位似乎不差，有著實質的公民權益；「虛」則相對是指在法律明確保障公民權利之餘，仍在包括政治、經濟、教育及文化方面備受壓擠，淪為實際上的二等公民。王國璋指出，最關鍵的是，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終究無法自外於國內整體的大環境，馬來主流社會對土著給予特權的決心不變，則馬華公民（馬來西亞華人）地位難再有所提升。歸根究底，馬來西亞仍未能超越單一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桎梏。¹⁶⁸本文既從華人學者及華人的歷史脈絡來檢視，發現華人是在傳承中華文化的過程中，維繫了自身的民族尊嚴，但這樣的民族認同又無法成為主流族群的一份子，在政策邊緣淪為「二等」公民，又更促使華人傾向認同自己祖國的民族與文化。中國崛起與

¹⁶⁷陳志明，2012，《遷徙、家鄉與認同—文化比較視野下的海外華人研究》，商務印書館。頁：142-143。

¹⁶⁸陳鴻瑜編，2014，《海外華人之公民地位與人權》，華僑協會總會，頁：301-330。

中國夢引發的回應，無異就是再度掀起向雙趨衝突——應該向主流民族的政治認同靠攏，或彰顯對強大祖國的文化認同？



果其然，馬來西亞華人在身份認同上出現變化，從原本已有的「華人性」，進一步分疏，而開展出「後華人性」，其間的差異在於，華人與華人之間的比較，可以從地域、世代、階層、部門入手，因而更明顯的突出了作為馬來西亞、資深、富裕、商界的華團領袖，選擇對固有文化資源的大加運用，與其他華人群體的選擇頗為不同，但又可以為後者所理解、識別、贊成或反對。舉例而言，華團領袖視華文教育視為民族事業，在其他東南亞地區較為少見。

準此，以「雜匯認同」分析華人或馬來西亞華人¹⁶⁹，僅對差異性有所著墨，但對於重新與中國的連接，再度將中國當成身份內涵得意個面向，就不能充分說明，畢竟，雜匯或混融所影射的，失去的在地性而與中國漸行漸遠。後華人性更強調華人的文化源起與因此而保留的、足以重新共享的文化資源，以之作為一種共同想像的來源，使得文化雜匯以後的群體，繼續有可能恢復或增強彼此認同，並透過他們共同對一個祖國文化的想像，以及對固有文化資源恢復使用的能力，補充了著重強調差異的雜匯認同，而能解釋何以已然分疏的華人性，仍然有可能會以華人的身分不斷再現。「後華人性」指向了中國崛起後，導致若干階層的華人意識出現鞏固、回歸的效果，是循何種機制而來。這種與中國重新取得聯繫的可能性，不論是群體內生的，或是外界刻板印象中的，都是何以已然分疏的華人群體，繼續能識別為華人的深層基礎。不管是廣泛或狹

¹⁶⁹游雅雯，2015，〈馬來西亞華人認同的形塑與變遷——以馬華文學為分析文本〉，《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1卷第1期，頁139-70。

義的去界定華人，「後華人性」所能研究的範疇，因此比單純使用華人性更為充分。



貳、馬華的中國情意結

有論者以「中國情意結」來形容有親中傾向的人，而這些人物的個人生命經驗中對中國或許真的抱有精神與文化上的情感，他們在中國的與在馬來西亞的親身經驗，形成這種情結是自然不過，但是引起爭議的是，這種身份意識及其伴隨的利益關係，遭外界冠上戲謔性的「中華膠」稱謂。就以兩名研究對象陳凱希與張曉卿為例。陳凱希將其集團命名為「海鷗」，以表達其身份是中國來到馬來西亞的公民，既認同馬來西亞人，也同時懷念原鄉。張曉卿投資《下南洋》紀錄片，他希望透過影片中重塑「華人性」，並界定文化記憶在華人華裔心中的想像，其實海外華人想像的中國是與中國人的中國之間，存在空間、世代等方面的差距，畢竟海外華人對中國想像與認識，是透過祖先的口述，後來再到中國旅遊探親來延續，其心中想像的中國，與現實發展不輟的中國，兩者之間是否能找到文化資源足以為橋樑。

馬中關係確實敦促著馬來西亞華人介入中國與馬來西亞之間，作為其中一道維繫的橋樑。對華政策已經是馬來西亞政府與公民之間關係的轉折點，尤其是近年來的隨著全球化、政局及世代變化，最關鍵的是領導人的施政方針促使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再度浮現，華團之外的其他華人群體隨之調適自身身份意識的可能性頗高，故當中國崛起之際，馬來西亞當地華人抱持的，是在一個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中，重新反省華人需要的中國認識是什麼。□



不過，廖建裕指出一個受限於文化範疇，且與各地東南亞華人所在國家息息相關的中國概念。他認為東南亞華人難以找回對中國的全盤認同感，主張東南亞華人與中國人本質上並不相同。¹⁷⁰廖建裕的中國認識是從在地出發，有著身份、情感上對中國的隔閡，並強調東南亞華人為主體。這一點與馬來西亞華人普遍強調自己是馬來西亞人的論述相似，有別與中國的中國人，並以國籍作為主體認同，這在馬來西亞華人中佔據絕大多數，亦即，不管是政治及文化皆認同馬來西亞。在國家認同上，出生地是一個關鍵，許多第二代以後的馬來西亞華人對中國的想像或認識有限，一部份華人也會抨擊其他那些情感上傾向中國的華人，而華團領袖是他們首選的攻擊對象，稱華團領袖為「中華膠」。華團領袖之間無形中存在一種焦慮感，因為他們無法因此就必然獲得中國的資源，卻已經也無法走入馬來西亞體系的中心。事實上，中國的強大是一種威脅的印象，正在華人中蔓延開來，在部分的馬來西亞華人圈子中，不斷的提醒著馬來西亞華人，時時刻刻要擺脫自己民族的身份，這是由於馬來西亞政府政策拒絕將華人納入土著，而只有公民或者非土著身份的華人，一直都受被邊緣的危機意識所困。

反觀，許多東南亞國家的政府推動「同化」的政策，譬如印尼或泰國的華人已被同化，特別是印尼華僑經過排華慘痛事件後，為了生存及現實情況而情非得已之下，認同所謂印尼籍的身份，甚至以印尼文的名字作為一種對於國族認同的表述。但是「同化」政策似乎在馬來西亞並不奏效，更不適合研究馬來西亞華人。馬來西亞華人一向是遵循民族文化的想像，而成為土著族群在政策

¹⁷⁰ Leo Surbyadinata, 2007. Understandi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 Institu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Integration :Diaspora and Impact,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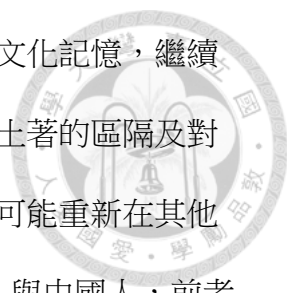
上必需管制的對象。最後導致當下的馬來西亞華人在認同上雖稱自己為馬來西亞人，但繼續對華人這個身份有所執著。



第三節 研究展望

在華人身分的認同與融合入本土的調適中，馬來西亞華人的「華人性」受到各種因素影響，其間的身份轉變，形成了從「華人性」延伸至「後華人性」的可能性，在回應中國崛起的當下，在自我調適身份上，需要提出比「雜匯」、「多元」、「差異」等等更為敏感的概念如循環、復興、再華化。這些概念儘管並不是普遍有效，但揭示了中國崛起的印象與實踐重新聯繫了本已分疏的華人群體，與中國的關係密切的身份概念如「炎黃子孫」、「中華文化」、「中國夢」均獲得華團領袖不吝使用，而最近的「一帶一路」等詞彙使用益加頻繁，尤其是在華人媒體的報導，或者華團領袖的言論中更為明顯。

華團領袖在回應中國時的言論，都是圍繞在經濟、文化等價值取向，同時透過馬來西亞華人對原鄉中國的論述，二十年來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大規模新移民進入海外華人社會，中外關係空前密切，等等都導致海外華人身分意識的急遽變動。這種變動雖帶動華僑華人社會地位的提升，但也引發華人社會內部結構的巨大調整，並使華人社會與當地社會的關係充滿變數，特別是海外華人对中國的複雜情感，不是大陸的中國人或者外人可以體會的，相對的，中國文化與歷史是一種輪迴的歷史學主張，想不到又有了觀察的可能，雖然境外的華人所體會的固有文化，必然不同於經歷文革與改革的中國人自己的體會。



「後華人性」的形成，在於因應在地情境而衍生出的不同文化記憶，繼續使用相同的文化資源，確保了華人與華人之間的相處模式、與土著的區隔及對中國的情感，都仰賴著某種可以分享的概念、儀式、價值，並可能重新在其他地方啟動。這樣的「華人性」並不同「中國性」，若比較華人與中國人，前者是有著歷史、血緣與文化為內容；而後者則是現實與政治的表徵。「華人性」與「後華人性」擺脫了中國性的疆域束縛，但又受制於在地國的疆域以及因此而衍生的身分，故中國與在地是華人身份的一體兩面，標示著流動性與僵固性，兩種特性促成了後華人性所展現回歸文化母體的可能性，以及由於多數華人群體繼續回避這種可能性，而使得回歸的表現與欲望，充其量是一種不穩定或遭到邊緣化的選擇。

有鑑於此，華人與華人之間的共享文化資源所確認的，是中國因為能作為一種資源，而能進一步開展成一種身份。大抵而言，各個華人社會之間越來越趨向為資金、產業、人才和勞動力的互補關係網，其密切程度大大超過華人社會和在地主流社會之間的關係，這包括東南亞華資與港台華資之間的融合。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東亞華人資本、產業、勞動力和市場的整合已成趨勢。¹⁷¹這一點也是未來在進行海外華人研究中可進一步發展的課題。當海外華商與中國之間經貿整合而鞏固了關聯性，或者中國企業到東南亞駐點的發展與趨勢日益明確，「後華人性」的趨勢是否將更加明確化，共享的文化資源重新獲得啟用，甚至影響華人的身分策略與華人意識，其民族認同也隨之而轉變？或者因為物質性的利益關係，導致文化認同的邊緣化，反而破壞在地華人民族自尊的精神

¹⁷¹ Zhuang Guotu, 2006, "Trends of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 in East Asia: As Mirrored from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1978", *Ritsumeik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 pp. 1 - 23.

文化面，而如此中國夢所帶來的，就反而是文化上的夢魘？



就前言所述，提醒了我們後華人性的兩大特點：一、馬來西亞華人接受的文化資源是多源頭的，而不是源於單一源頭，這是「後」的概念所傳達的，亦即共享文化資源如何被重新啟動，以及能否被重新啟動，這不單純只是文化記憶中有無存在共享資源的問題，也是在地性對於共享資源的重啓，在態度上能否接受，如何接受，誰有能力接受的問題；二、越多源頭的出現，後華人性反而變得越強大，因為共享文化資源的內涵各地都不同，中國崛起的影響將愈遠播，其進程愈難為政治介入所壟斷，而這正是某種模糊但隨時可以分享的華人性的展現，而那些具備重啓共享文化資源能力的社群，更能分享。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 王賡武，1994a，《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王賡武，1994b，《中國與海外華人》，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 王賡武，2002，《南洋華人簡史》，水牛出版社。
- 王賡武，2005，《離鄉別土：境外看中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王明珂，2006，《華夏歷史邊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文平強編，2009，《馬來西亞華人與國族建構》，華研出版。
- 石之瑜，2004，《族國之間－中國西南民族的身份策略》，揚智出版。
- 石之瑜，2006，《身份政治：偶然性、能動與情境》，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
- 石之瑜，1995，《後現代的國家認同》，台北：世界書局。
- 石之瑜，1997，《中國文化與中國的民》，風雲論壇出版社。
- 石之瑜、徐耿胤，2012，恢復朝貢關係中的主體－韓國學者全海宗與李春植的中國研究，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
- 石滄金，2005，《馬來西亞華人與社團研究》，中國華僑出版社。
- 何啟良，1999，《文化馬華－繼承與批判》，十方出版社。
- 何國忠，2006，《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華社研究中心。
- 何國忠編，2007，《全球化華語下的中國與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中文研究所出版。
- 吳元華，1999，《務實的決策——人民行動黨與政府的華文政策研究



1954-1965》，新加坡：聯邦出版社。

李志賢主編，2012，《南洋研究－回顧、現狀與展望》，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李明歡，1995，《當代華人社團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

李政賢，2009，馬來西亞《光華日報》的中國認識，在華人與華僑身份之間，
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

李盈慧，2004，〈海外華人認同的三種論述：評顏清煌、古鴻廷、王賡武的三部
著作〉，東南亞學刊，第一卷第一期，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心。

李錦興，1998，〈馬來西亞華人：在 2020 年宏願中追求認同〉，東南亞季刊，
第三卷第二期，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林忠強、莊華興、潘永強、張炳祺、許德發及詹緣端，2013，《2012 年第一屆
馬來西亞華人研究雙年會論文集》，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出版。

林開忠，1999，《建構中的華人文化：族群屬性、國家與華教運動》。吉隆坡：
華社研究中心。

林開忠，2007，〈國家·文化－重新評估馬來西亞國家文化與國家認同〉。載於

林聚任、劉玉安主編，泥安儒副主編，2004，《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山東：人
民出版社。

祝家華、潘永強主編，《馬來西亞國家與社會的再造》，頁：363-378，馬來西
亞新紀元學院、南方學院、吉隆坡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聯合出版。

莊國土，2001，《華僑華人與中國的關係》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陳志明，2012，《遷徙、家鄉與認同－文化比較視野下的海外華人研究》，商務
印書館。

陳昌弘，2011，新加坡中國研究的知識密碼－華裔離群者的身份策略與能動性

的展現，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

陳烈甫，1987，《華僑學與華人學總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陳鴻瑜，1999，《邁向 21 世紀海外華人市民社會之變遷與發展》，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出版。

陳鴻瑜，2012，《馬來西亞史》，蘭台出版社。

陳鴻瑜編，2014，《海外華人之公民地位與人權》，華僑協會總會。

黃乃裳，1995，〈廣南洋華人宜大私以自保說〉（新加坡：《日新報》，1899 年 11 月 9 日），見葉鐘鈴《黃乃裳與南洋華人》，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附錄一：〈黃乃裳南遊佚文〉。〈論本報所載華人善兵事〉（新加坡：《日新報》，1899 年 11 月 10 日），見葉鐘鈴《黃乃裳與南洋華人》附錄一：〈黃乃裳南遊佚文〉。〈商學〉（新加坡：《日新報》，1899 年 12 月 1 日），見葉鐘鈴《黃乃裳與南洋華人》附錄一：〈黃乃裳南遊佚文〉。

黃朝翰、曹雲華編，2007，《中國的東南亞研究- 成就與挑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黃露夏編著，2004，《馬來西亞華僑華人編年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游雅雯，2015，〈馬來西亞華人認同的形塑與變遷 — 以馬華文學為分析文本〉，《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1 卷第 1 期，頁 139-70。

崔貴強，1990，《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1945 - 1959》，新加坡：南洋學會，1990 年）引述李秋 1941 年 4 月在《南洋商報》發表的議論文《論馬華民族屬性問題》。

葛永光，1991，《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正中書局。

廖建裕著，林蘋蘋譯，1998，「東南亞華人：華僑？海外華人？或東南亞



人？」，東南亞季刊，第三卷第一期(1998 年 1 月)，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彭偉步，2000，《東南亞華文報紙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蔡北華編，1992，《海外華人華僑簡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楊媛甯，2009，一種本土化跨國華人的中國詮釋－以廖建裕的中國思考為例，

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

雲昌耀，2012，《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鄭鴻生、王國璋等，2015，《大馬華人與族群政治》，聯經出版

劉宏，2000，《中國東南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羅金儀，2011，《盛世邊緣》，唐山出版社。

顏清煌，2005，〈馬來西亞華人的歷史變革（1403-1941）〉，《海外華人的社

會變革與商業成長》，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顧長永、蕭新煌編，2002，《新世紀的東南亞》，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Kathryn Woodward 等著，林文琪譯，2004，《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南洋商報》2012 年至 201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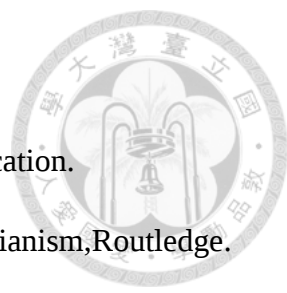
《星洲日報》2012 年至 2015 年

南洋網 www.nanyang.com

星洲網 www.sinchew.com.my

新華社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news.cn/>

貳、英文部分

- 
- Arthur H.Smith.2001.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mon Publication.
- Chan Kwok-bun,2005.Chinese Identities,Ethnicity and Cosmopolitanism,Routledge.
- Richard Madsen,1995.China And The America Dre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ohn k.Fairbank,Edwin O,Reischauer,Albert M.Craig,1966 , 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Vol. 7, No. 1 ,pp. 159-162,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Harold R.Issacs,Lucian W.Pye,1989.Idols of the Tribe: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 Kai Leong ,1992.The Malaysian Chinese Guilds and Associations as Organized
Interests in Malaysian Politics .
- Ho Kai Leong ,2012. At a Crossroad: Malaysia's Coalition Politics and Chinese-
based Political Parties. In Lee Hock Guan & Leo Suryadinata (Eds.)
Malaysian Chinese:recent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pp. 70-89,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Hall,Stuart. 1993.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
Colonial Theory .
- Lee Guan Kin. 2002 .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Lee Kam Hing and Lee Poh Ping,2009.China's economic rise and its impact on
Malaysian Chinese Business in Leo Suryadinanta(ed),Southeast Asian Malaysian
Chinese Busi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Coping with the rise of Chin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 Leo Surbyadinata, 2007. *Understandi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nstitu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Integration :Diaspora and
Impact,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 Tham, Seong Chee. 2001.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In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A Critical Reader, ed. M. A. Quayum and P. C.
Wicks. Petaling Jaya: Longman.
- Tan Chee-Beng, Colin Storey, Julia Zimmerman. 2003. *Chinese Oversea: Migratio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GungWu, 2003.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 Young, Robert. 2001.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Zhuang Guotu, Emile Kok-Kheng Yeoh, 2010. *East Asian Regiona*,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